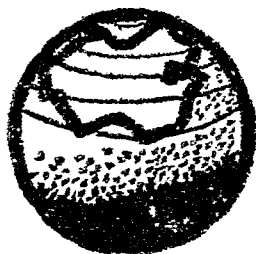


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近代史)



第七冊

出	版	總	經
圖	書	文	范
著	瀾	文	范
版	出	店	書
		華	新

MG
K20
59

著 瀾 文 范
編 簡 史 通 國 中
(史 代 近 國 中)
冊 七 第



3 2167 8754 3

行 發 店 書 業 新 北 華

庫 單 20628

~~23802~~

中國通史簡編

第七冊

(中國近史)

著者：

范文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九月出版

說 明

一、《中國近代史》分上下兩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又分兩個分冊，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五年爲第一分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九年爲第二分冊。本書是上編的第一分冊。

二、本書純屬草稿性質，各分冊擬陸續付印，目的在便於同志們審閱。其中觀點錯誤、取材不當、繁簡失宜、語句欠妥等病，所在多有，切盼同志們閱覽時隨手標出應改之處，以便將來蒐集許多寶貴意見，作修改草稿的南針。

三、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飽受外國侵略的苦難，永遠不能遺忘。稿中列舉某外國如何殘暴，如何詭詐，都是專指侵略者說的，與各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無涉。

四、凡引用原文，如文句較長，多註明出處，數句或數字，多省略不記，惟概標一符，以明語有所本，非出臆造。

五、曾國藩是百年來一切反動派的開山祖師，直到今天，還有人繼承他的漢奸劍子手衣鉢，決心充當他的末代裔孫，中國人民熟習曾國藩的一套把戲，對提高政治覺悟性是不無幫助的。因此把他的一生罪狀寫成專篇，作爲本分冊的附錄。

附記

雖北新書局印行中國通史簡編，分成六冊，頗便閱讀。茲將本書作為簡編第七冊、第八冊，附錄移至第七冊後面，其餘概不變動。

中國通史簡編 (第七冊) 目錄

近代史上編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鴉片戰

爭至五四運動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至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形成及中國人民舊式的反抗運動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至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

第一章 第一次鴉片戰爭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可恥的鴉片輸入者

第三節 糜爛的『天朝』

第四節	煙毒汎濫於中國……………	九
第五節	統治階級對鴉片的態度——抵抗、妥協、投降三大派……………	一三
第六節	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	一五
(A)	嚴厲的禁煙……………	一六
(B)	堅決的抵抗……………	二六
第七節	投降派第一次「勝利」……………	三五
(A)	出面求降的直隸總督琦善……………	三五
(B)	懲罰抵抗派、開放烟禁……………	三七
(C)	放手買賣的兩廣總督琦善……………	三九
第八節	清政府的「對英宣戰」……………	四一
(A)	決心宣戰的原因……………	四一
(B)	廣東方面的戰爭……………	四三
(C)	閩浙方面的戰爭再起……………	四八
第九節	清政府的求降難……………	五三
(A)	乍浦失陷——希望「解仇通好」……………	五三
(B)	求降被拒——失陷吳淞口……………	五四
(C)	長江不守——城下定盟……………	五五

第十節 投降派大「勝利」.....五七

第十一節 圍繞着鴉片的各種鬥爭.....六二

(A) 英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的鬥爭.....六三

(B) 抵抗主義與投降主義的鬥爭.....六五

(C) 滿族與漢族的鬥爭.....六八

第二章 中國人民的反英反滿鬥爭

——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

第一節 緒論.....七三

第二節 反英武裝鬥爭.....七四

第三節 反滿武裝鬥爭.....八一

第四節 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所走的不同路線.....八三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第一節 緒言.....八五

第二節 太平革命準備時期.....九二

第三節 太平革命勝利時期.....一〇五

(A) 前期的革命形勢——戒煙.....一〇五

(B) 後期的革命形勢——停滯.....一四〇

第四節 天國建設諸問題.....一一九

第五節 太平革命衰敗時期.....一三三

(A) 前期的革命形勢——防禦.....一三四

(B) 後期的革命形勢——困守.....一四八

第六節 太平革命失敗的原因.....一六二

第七節 太平革命的餘波.....一六七

第八節 反革命破壞下的中國社會.....一七八

第四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

第一節 緒言.....一八三

第二節 頑固派第一次失敗——廣州失守.....一八七

第三節 頑固派第二次失敗——天津條約.....一九三

第四節 頑固派第三次失敗——北京條約.....二〇二

第五節 一部份頑固派向洋務派轉化——所謂「同治中興」.....二〇七

第六節 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鬥爭.....二一七

附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二二五

第一章 第一次鴉片戰爭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第一節 緒言

十八世紀後半期，英國已是世界第一個商業和殖民地強國。以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八年）瓦特完成蒸汽機的製造為起點，早在全國普遍發展的紡織工業首先獲得劃時代的大進步，接着蒸汽機應用到其他工業上，使英國的製造廠變成了巨大的機械化的企業，作為英國紡織業中心的曼徹斯特，煙囪林立，也成為全世界紡織中心了。一八一二年（嘉慶十七年）完成了輪船的裝設，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又製造火車鐵道，這固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駕駛着新式運輸工具，帶着可怕的殺人大砲和精美而又廉價的紡織品，開闢世界市場，她決不允許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閉關自守，孤立於資本主義世界之外，那是完全自然的。

可是中國——世界第一個老大封建帝國，她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社會，廣

大人民過着勤儉窮苦的生活，曼徹斯特的機器布，敵不過中國土布的結實而便宜；社會上層人士，四季服裝有一定制度，材料全用絲織品，中國的養蠶業和絲織工業在當時是舉世無匹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八年給英王喬治上諭），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支持了滿清的嚴格閉關政策，英國布疋和毛織物在中國市場不能取得必需品的地位，如果不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直到一九〇〇年英國一向依靠鴉片來維持貿易優勢），很難打破中國的大門。下列簡表顯示戰前中英貿易的概況（單位千元）：

年 份	中國對英 輸出額	英國對華 輸入額	輸入額中所包 括的鴉片價	除去鴉片， 中國出超額
一八八一年（嘉慶三年）	一四·一四四	一六·〇〇四	四·七四五	二八·五
一八八二年（道光五年）	一四·四〇一	一五·九三三	五·六〇八	六·〇〇七
一八八三年（道光三年）	一七·八八四	一三·三〇四	三·八八八	八·三九九

鴉片在中英貿易中成爲決定性的商品，中國既決不能放任，英國又決不肯放棄，英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鴉片輸入額依國力而逐年增大，反之，中國統治階級逐步腐化墮落，無法阻止大量白銀因鴉片輸入而逐年流出，最後必須出於戰爭，戰敗者自然是中國。

第二節 可恥的鴉片輸入者

第一期輸入情況

一七五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佔領鴉片產地孟加拉，但給予私人商船的執照中，却列有一項條文，註明這些商船除運輸東印度公司自己生產的鴉片以外，不得運輸任何鴉片，違則罰款。從此輸入量逐年增大，一七八〇年（乾隆四十五年）至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公佈的數字為每年輸入約四千至五千箱，據東印度公司航務長的記錄說：『一七八六年中至少有六千箱鴉片運入中國，較前六年每年所輸入者，已超過五六百箱』，足見實際輸入比公司發表的數字大得多。本期內滿清政府感覺到鴉片的壓力，於一七九六年（嘉慶元年）一八一三年（十八年）一八一五年（二〇年）三次嚴令禁止，但東印度公司把鴉片的種植及其向中國的私賣，作為自己財政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份，決不放鬆鴉片貿易的鼓勵。

第二期輸入情況

一八一六年，東印度公司允許鴉片自由貿易，這給了英國私販們的營業以新的強大的推動，輸入更旺，至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竟達二一〇八八五箱的巨額。本期內英國工商業愈益發展，不僅醫

要中國大量茶葉供給本國及歐陸各國，一八二〇年起，又需要中國大量生絲供給本國絲織工業。中英貿易的支付方法是英國向印度輸入大批布疋，換取鴉片。轉向中國換取絲茶和白銀。中國感到鴉片威脅的嚴重，一八一七年，滿清政府執行禁烟法令，要求搜船並令其立「不售鴉片」字樣。東印度公司違令公司船，私人商船堅決拒絕，認為「爲保持英國之尊嚴及公司之利益，凡懸掛英國國旗之船，必須拒絕搜查」。又認為「若公司應允簽寫此種誓書（字據），將來對於歐洲與中國之貿易，恐發生惡果」。如果私人商船立字據，「航務委員會便取消彼等之貿易特許權」。它派兵船一艘到廣州示威，把怯懦的滿清政府嚇倒了。此後清政府於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二九年、三二年、三四年訂立各種法令，企圖禁運禁吸，但除了二二年鴉片商船自黃浦、澳門移至伶仃洋，貿易更覺便利以外，絲毫不生禁烟的效果。

第三期輪

入情況

一八三〇年以來，英國工業空前發展，三二年，工業資產階級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勝利，自由黨（代表資產階級）代表守黨（代表大地主階級）當權。三四年，取消作爲商務機關的東印度公司，改組爲殖民地總督的統治，因此對華貿易就變成了英國私人企業所完全能夠執行的事務。這種私人企業的對華自由貿易當時發展得非常迅速，不管中國政府拚命抵抗，它們在一八三七年將價值二千五百萬元的三萬九千箱鴉片運入中國，三八年，運入四萬零二百箱。中國發生銀源枯竭的危險，當然要講求自救之道。可是自稱文明的英國政府，強迫一部份印

度農民種植罌粟，用墊款辦法來引誘更大一部份農民也去種植，用嚴格的壟斷辦法操縱這種毒藥的全部生產。在政府市場上，由國家官吏拍賣給商人，偷運到中國。每箱鴉片上英國政府所化的費用，約在五百五十印洋，而在加爾各答拍賣時，却按照每箱一千二百一十印洋至一千六百印洋的價格發售。印度的英國政府就依靠這樣的非法貿易取得七分之一的收入，它不惜發動武力來阻止中國的自救行動，資產階級所謂『文明』、『自由』的實質就是『強權即公理』。

第二節 腐爛的『天朝』

鴉片輸入與滿清腐爛統治是互為表裏的。中英雙方都玩弄兩面手段來推進鴉片貿易。英賴期禁暗運，滿清期拒暗受，實通雙方的是賄賂。

鴉片貿易從乾隆後半期開始發達。那時候正是駭人的受賄者和紳做大學士，他攔兩座洋貨庫，出售大呢、羽緞、碑礮等英國貨，很可能私賣鴉片。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法律規定洋貨店有出售鴉片權，當是和紳以來的舊例。如果這個推測不誤，鴉片不僅和池方官吏（主要是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勾結，而且和朝中大官也直接聯系着，更不待緞政以賄成的間接聯系了。任何禁令不能阻止鴉片貿易的增大，中國方面的主要原因在此。

事實上滿清皇帝也是鴉片貿易的受賄者，他禁止外商在其他海口通商（康熙時有江浙閩粵四海關），保證粵海關獨佔利藪，海關監督又必用滿人，替他搜括金銀玩好。監督於正稅外，勒索賄賂，稱爲「規費」，雍正、乾隆以來，皇帝經常以清查積弊爲名，「將規費改正歸公。行之既久，陋規漸又加增，無所底止，華夷各商，咸受其累」（道光三三年著英奏）。皇帝勒索監督，監督勒索洋行，洋行勒索外商，費上加費，循環不已。着英所謂「從來清釐積弊，另定新章（陋規歸公），大抵如此，不獨關稅一事爲然」，確說破了滿清統治者在各方面剝削的秘密。若干年一次的海關陋規歸公以外，還有每年照例賄賂，定出辦貢、備貢、人參變價三種名目。辦貢是隨時獻納新奇物品，備貢（年貢）每年三次，是無代價的獻納呢、羽、鐘錶等英國貨，參價是朝廷發給海關若干斤人參（吉林貢品），按高價變錢獻納。海關從鴉片得肥，皇帝從海關分肥，因之朝廷可以嚴禁鴉片，但不能嚴禁官吏受賄。英政府質問「大清國家豈得開一眼而鑒遠人（英商）犯罪，閉一眼不鑒官憲犯罪乎」（琦善轉呈「英外部大臣致中國宰相書」），這正是禁烟失敗的重要原因，滿清皇帝是一隻眼看鴉片的毒害，一隻眼又看鴉片的利益的。專制政體的皇帝，個人態度對政治起極大的作用，這就是說，不管嘉慶帝如何積極嚴禁，却絲毫不能阻止鴉片的輸入，禁令只供官吏利用，向鴉片商勒索更多的賄賂。從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以來，歷次禁烟都證明這一事實。試看開始積極禁烟的嘉慶帝得些什麼效果？

一七九六年嘉慶帝頒佈禁煙法令。一七九八年航務長向印度長官報告說：「一般人均相信，海關監督因暗中鼓勵此種違法貿易，藉以發財，彼決不能積極設法禁止。」一八〇二年航務委員會報告：「中國政府雖然一再頒佈禁煙法令，而鴉片之銷路確已大增，毫無疑問。」

一八〇九年（嘉慶十四年）兩廣總督兼代理關務百齡發令禁運。一八一一年航務委員會報告：「據觀察，總督關於禁煙之語，不過官樣文章而已，毫無積極禁止貿易之意，因政府久以縱容私運爲發財之機會。」

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嘉慶帝令刑部擬定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分別治罪條例，上諭斥責官吏說：「各海關竟有私徵鴉片烟稅銀者，是竟導奸民以販贖之路，無怪乎流毒愈熾也。」一八一五年航務委員會記載：「當時因官吏阻礙販烟，阿立加先生遂決定每箱抽稅四十元，以分與中國官吏。」

嘉慶帝禁烟的結果就是這樣。道光帝繼續嚴禁，結果還是一樣。

一八二二年（道光元年十二月）上諭嚴禁海口守巡員弁賣放偷漏說：「鴉片烟流行內地，大爲風俗人心之害。總由海口守巡員弁賣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着阮元（總督）達三（監督）認真查拏。」阮元密奏請「暫時羈縻，徐圖驅逐」。這八個字的後面，自然是大批賄賂。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總督李鴻賓設巡船。「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聖武記》）。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上諭嚴禁販運吸食及私種

烟苗。次年，東印度公司航務記錄說：『最近伶仃洋內所運入之貨，特別加多。中國政府雖欲消滅此種貿易，茲無論其有無誠意，而並未成功。』『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洋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以水師船代運進口，於是韓肇慶反以獲烟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人人充橐，而鴉片遂至四五萬箱矣。』『聖武記』。

廣東官吏從鴉片貿易獲大利，內地官吏當然不甘落後，歡迎鴉片廣泛流行，從中取利。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稱：『鴉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風不息而愈熾者，非立法之不嚴，實稽察之不力。查夷船載運烟土，至廣東黃浦、老萬山二處停泊，內地奸商分設窯口接運。其大宗由海運至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天津、關東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專司收囤轉販之戶。其由內河輿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箚，載以舟車，實繁有徒……是與販者確有來蹤，不難稽查。而開銷者則咸狂通都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僚屬，認真查緝，何至不可遏絕。』這說明官吏是鴉片貿易的保護者，他們的利益早和鴉片混成一片。內地大量種烟，也由於官吏的默認。

天津是鴉片第二大市場，貴族官僚軍中地的北京盛行吸烟可以想見。久在天津經營鴉片業的英國人郭子立（又譯作郭士利），熟悉中國官場情形，道光十六年，英政府派領事參律（Captain Biddis）駐粵，議律約郭子立商議推廣鴉片的方法，郭子立議論滔滔，大意說：『清廷百事泥舊，毫無進步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顧世界大勢。要路顯官

· 盡爲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多嗜好鴉片，故倘以賄賂擴張販路，必能達到目的」（武弁錄：「鴉片戰爭史」，「義律小傳」）。義律大喜，託郭子立包辦朝廷方面苞苴之事，後來首席大學士穆彰阿指使投降派有計劃的破壞林則徐禁烟，滿足英國的侵略慾，不能不想到郭子立與穆彰阿、琦善、耆英這一羣賣國賊的秘密關係。

馬克思說：「英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爲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並破壞了宗法制度底柱石」。的確，自高自大的『天朝』，在英國鴉片商人看來，完全有理由予以藐視；皇帝自稱爲『國父』，他的官吏自稱代皇帝行施『父』權，這個作爲國家柱石的封建倫常，會是欺騙人民的一種重要手段，但是事實揭露他們的極端無恥，在人民看來，完全有理由予以驅逐。侵略的鴉片戰爭以及革命的太平運動，都是從滿清腐爛統治產生的。

第四節 煙毒汎溢於中國

9 幾人的英國侵略者與自殺的中國統治者合作，盡量推廣鴉片貿易，到道光時代，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駭人的破壞現象。

從鴉片銷場看，鴉片已流行全國。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上諭：「鴉片流行內地

，皆由番船分銷各省商船，載往各處發賣。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上諭：「鴉片局各處城鄉市鎮所在皆宜。鴉片由海路運至天津，有數棧代爲包辦關稅，山陝等處商賈來津銷貨，即轉販烟土回籍。」（「宣宗聖訓」）。「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沾染惡習日深，幾成積重難返之勢」（黃爵滋、耆英等奏）。這些說明英國鴉片在全國範圍內組成了經濟侵略的毒網。

從鴉片吸食者看。鴉片漸漸取得對中國統治階級及依附統治階級的各色人等的統治權。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黃爵滋奏：「上自官府紳士，下至工商（作坊、商店主人）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爲市日中。蔣湖南與黃爵滋論禁烟書」：「今之食鴉片者，京官不過十之一二，外官不過十之二三，刑名錢穀之幕友，則有十之五六，至長隨胥吏不可以計數。蔣湖南的估計，當然只是一些感想，但所謂京官不過一二，經上諭指出有親王，輔國公等高級貴族，有宮中侍衛，內廷太監等皇帝親近人，有「世職官員相率玩法」。決非一二少數。尤其使朝廷恐慌的是兵丁吸食鴉片，「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轍」（道光九年上諭）。鎮壓人民的力量削弱了。自從「鴉片吸食者不可勝數」，以北京爲中心，全國遍佈着滿州貴族、旗丁、太監、官吏、地主、紳士、士人、幕友、商賈、優伶、隸役、綠營兵、僧尼道士、娼妓一大羣鴉片癮者，據道光十五年估計，吸洋烟人數，約二百萬以上，幾乎腐蝕了大部份的統治階級及其依附人。不僅「擊辦烟案之人即吸烟售烟之人，互相庇護，狼狽爲奸，絕無被查擊之時」。

「宣宗聖訓」，而且吸食者的生命，掌握在英國鴉片商人手中，他們惟恐鴉片不能源源接濟，避發喪生，自動幫助烟商破壞禁烟法令的實施，把禁烟派看成死敵，有意或無意作了英國侵略者的忠實內應。

從財政經濟方面看，中國每年出口絲茶等土產，不能抵償鴉片價，還要補足白銀數百千萬兩，人民「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閩室之一燈」（夏燮：「中西紀事」），就是說，人民數年的勞苦生產，替剝削羣償付鴉片價還不夠，這樣，財政上發生銀荒，經濟上生產力大遭破壞。例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閩匪聚集之地，疊向行商、舖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烟而已矣」」（林則徐：「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舊商貨一半被鴉片奪去，情勢嚴重可以想見。一部份統治階級感到銀荒的危險，力主禁烟，道光十八年黃爵滋奏摺，主要從這一點着想。他說：「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二年），歲漏銀一千七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年復一年，不知伊於胡底」。黃爵滋所舉銀數未必確實，但金銀大量外溢，確使政府痛感：「若再數年間，銀兩愈貴，奏銷（國家開支）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自然，政府總

是向人民，主要是農民，敲剝的，這就是舊捐稅已經繁重得難以負擔，舊捐稅外又加上新捐稅。農民無力負擔重稅，陸續破產流亡，有的在官吏保護下種植鴉片，放棄正當生產，如廣東、福建、浙江、雲南、湖北等省，種烟田畝繼續增加，土烟較洋烟價廉，因之烟毒擴充到社會下層去。林則徐在「宜重禁吸烟以杜藥源片」裏說：「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吸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即另費銀三十六兩」。這裏鴉片價是指洋烟，貧民生活窮苦，受購買力的制限，不能吸食洋烟。自土烟盛行，價廉易得，烟毒侵入貧民層。生產力的萎縮和破壞更不堪設想。

英人馬爾丁描繪當時烟禍說：「鴉片腐化了、降低了和毀壞了不幸福的人底精神生活，而且還毒害了他們的身體。鴉片販賣者時時刻刻向貪慾無厭的吃人神貢獻新的犧牲品，而充當吃人的英人和烟毒自殺的華人，就彼此競爭，同吃人神的祭台上貢獻犧牲品」。這是多麼悲慘的一幅圖畫。統治階級迫誘勞苦人民服毒，當作犧牲品貢獻給吃人神，這種情況，直到國民黨政府的所謂「寓禁於徵」政策，本質上很少有變動。

第五節 統治階級對鴉片的態度

——抵抗、妥協、投降三大派

白銀外溢，到一八三四年以後，形勢實在嚴重不堪了。滿清政府必須處置當前緊急問題，一派人主張弛禁，對鴉片妥協；一派人主張嚴禁，澈底消滅煙毒；又一派人無所表示，實際是主張維持現狀，這一派人最後取得勝利。

妥協派——

許乃濟爲首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許乃濟奏請弛禁，理由是：『閉關不可，徒法不行，洋銀有出無入，食鴉片者幾遍天下』，事實證明禁煙失敗了。他主張承認鴉片爲合法貿易，『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民間販賣吸食，一律勿論，祇禁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吸食。內地種煙，聽民自便，土烟大量生產，英商無利可圖，洋烟不禁自絕。這一派的主張純從挽救漏銀的觀點出發，以爲首先是『稅額輕於行賄，偷越之弊，不戢自消』；其次是『以貨抵貨，有贏無詘』（廣東總督鄧廷楨等奏）；又其次是『以中國之鴉片抵夷人之鴉片，夷人爲利而來，必委折本而去，久之自不復販』（蔣湘南論禁煙）。這一派主張如果實行，英印國庫可能遭受暫時的損失，但決不能『不禁自絕』。

，因爲洋煙性味酷烈，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成本不大，可以減價競爭，弛禁的結果，勢必洋烟土煙同時盛行，鴉片戰後情況就是證明。例如，浙江台州出產土烟『黃巖』一縣，無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白日，闕其無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烟禁大開，鬼世將成（道光二二年浙撫劉韻珂『致伊里布等書』）。妥協派公開宣佈禁官不禁民，準備犧牲人民的生命，全國出現無數黃巖縣，他們是不會傷心的。這種露骨的殘忍主張，當然被抵抗派嚴厲斥責，道光帝在抵抗派影響下，革許乃濟官職，『以示懲儆』（十八年上諭）。

抵抗派——

林則徐爲首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黃爵滋奏請嚴禁官民吸烟，來抵抗鴉片的輸入。辦法是限期一年戒絕，過期犯禁，常人處死刑，官吏加等治罪。道光帝令各省督撫大員商議，反對派琦善、伊里布等二十人，其中滿員十三人；贊成派林則徐等八人，其中漢員六人。二十八人中反對派佔多數；滿員又佔反對派中多數，這說明禁烟派勢力是薄弱的。但道光帝受銀荒、兵弱的威脅，傾向禁烟派，看到林則徐奏文稱『鴉片流毒天下，爲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大受感動，決定嚴禁，任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往廣東查辦鴉片。

投降派——
穆彰阿首爲

這一派人勢力最大，人數最多，主要是滿洲貴族，道光帝最信任的首席大學士穆彰阿暗中主持，爲本派首領。他們反對弛禁，因爲他們不單依賴於鴉片貿易，而且還依賴於這個貿易的偷運性質，與英印政府利益一致。他們又反對認真嚴禁，以免喪失大宗收入。他們以『有傷政體』來反對妥協派的合法輸入，以『聖朝寬大』來反對抵抗派的嚴刑禁止，形式上表示寬嚴得中，實際是外國鴉片商的代理人。當道光帝傾向於抵抗派的時候，他們暗中破壞烟禁，等到英國侵略者佔領定海，道光帝動搖時，他們公開打擊林則徐，割地、賠款、開放海口、鴉片無限制輸入，迎合英國當時最大限度的需要。這一派人在統治階級中佔領導地位，本身利害與外國侵略者相符合。伴着外國侵略的逐步深入，他們的賣國事業也逐步發達，從穆彰阿開始，繼承人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段琪瑞、汪精衛以及國民黨反動集團的領袖，百年來一派相傳，逼迫中國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六節 轟轟烈烈的禁烟運動

林則徐是中國封建文化優良部份的代表者，又是滿清時代維新運動的重要先驅者。他在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與黃爵滋、龔自珍、魏源等結宜南詩社。這一小詩社中人，黃爵滋發動禁煙運動，龔、魏發動維新思潮，林則徐成爲他們的首領，他後來探詢外

情及畫圖製造新式船廠，思想上是早有某些基礎的。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林則徐正在湖廣總督任上，首先實行黃氏主張，捐廉配製大量煙丸，強迫吸食者戒絕。一面大舉搜查，繳獲煙槍五千五百餘桿，土膏一萬二千餘兩，兩湖禁烟大見成效，增強他的自信心，奏稱：『查看輿情，並非不可挽救』（『查拏烟販收繳烟具情形摺』）。道光帝得奏，以為『所辦甚屬認真』，十一月（公曆十二月）任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查辦鴉片事件。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以來口頭上喧譁的禁烟法令，開始變成實際行動了。

（A）嚴厲的禁烟（一八三九年二月至十月——道光十九年正月至本年九月）

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則徐在往廣州途中，原來贊成弛禁反對嚴禁的兩廣總督鄧廷楨，放棄舊主張，寫信給林則徐立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願『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從此鄧廷楨成為第二有力的禁烟派首領。中國官吏慣用『虎頭蛇尾』的方法，取賄賂，起初禁令森嚴，爾後被訛者示威，等到貪慾滿足，禁令即成具文，義律懂得這一慣例，住澳門觀察形勢。不料林則徐是特殊的官吏，有決心禁絕鴉片，在路上密劄廣東官吏按清單嚴拿『包買之黨口，說合之孫氈（harbourer）』，與販各路之奸商，護送快艇之頭目』（『正月密拿漢奸劄』）。二十五日（三月十日）林則徐到廣州，英國老鴉片商查頓見勢不佳，逃離中國境。伶仃洋面之躉船二十二艘（每艘存鴉片一千箱上下），

企圖開船停遊，被林則徐派水師制止。

二月（三月十八日），林則徐傳集伍怡和等十三洋行，宣佈諭帖，令轉諭各洋商公司人等報明存煙實數，諭帖中聲明：『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斷無中止之理』。滿清官吏表示如此堅決的意志，百餘年來鴉片商不會見過，義律無法推諉，來到廣州，但仍取觀望態度，暗中反抗繳煙，指使老鴉片商顛地夜間逃滬。林則徐查明截回逃人，按照『違抗封鎖』等例，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派兵嚴密圍守洋館，撤退沙文（Savary，即所謂買辦），斷絕躉船與洋館往來交通。義律大窘，陸續交出全部鴉片二萬一百餘箱，值英金三百萬鎊，核銀約八百萬兩或銀元一千二百萬元。林、鄧、怡良（廣東巡撫）三人會奏：『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如蒙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損辦，不敢開銷』（『夷人躉船鴉片盡數呈繳摺』）。

繳煙是何等嚴重的大事件，林則徐很順利地做成了。一眼看鴉片禍害的道光帝，以為『外夷』畏懼『天朝』，因而發生虛驕心。但他另一眼看的是鴉片利益，禁煙成功對他和大部份的統治階級是有損害的，因而發生鄙吝心。至於繳煙將發生何種後果，他在精神上絲毫不曾作準備。他的虛驕心，表現在林則徐奏摺上硃批『卿之忠君愛國酸然於域中化外矣』、『所辦可嘉之至』一類的話上；他的鄙吝心，表現在十餘萬斤茶葉錢讓郭、鄧等私人捐辦，不問錢從何來，只要不動用公款，樂得『照所議辦理』。義律、郭子立、瑪彭阿這些老奸看透他的弱點。侵略者從外面用輪船大砲來對付虛驕心，投降派

從內部用『勞師糜餉』來對付鄙吝心。事變演進全出他意想之外。從三月（四月）起，他在投降派陰謀影響下，開始表示動搖，此後他左右搖擺，虛驕心招致戰禍，鄙吝心造威慘敗。

三月（四月）林則徐、鄧廷楨會同水師提督關天培督率文武官員收繳鴉片，驅逐外國鴉片商，查拏吸煙販烟人，深得廣東人民擁護，進行極順利。各省禁烟運動受廣東影響，相繼發展起來，鴉片貿易確是可危了。道光帝突然下一道嚴諭，斥責禁烟的官員，說『其弊不可勝言』，禁止收繳『民間烟土烟具』，『嗣後各省拏獲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繳烟土烟具入奏』，他諷譏笑那些自首戒烟的人說：『何必呈繳烟具以自表其改悔』？這一道實際停止烟禁的上諭，主要是打整禁烟最嚴的林則徐。林、鄧見前途危險，懇求道光帝堅持禁烟政策，說：『無知蚩氓，相率傳訛，轉幸明諭之頒，冀遂深藏之術。若因此頓更大局，非獨前功可惜，更虞挽救無方。且風聞外夷於呈繳之後，知內地民人烟可不繳，不無反唇相譏者，於國體尤有關係。臣仰蒙委任，專辦此事，下懷實深焦急』（『瀝陳民間烟土煙具仍宜收繳片』）。道光帝不聽。這是投降派對抵抗派第一次打擊，取得勝利。

四五兩月（五六兩月），林則徐收繳全部鴉片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在虎門灘上燒燬（公曆六月三日開始，至二十五日燒畢）。當時『各國洋商，聞風來觀，作文紀事，頌中國之政』（『聖武記』），『該夷人等，咸知一一點頭，且皆時時掩鼻

，旋至臣等廠前，摘帽歛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誠」（林、鄧等會奏「銷化烟土一律完竣摺」）。這一偉大行動，是以林則徐爲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國人民純潔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堅決性，一洗百餘年來被貪污卑劣的官吏所給予中國的恥辱。六月三日，是中國人民值得紀念的一日。投降派方面也在五月中（六月底）擬出一個「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由道光帝公佈。章程所定刑罰極嚴，條文極密，似乎政府決心禁烟，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訪拏，不許旁人訐告」，這等於保證官吏有權貪污，鴉片癮者有權吸食。抵抗派山西巡撫楊國楨奏稱：「在官人役及官親幕友長隨人等，託足公門，勢必互相容隱，巧爲彌縫，請變動新例，准軍民人等告發」。道光帝下諭批駁，言語支吾，說不出「不許訐告」的理由。祇能依恃君權硬說：「所請軍民告發之處，格礙難行，着毋庸議」（『東華錄』）。這是投降派對抵抗派第二次打擊，取得勝利。

鴉片貿易是英印政府的重要財源，是滿清官吏的巨大弊竇，又是數百萬販烟吸煙人的生活命根，禁絕鴉片決不像林則徐所想所做的那樣簡易，這是很顯然的。林則徐的才能、道德，在當時自然是第一流，但閉關時代的傳統知識，限制了他不知道中國以外的世界，而且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樣，抱着「天朝聲威」可以「留服夷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一類自高自大不識時務的舊見解。在與外人實際接觸中，林則徐逐漸改正舊思想，開

始從林無知進到探求新知，從嚴禁鴉片進到獎勵通商，他的思想是在向進步方面變化中，因為思想裏包含保守進步兩種成份，不多的進步成份便獲得某些成效，濃厚的保守成份使他終於鹵莽致敗。

林則徐不同於一般保守份子的特色，就是他願意瞭解外國國情。『聖武記』說：『林則徐至粵，良日使人刺探西事，繕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沿海文』說：『林則徐也說：『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因此『必須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他積累材料，編成『四洲志』草稿，敘述各國歷史、疆域、政治等情況。他的友人魏源根據『四洲志』編『海國圖志』（道光二十四年初版），『魏源詳備，日本明治維新，受『海國圖志』影響甚大。其餘如汪文榮著『紅毛英吉利考略』（道光二十一年出版）、楊炳南著『海錄』（道光二十二年出版）、徐繼畲著『瀛環志略』（道光二十八年出版），都比『四洲志』後出。林則徐是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有這些逐漸增加的新知識，對外態度，顯起變化。例如魏英女王維多利亞照會初稿中說：『汝海外夷人，敢於侵犯天朝，實屬罪不容誅，今姑先予警告，如能悔罪輸誠，尚可曲宥，否則大兵所至，汝區區三島立成灰燼矣』（漢蘭德，『清室外紀』）。這表示對世界情況的完全無知。第二次照會（一八四〇年一月）十九年十二月發）改爲『向開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欲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並開來粵之船，肯經頒給條約，有不許攜帶禁物等語，是貴國王之政令本屬嚴明，祇因商船衆多，前此

或未加察，今移文照會，明知天朝禁令之嚴，定必使之不敢再犯。區別英政府與鴉片商，留出交涉餘地，比初稿確有進步。西人『澳門月報』說：『林則徐留心外國事務，觀其知會英王第二封書，足見其學識長進之效驗』，這是公正的批評。雖然『天朝』、『蠻夷』等舊觀點並未改變，但多少有異於盲目辦外交的流輩。

林則徐對外國鴉片商堅持強硬態度，令進口各船出具『永不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的甘結。他的第一理由是『貿易一事，該國（英）之國計民生皆繫於此，斷不肯決然捨去。若果英夷憚於具結，竟皆歇業不來，正米利堅等國之人所禱祠而求，冀得多取此利者』。『會奏轟擊夷船情形摺』。他的第二理由是『論者或恐各夷商因此（具結）裹足，殊不思利之所在，誰不爭趨，即使此國不來，彼國豈肯不至。縱或一年偶少，次年總必加多，且聞華民慣見夷商獲利之厚，莫不欲羨垂涎，以爲內地民人，格於定例，不准赴各國貿易，以致利藪轉歸外夷。就此察看，則其不患無人經商，亦已明甚矣』。『附奏夷人帶鴉片罪名應議專條夾片』。他看出英美間矛盾，又看出華商與外商間矛盾，不怕英國也不怕各國商人停市挾制。尤其是商船往南洋一帶販茶，獲利倍蓰（『聖武記』），使他更有恃無恐。同時各國商船，主要是美國商船，具結進口，帶來洋錢一二百萬元，呈『近年頗爲罕見』的新現象。林則徐獲得這些成效，愈益堅持不具結不准進口的主張。投降派奏請道光帝免鴉片商具結，說『雖責以萬分切實之結，亦將甘心出具，徒開含混之路』，這是代表義學及貪污

官吏的意見。因為當時法律已經承認『如有鴉片，將貨物盡行沒官』，對『人即正法』字樣，則堅決拒絕。在義律清楚懂得『熟烟係一時之事，具結乃長遠之事』。林則徐調走後，『貨盡沒官』，要用大賄賂使成具文，已是對禁烟退讓一步，『人即正法』，要用更大賄賂，實不甘再讓。在貪污官吏獲得『貨盡沒官』甘結，足夠借端勒索，飽填慾壑，不再希望『人即正法』的權利，認為禁烟應該就此結束。林則徐也懂得這些情形，却以為『夷情最重信字』（『會奏諭辦英夷情形摺』），『夷人最重然諾，即議一事，訂一期，從不爽約，其視出結之事，絕無僅有，非比內地公牘結多而濫，以致視為泛常』（『覆奏責令夷人出結甫經遵依片』）。他看到侵略者的小信，沒有看到小信所掩蓋的大詐，企圖強迫出具『人即正法』甘結，藉外人的守信來肅清鴉片來源。

林則徐堅持『貨盡沒官』，『人即正法』的主張，英國以外各國商船全部具結進口，少數英國商船也願具結，被義律武力阻止，中英交涉表面上爭『人即正法』四字，實際是義律為代表的鴉片集團（包括英印政府、中國投降派、中外鴉片商販及吸食者）與林則徐為代表的禁烟集團（包括禁烟派及中國人民）作生死的鬥爭。鴉片集團方面，義律口頭表示退讓，說：『義律在粵有年，此次並無別心，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溫和而已』（『七澳門同知書』）；暗中仍『潛賣鴉片』，準備武力（林、鄧會奏『九龍洋面轟擊夷船情形摺』）。投降派散佈謠言，對林、鄧污蔑陷害，『始而風影訛傳，繼且歌謠遠播，以查拿為希旨，以掩捕為貪功，以偵緝為詭謀，以推鞠為酷罰，甚至誣以納賄，目為

營私，譏廷議爲急於理財，營新例爲輕於改律」（鄧廷楨等奏），又「假託姓名，臚列款項，向內外衙門投遞揭帖，希冀代奏」（『東華錄』）。當時道光帝的主要傾向還在禁烟一面，宣稱「林則徐、鄧廷楨皆朕親信大臣，現在查辦鴉片正在吃緊之時，斷不可因羣言淆惑，稍形懈弛」，支持了禁烟集團。禁烟集團方面，林則徐據理駁斥義律各種飾詞，揭破一切狡計陰謀，在義律面前，不是遵令具結，就是武力解決，再沒有其他妥協途徑。道光帝在投降派影響下，給林則徐一遭諭旨，「着林則徐、鄧廷楨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務使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爲妥善」（五月『上諭』），就是說，如果海疆有事，林、鄧該負不妥善的責任，這無異啓示義律以開邊釁，並預留林、鄧未來的罪名。林、鄧面對投降派所設陷阱，毫不畏縮，一面指明「義律藉邊釁暗爲恫嚇」（林、鄧奏『審察敵情摺』）一面積極籌備戰守。林則徐察看海口形勢，安設木排鐵線，添置砲台砲位，購西洋各國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大砲二三百尊，排列兩岸，又整頓水陸官兵，號令嚴明，聲勢壯盛。水師提督關天培認真操練，用舊洋船作式樣，令兵士濱習攻首尾、強中給諸法。一向腐敗販烟的水師，轉成勇猛耐戰的精兵。沿海岸及海中小島嶼，派兵防守，帶大量毒藥，必要時投入溪泉，使大洋中敵船不得汲取飲水。林則徐抵抗侵略者最特出的方法，尤在於始終相信「民心可用」（『答徐廣縉問馭夷書』），他說：「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外國鴉片商）命而有餘」（二月『諭各國夷人呈繳烟土稿』），又說：「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莊不但正士端人，銜之刺骨，即漁舟村

店，亦俱恨其強梁，必能自保身家，圍練抵禦。彼見處處有備，自必不敢停留」（七月林、鄧奏「審察籌備摺」）。這種依靠民衆的正確思想，大異於一般統治階級的疑民心理，這是他真心對外的證明。當他在禁烟期中，不僅信任普通人民，而且還信任所謂「貪利亡命」的烏龜蛋兵。招募漁蛋丁壯五千人，每人發月費銀六元，贍家銀六元，「取平時所裝大小火船，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領以一二兵弁，餘皆僱用此等民人以爲水勇，先赴各洋濱分投埋伏，至夜深察看風潮皆順，一齊放出，乘勢火攻，焚燒匪船夷船」（「燒燬匪船以斷接濟摺」）。後來中英開戰，水勇成水師的重要助手，立功不小。

林則徐籌備戰守，確盡了最大限度的心力，在「民心可用」的信念下，擁有未曾發動的兩廣無限人力。對外貿易方面，外國商船進口超過往年的總數，可以購買新式船砲，船堅砲利，英國不能獨擅其長。林則徐備具這些條件，又採取「以守爲戰，以逸待勞」的戰略，廣東海防不可否認是鞏固的。但道光帝既不派遣得力官員防備廣東以外各海口，又不許林、鄧動用廣東庫款，設防募勇等費，全由洋行、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林、鄧只希望他「明降嚴旨，切責臣等務將夷船新烟，查明全繳」，不敢請求撥用款項，怕觸動他的鄙吝心，會放煙禁烟，傾向於被降派。

廣東防務的效力，從軍民反抗精神表露出來，林則徐的領導也起着極大的作用，下列事實，說明人民是齊心的，兵士是能戰的。

五月（七月一日），英船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林則徐嚴令義律交出兇犯抵罪。義律抗不交兇，聲稱：「違兩主之明諭，不准交犯，按照本國之律例秉公審辦」。林則徐斥為「謬妄」，勒令交兇按中國法律懲辦。任雙方交涉中，林則徐駁義律稟文有「天朝以大字小，不得率將「相和」字樣寫入稟內」等語，否認中英尚平等地位，自然是不識外情，妄自尊大，但義律堅執「照本國律例審辦」，有意破壞中國主權，更屬恃強不法。林則徐令洋商通事勸導英國商船具結進口，並不因懲兇交涉妨礙合法貿易。英船三十二隻，停泊外洋，被義律阻止，所載洋米、洋布、棉花等貨，潮濕霉爛，損失至巨，不敢進口卸貨。鴉片船混入船羣中，私放三板，潛赴偏僻口門，用木片作招帖，寫明鴉片一個，洋銀幾元字樣，隨潮流入海口，誘人偷買賤價毒貨。義律借懲兇交涉擴大事態，企圖爭取治外法權，繼續鴉片貿易，正義顯然在中國方面。七月（八月），林則徐下令「禁絕英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對英人罷市、罷工的結果，義律及英商無法在澳門居住，退到海面貨船上，託澳門葡人出面調停，但仍拒寫「人即正法」甘結。中英關係惡化，責任全在義律為代表的鴉片集團。它採用各種手段來破壞烟禁。七月下旬（九月七旬），竟試圖武力威嚇。義律率兵船一隻，武裝商船十隻，突然向九龍山口岸巡船三隻開砲，巡船奮勇回擊，岸上砲台發砲應援，交戰十小時，擊翻英方雙桅飛船一隻，擊死英兵至少十七名，中國兵死二傷六，英船逃回大洋。八月初（九月中），水師兵勇又燒燬鴉片躉船一艘，向來中國水師不敢接仗，英船「安假礙於船旁，畫礙限於船板，虛張聲勢

，粉飾觀瞻」，就嚇倒做優自大的「天朝」，這次交戰，不料被少數巡船擊退，義律自知威嚇無效，要求繼續談判。自然，談判難關仍在「人即正法」四字。

道光帝接得林則徐等奏報，硃批：「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這似乎支持了林則徐的強硬態度，但稱「正當抵抗為『孟浪』」，對「人即正法」的爭執不表示明確意見，所謂「後德」，又是含糊其詞，投降派就潛伏在這些含糊詞句後面，等機會驅逐抵抗派。

(B) 堅決的抵抗（一八三九年十月——道光十九年

九月至一八四〇年八月——道光二十年七月）

林則徐、義律雙方態度都極堅決。九月（十一月初）底，英商船兩艘遵令具結，義律派兵船兩隻到穿鼻洋面阻止，不許進口。林則徐派水師保護英商船一艘進口（一艘逃去），英兵船開炮來攻，水師提督關天培親督兵勇回擊，激戰兩小時，英兵船一艘受傷，戰敗逃走。從九月底到十月初（十一月），中英接仗七次，中國俱獲全勝，當然，這些勝利是微小的。但當時中國軍隊是怎樣一種軍隊呢？將校士卒是一羣烏合的無賴流氓，炮是一二百年前的舊炮，火藥是三分錢一斤的火藥，主要武器是弓箭刀矛。澳門新聞紙論中國武備說：「中國之武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及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說而已。其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衆，未必有一千人合用。其師船之樣，若待我等或米利堅之兵船，在一點鐘之久，即可趕散各師船。中國敵外國人不過

以紙上言語，真可謂之紙上王國矣。這樣的軍隊，經林則徐整頓，居然打了七次小勝仗，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成績。

林則徐積極籌備戰守，但並不專恃武力，他的策略是：『苟知悔悟，儘許回頭』，『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他國貨船遵式具結者，固許進埔，即英國貨船，亦不因其違抗於前而並阻其自新於後』（會奏『屢次轟擊英夷船情形摺』），這就是全力禁阻一部份英國鴉片商，既不牽涉其他合法貿易，也不拒絕鴉片商悔悟自新。道光帝自九龍山獲勝後，虛驕心增強，穿鼻洋戰前數日，下諭『斷絕大黃茶葉，永遠不准交易』，要停止英國一切貿易，正中義律的好謀。林則徐奏稱：『具結之船，不宜與觀望營私之他船一例辦理，以示區別』。道光帝恰接到七次戰勝的奏報，竟正式下諭：『即將英吉利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其甘結。着出示曉諭各國，列其罪狀，宣佈各夷』，並批斥『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說：『同是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這種謬妄的指導，完全破壞了禁烟計劃，擴大了戰爭危機，而且替義律懲罰了具結進口的英商船。林則徐當然不敢違抗上諭，十一月一日（十二月六日）起，遵旨封港，斷絕中英通商關係。

義律及英商居住海上，生活困苦，義律投遞稟帖，大意說：『請准許英國商人眷眷等復得回澳門居住，至英國茲時所求，惟欲仍作正經貿易，凡事欽遵大清律例而不違本國制度，俾可兩為同存也』。林則徐不敢違旨重開交涉，只好嚴詞駁斥，有：『現奉大

皇帝諭旨，永斷爾等貿易，將種種狀明白宣示各國，業已欽遵辦理等語。既不許通商，又不留體面，世界第一強國的英吉利，必然將藉口蒙受辱害，發動武力侵略。道光帝却以為禁烟事了，調林則徐為兩江總督，要他去整頓政府重要收入的漕務，諱稱：「林則徐已放兩江總督，現雖專辦此事，豈能常川在粵？即鄧廷楨統轄兩省，公務煩多，亦不免顧此失彼。仍當通盤籌畫，辦理結實，俾日後淨絕根株，方稱一勞永逸。」林、鄧會奏也以爲派一道員駐劄澳門，「督同澳門同知等查辦夷務，稽察澳夷橫船，斷絕英夷冒混，緝拿漢奸接濟」，就可以「一勞永逸」。事實却不是這樣容易，迫使道光帝改任林則徐爲兩廣總督，任鄧廷楨爲兩江總督，旋又不得不改任鄧廷楨爲閩浙總督，因爲福寧水師收受陋規，包運烟土，廈門成走私大海口。這說明英國絲毫不放鬆鴉片貿易的利益，但滿清君臣並未意識到戰爭已迫在目前。

道光帝停止中英貿易，從中國方面說，自然是絕壽有利。禁烟時期，各國商船（英國除外）進口特別增多，截至十一月（十二月），廣州到船六十二隻，美船佔四十五隻，帶來現洋將及二百萬圓（會奏「察看英夷反覆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摺」）。白銀外溢一變爲白銀輸入，這使道光帝自信停止貿易是有效的政策。大官僚曾望顏代表極端閉關主義者，奏請封關禁海，無論何國夷船，概不准其入市。這樣荒謬的建議，正合道光帝的志願。即時寄交林則徐等，意思是要他們照辦。停止中英貿易已經造成大錯，何況停止各國貿易，與世界爲敵？愚昧自大，閉關排外，是當時指導外交的主要思想。林則徐比

較明白外情，奏稱：『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違抗者損之，恭順者亦損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此中控御之法，似可以夷治夷，若概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這一反對意見，被道光帝採納，因此戰禍限於中英兩國。

中英停止貿易，從英國方面說，自然是絕對有害。英印兩政府歲入總額六分之一，從對華貿易取得。英國輸入華貨，每年收關稅四百二十萬鎊，其中茶稅佔三百六十六萬鎊。印度輸出鴉片，每年收關價二百萬鎊，佔印度歲入十分之一（戰後增至七分之一）。貿易停止，英印政府損失六分之一的收入，無法彌補，這是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英國對華正當商業，如茶、棉、毛、紡織等，營業驟然停滯，銀行利息上長（中西紀事），並影響到英國布疋對印輸出，因為英國布疋在印度很大部份的消費是靠鴉片生產為轉移。

販茶利益被美國奪去，呢羽鐘錶等貢品，法國向粵海關聲明願多製貨物，來粵貿易。國際商業的競爭，更威脅英國既得的商業霸權。所有這些原因的總和，便產在英國的武力侵略——鴉片戰爭。這個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同時也改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面貌，廣大的中國加入世界市場，使英國工廠數目空前增多起來。英政府看到目前損害與未來的利益，決心為開放市場而戰爭。

一八四〇年二月英政府任命印度水師提督喬治義律 (George Balfour) 為對華談判全

權大臣，作爲用兵的第一步驟。陸軍大臣答覆國會質問時提出三個理由：第一、報復中國政府對英國領事及商民的侮辱；第二、賠償英商所受的損害；第三、保障英商身體財產的安全。至於不體面的鴉片偷運應否停止，英國政府並不願考慮。四月，英國會開會辯論，議員中也不乏公正議論，經三天激辯終，於以九票多數通過軍費支付案，正式派遣侵略軍。當時侵略軍海陸兩部總數不過一萬五千人，陸軍歸喬治義律統率，海軍歸伯麥（Barnell）統率，乘軍艦二十六艘，載大砲五百四十門，於六月（道光二十年五月）間陸續到達廣州口外海面。老大的封建帝國，在侵略軍威脅下，暴露了它的極度腐爛性，因此遭到意外慘重的失敗。

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他的言行中，絲毫不會畏懼英國的船堅砲利，他極畏懼的却是掌握政權的腐爛勢力。事實也是林則徐在軍事上不敗於英軍，而在政治上敗於道光帝的謬亂指導和投降派的陰謀破壞。

道光三十年五月初（一八四〇年六月初）英兵船四艘游弋於廣州口外，保護鴉片商船，『日則開放三板，分運烟土，引誘奸民，零星賤賣（比禁烟前減價十分之七）；夜則拋錨寄碇，並招集辦艇（華人賣食物用具小船）環護，支更瞭望，以防我兵火攻』（林則徐：『焚剿夷船擒獲漢奸摺』）。英陸軍大臣在國會宣佈出兵理由是『中國政府侮辱侵害英國，若不出兵，不但損國威，辱國體，實大不列顛民族之大恥辱』，似乎正義全

在英國方面。不過這些辭句並不能掩飾武裝販賣鴉片的事實。林則徐對抗侵略者首先是發動民衆，他頒發『英夷鴟張安民告示』內稱：『英吉利夷人本多狡詐，且以鴉片害我民人性命，騙取內地資財，當亦吾民所共仇共憤……本部堂今與汝等約，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凡殺白頭鬼一名。賞洋銀一百元，殺死黑鬼子一名，賞洋銀五十元。一個官員敢於允許『人人持刀痛殺』侵略者，在統治階級看來，實是駭人的措施，林則徐却看作最可靠的力量。雖然『夷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爲』的估計是可笑的，但『以守爲戰，以逸待勞』（『密陳夷務不能歇手摺』），利用民力，在持久抗戰中爭取勝利，並不是無理由的空想。他利用民力，確實達到頗高的程度，水上有水勇、蛋民、漁戶、引水及『素諳夷語線民』，陸上有鄉勇、團練及自願持刀殺敵的民衆，水陸到處與侵略者爲敵。英船在內海，必需雇引水領路，官府據引水探報，得知英船行動。線民『假裝濟夷辦艇，作爲內應，配合各隊水勇火船，出其不意，縱火焚燒夷船』。英船被火攻以後，不敢停泊在一處，『每日東飄西泊，莫定行蹤，夜更游弋不停，深恐我兵復用火船潛往燒燬』，對漢奸也不敢信任，洋船之漢奸，皆爲英人所疑忌，盡遣去（『聖武記』）。船上缺淡水，『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劉小島汲取又『夷兵汲水受毒，患病者甚衆』。英船在外洋不知陸上虛實，『遇見內地出入之鹽船、商船，卽潛遣三板攔近，探詢官兵消息，迨內地各船駛近口門，則又不敢追問』。在這些情況下，英軍無隙可乘，企圖封鎖廣州海口又不遂，乃成坐

困之勢。伯麥得本國訓令向中視北部活動，六月初（七月初），率艦隊三十一艘北駛。五艘攻廈門，被鄧廷楨督水勇施以火攻，英軍戰敗逃走。二十六艘攻陷浙江定海縣（舟山島）居民多避難內地，英軍伙食無多，費用浩煩，犬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錢一圓，謀誘回居民，取得食糧，但很少人受騙。七月（八月）底，留粵英軍進攻澳門附近關閘一帶，林則徐、關天培督水陸兵勇猛烈回擊，接仗至三四時辰之久，英軍敗回外洋。

投降派以定海失陷為契機，全力攻擊林則徐，本來動搖的道光帝，更轉到投降派方面。正當林、關在關閘戰勝之時，道光帝下嚴諭斥責林則徐，說：『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相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從此抵抗派得罪，坐待處罰；投降派大得勢；英國侵略軍無阻礙地橫行南北海疆，收獲意外的勝利。

禁烟失敗的主要責任不在林則徐而在投降派和道光帝，咸豐帝宣佈穆彰阿罪狀的上諭裏已經論定了。此後任何嚴肅的歷史學者無不同意這一論定，因為它符合於當時的事實。過了一百年，國民黨內反動集團依然保持着穆彰阿的投降路線却無恥地顛倒是非，諛頌投降派是『知己知彼』的『愛國者』，詆林則徐是『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的『偽善者』。這種抹煞事實的謬說，絲毫不能證明林則徐為首的抵抗派是錯誤了，相反的，投降派及道光帝被確證為禍國殃民的負責人。

林則徐原定計劃是禁絕鴉片，獎勵合法通商，如果道光帝不停止中英貿易，英政府對華軍費案未必在國會通過，因為正當工商業者的利益與鴉片貿易並不一致。雖然英政府決不放棄鴉片利益，無論何種藉口，它定要發動戰爭。滿清政府腐敗落後，即使不因鴉片啓釁，它仍不免淪為半殖民地。但就鴉片戰爭本身說來，却是道光帝促成的。林則徐給其妻鄧夫人家書裏說：

「外間悠悠衆口，都謂我激起夷憂，殊不知實出聖躬獨斷，屢頒嚴旨，謂不慮諸臣操之過切，只愁諸臣畏之過甚耳。予明知禁烟妨礙奸夷大利，必有困難，而毅然決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蓋以身許國，但求福國利民，與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尙付諸度外，毀譽更不計及也！」

這所說的，家書中不是所謂「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也決不是推諉自己的責任。他所稱「聖躬獨斷」，實指停止中英貿易而言，這正是促成戰爭的重要原因。

林則徐籌備海防，道光帝置身事外，絲毫不給以財政上的援助。募集兵勇，添造快船，製備新器械，購買外國大砲，修築砲台，都「不敢請動帑項」（「尖沙嘴官涌添建砲台摺」），惟設法向當地富商募集。他在「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裏說，「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砲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尙形棘手」！他不僅指出了過去的錯誤，還希望補救於將來。在同片裏他說，「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

此處製造以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要可以酌籌，卽裨益實非淺鮮矣。這裏已有韓大才等需工業的意圖，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對於這種意見，道光帝批示說：『一片胡言』。當時投降派的主張是『內地船炮非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這種守舊消極思想，和林則徐所代表的思想正是顯著的對照。

英國信託軍調達廣東，林則徐就『飛咨閩、浙、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飭屬嚴查海口，協力籌防』（『英夷續來兵船情形片』）。道光帝據奏報之也『屢經降旨，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不過這些督撫，除了鄧廷楨，不是投降派首領（直隸總督琦善、兩江總督伊里布），便是『形同木偶』的腐敗官僚，從浙江到直隸，海岸『毫無準備』（『東華錄』）。林則徐深知無法挽救，給鄧夫人信裏說：『而今英夷兵船來華，既不能在粵思逞，必然改竄他省；他省海口皆無設備，苟有疏失，則該督撫必然謾罪於余之惹啓夷變焉，則是非亦祇可聽之公論而已』。他這箇『必然謾罪於余』的預見，定海失陷後完全實現了。

投降派配合英軍向林則徐進攻，對道光帝大進讒言，說『夷兵之來，係由禁烟而起』，『上年廣東繳烟，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至激變』，『鄧廷楨廈門軍報不實』，尤其陰毒的是誣譏林則徐接受萊吉利國王文書，私自銷燬，引起道光帝震大疑忌。林則徐處在猛烈的謠言攻勢下，奏請『欽派大臣來粵查辦』。道光帝決心投降，給他一個『看汝以何詞對朕』的訓斥。林、鄧雖失勢孤立，但直到被革職為止，還繼續在粵閩堅持抗

英。

腐爛的滿清必然遭受失敗，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林、鄧抵抗派受滿清政府支配，失敗也是必然的。他們禁烟並未成功，但值得被中國人民紀念和尊敬。這首先是由於他們懂得抵抗侵略必需依靠民眾這一真理；其次是不畏任何困難，富於堅決頑強的精神。投降派對人民探仇視態度，對侵略者探不抵抗政策，正和抵抗派走相反的道路。

第七節 投降派第一次『勝利』

(一八四〇年八月——道光二十年七月至一八四一年二月——)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

投降派有兩個基本思想。第一、卽林則徐所說：『夫震於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豔其富』(林、鄧會奏『審察敵情摺』)。第二、卽蔣湘南所說：『世方奇貨之居，人向染指之願』(『與黃爵滋論禁烟書』)。換句話說，就是英國不可抗，鴉片不必禁。在本時期內，上起道光帝，下至一般烟民烟販，形成龐大的投降集團。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代表這個集團出面實行投降主義的交涉。

(A) 出面求降的直隸總督琦善

六月初(七月三日)，定海失陷，道光帝開始恐慌。七月(八月)，決定採取投降

政策，敕沿海督撫，遇洋船投碇，即收受馳奏，企圖在受書所在地辦理交涉。英兵船五隻、火輪船（當時輪船，只作通訊船用）一隻到天津海口，他恐慌更甚，但求敵船退歸廣東，一切都可商議。琦善的任務在如何退敵，下圖就是他的退敵法。

英船投遞「英政府致滿清宰相抗議書」，說明出兵理由是反對停止通商。對販賣鴉片，說是英國少數人違禁行爲，大英國主不願包庇。對林則徐在粵舉動，說是「某官憲奉大清皇帝之欽命，殘害實信之英人，強迫、凌辱大英領事」。在毫不留情地攻擊多年來粵省官憲收受規銀、助運鴉片、不法已極、大清政府開一眼鑒遠人犯罪、閉一眼不察官憲犯罪以後，提出六條要求：（一）償給貨（鴉片）價；（二）割讓一島或數島；（三）兩國文書平等往來；（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烟之船牽累正當商人；（六）廢止洋行商把持勒索並賠還欠款。當時英國主要要求在平等通商，補償損失，對鴉片價諱緘貨價，足見自知不名譽，可能有意作一定程度的讓步。天津道陸建瀛建議，「嚴持禁烟爲名，以鴉片烟之至不至，決數事之許不許」，這是合理的交涉方針，琦善以爲「書生之見」，拒絕採用，與道光帝、穆彰阿密定一套卑劣的辦法。

琦善在答覆英軍統帥喬治義律信裏，把一切責任推給林則徐（後來着英訂南京條約同樣歸罪於林則徐）說：「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體大皇上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瞞，措置失當，必當逐條查明，重治其罪」。所謂「林等」，是指林則徐鄧廷楨等抵抗派，英國侵略者還不便提出這樣的要求，清政府却保證重治其罪，也就是保

謂恢復鴉片貿易，作爲『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的條件。侵略者自然滿意，約定『中堂若赴廣東，我等即可永遠和好』。八月（九月），英船退往廣東，道光帝命琦善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並諭沿海各督撫：『洋船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炮』。

（B）懲罰抵抗派、開放烟禁

英船在天津時，喬治義律等二十餘人赴琦善宴會，『嘻笑怒罵，有舞洋槍飛刀於坐上者。琦善隱忍受辱』（『中西紀事』），禁人傳說。向道光帝卻報稱：『情詞恭順，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山東巡撫托渾布奏報洋船過境，『各人向岸禮拜，情形極爲恭順』。九月（十月），洋船到浙江，欽差大臣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洋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洋會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貿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仇林總督而來耶』（『聖武記』）？洋人肆行侮辱，投降派說具衷情恭順；洋人自稱『斷鴉片可』，投降派保證重辦林、鄧，從表面看來，似乎是一片囑語，實際是中外協調，因爲祇有這樣，才能恢復鴉片貿易，解決交涉的中心問題。

道光帝根據琦善恭順的奏報（兩江總督裕謙函奏稱『英人呈遞書字，語句狂悖』，大受訓斥）來懲辦林、鄧，表示自己的『大公至正』。八月（九月），林則徐偵知英兵艦五艘在磨刀洋，派副將陳連升率兵船五艘載兵勇三千人往攻，英艦戰敗逃走，撈獲英兵

死屍十餘及軍器軍旗若干。道光帝得報，斥爲「貪功啓釁，殺人滅口」。不久，下一漢諭旨說：「林則徐、鄧廷楨在廣東查辦鴉片，將逾兩年，尙未絕除根株，轉致該夷赴京畿呈訴冤抑，成何事體！已將該總督誤國病民、辦理不善之處，降旨宣示。」林、鄧既被加以「誤國病民、辦理不善」的罪名，自然應該受處罰，於是接着又下一道諭旨說：「英夷船隻游弋沿海，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諸省征調紛紛，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辦理不善所致。林則徐、鄧廷楨均交部分別嚴加處罰。」林、鄧得革職處分，聽候琦善查問差遣，同時任命琦善爲兩廣總督。這是投降派整套陰謀的大成功。林則徐還想作最後請求，想去蘇回定海，奏稱：「倘蒙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他的辦法是「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爲壯勇，陸續回去該處，詐爲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道光帝當然不理，在他反對「羈縻」（投降）的警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下面，硃批道：「汝云英夷試其犟鳴，是汝亦效英夷犟鳴於朕也。無理可惡！」這樣蠻橫的詞句，目的在恫嚇林、鄧及其他抵抗派，不敢再有所論爭。

林、鄧革職，等於禁烟運動從此結束。十月（十一月），道光帝頒佈開放烟禁的上諭，很巧妙地說：「上年頒發新定章程（即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嚴立科條，寬予期限（一年六個月戒絕），……薄海內外，必已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咸知畏法自新。

……卽日限期屆滿，或以無知觸法……是在內外滿漢諸臣，訓諭督催，不遺餘力，轉瞬限滿，無一藐法干罪之人，用副除惡務盡之意。照章程規定，「吸食之案，止准官弁訪拏」，官弁不訪拏，那有「藐法干罪之人」，鴉片也就「永絕根株」了。

(C) 放手賣國的兩廣總督琦善

十月(十一月)，琦善到廣州，首先替英人「代伸冤抑」。在義律先後繳烟印文裏，查不出林則徐的罪狀，便詰問磨刀洋襲擊，何人先開炮，既是襲擊，不待問是廣東本師先開炮，他要斬決副將陳連升向英謝罪，發令指使的林則徐自然罪名也不小。這備荒謬的主張，被衆人反對，不曾實施，廣東水陸軍却從此解體。

琦善辦理外交的方針是「一切力反前任(林則徐)所爲，謂可得外洋懽心」。在軍事上實行撤防，裁減兵船三分之二，舵工水勇全部遣散。撤去海口內木排鐵鍊；任令英軍派小船探測內河水道，陸續起出水底暗樁及載石沉船，不許軍民禁阻。在政治上實行獨斷，自稱專辦夷務，省城文武官員不得參與謀議，連廣州將軍阿精阿、巡撫怡良那樣的高湖貴族也被擠退，因爲這些人受林則徐影響，曾經出力禁過烟。他把人民看作多是漢奸，未到省之先，就預定「廣東省城漢奸充斥，舉凡一言一動，罔不潛相窺伺，爲夷人私通消息」。到省後，蔽塞自己的耳目，以「防制」漢奸，「凡有報緝漢奸者，則詞曰：『汝卽漢奸』」。有探報洋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

外洋情事」」。他唯一親信，往來雙方傳話的所謂「通曉夷語八品銜鮑鵬」，是什麼人呢？是老鴉片商頭地的買辦兼變賣，因販賣鴉片，被林則徐訪擊，逃到山東，得托渾布推薦，變成琦善的心腹要員，一切交涉全由琦善、鮑鵬二人商辦。義律對鮑鵬，「言語倨傲，勤加訶斥」，鮑鵬對琦善，裝模作樣，危言恫嚇，琦善對道光帝，說話連篇，促成投降，道光帝對英軍，希望「克情恭順，自動退兵，送還定海」恢復禁烟前舊狀。作為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實際是義律的代表（所謂「始終為義律乞恩」），在欺騙威脅甚至賄買下，琦善完全滿足了義律的要求。

琦善撤防以後，義律宣稱：「若多增兵勇來敵，即不准和」。琦善違命不敢增調防兵。義律令琦善承認前在天津提出的六條，並指索香港及鴉片賠款七百萬兩。琦善一在口頭上承認，但不願出具文件。雙方爭點在如何割讓香港。琦善主張暗割；義律主張明割。義律宣稱「戰而後商」。十二月（一八四一年一月），英軍進攻沙角炮台，守將陳連升無援戰死，琦善聲言：「我不撤兵，必為彼所敗」，下令撤退各炮台守兵。英軍長驅直入虎門，操督關天培發炮抵抗，派專人回省城哭求增援，文武人員合力代求，琦善一概不理，連夜寫信派鮑鵬往川鼻洋見義律，秘密訂立賠烟價、割香港、開放廣州、兩國公文對等往來等四條草約（川鼻草約），英軍停止進攻。

「瞞上不瞞下」是中國官僚重要的辦事方法之一。琦善主張暗割香港，就是允許英國自由佔領，自己當作毫無聞知，日後被人揭發，不過得「失察」處分，政府也必然承

認賊成事實。可是義律定要滿清政府公開割讓，這使琦善陷入窘境，不得不正式奏請，又不得不造出一些重大事變，要求批准。沙角及虎門各炮台被攻，堅決不發援兵，是否故意造成失敗，以便訂立文據（琦善在刑部供稱：『因救急無策，僅允代奏給與香港地方寄居』，又在奏摺中捏稱：『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實際並無一人參與），當時有人懷疑『此中曲折情形』，不是沒有理由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一八四一年二月），琦善兩次會見義律，只許鮑鵬一人在旁，行跡詭秘。道光帝令靖逆將軍密查有無受賄情形，後來抄沒家產入官，足見受賄的傳說不是沒有根據的。香港就這樣被琦善出賣了。

第八節 清政府的『對英宣戰』

（一八四一年二月——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至一八四二年八月——道光二十二年七月）

（A）決心宣戰的原因

41
琦善在天津答覆喬治義律信裏說：『欽差大臣林等受人欺賤，則斷項烟價，又將着舊何人賠繳』，就是說，要林等及欺賤者賠繳。他到了廣東，找不着誰是欺賤者，林等又窮無所有，而煙價七百萬元又必需支付，這是第一個出乎道光帝意外的痛心事，也是

決心用兵的主要原因。琦善捏奏：「英毒自知懊悔，願繳還定海並獻出沙角炮台，請准其就粵東外洋之沙角地方，泊舟寄居。」道光帝並不知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以爲荒僻小島交換定海、沙角是琦善「委曲從權」的「苦衷」。那時候他已經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往廣東聽琦善調度，準備示以聲威，大加懲創，取消烟價賠償。不料怡良揭發琦善私割香港，島上駐兵早被驅逐，居民早被逼令歸順，作爲英國國民，全出道光帝意想之外。他賠錢失地，計劃落空，怒不可遏，一變投降態度爲強硬。正月初（一月二十九日），以英吉利索價烟價、請給碼頭爲由，宣佈討伐令，「着伊里布剋日進兵，收復定海；並着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並表示「烟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朕意已定，斷無游移」的決心。中英兩國正式進入交戰狀態。

中英戰事，中國稱爲鴉片戰爭，英國稱爲通商戰爭，按照戰爭的起因說來，自然是由於禁烟販烟雙方的利害衝突，但在林、鄧革職以後，戰爭起因完全不存在了。道光帝所宣佈、英國所進行的戰爭，它的性質，在英國方面是奪地詛款的侵略，在滿清方面，雖說是反抗侵略，但反抗意識却非常薄弱，如果煙價有人（「欺詐者」）賠繳，定海真正送還，道光帝決不會爲「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而戰，是順而易見的。他出動兵力，原想「彼時該夷恐懼乞憐，再由該將軍等酌量情形，代爲奏請」，把敵人看作一嚇即倒的弱者。交戰結果，大出他的意外，發現自己是弱者，他趕快停止反抗，又採取投降政策。

滿清猜忌漢人，軍權和外交權絕不輕授漢員。林則徐因適逢禁烟，得「欽差大臣」名義，在他看來，確是「生逢盛世，蒙皇上特達之知」（「與鄭夫人書」）了。但大小行動必須奏報請求批示，勇餉、防費不敢動用庫款分文，權力是極其微弱的。琦善及其他滿員就完全不同，他們可以謊報軍情，調用弁兵；可以侵蝕餉銀，浪費庫款，即使被人揭發，仍能獲得皇帝的信任和庇護。對英戰爭的慘敗，不止是兩國強弱的懸殊，滿人排斥漢人，膽大妄爲，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B）廣東方面的戰事

（一八四一年一月至七月——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至六月）

道光帝調集各省綠營兵一萬七千名，派皇姪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往廣東協同琦善「剿辦逆夷」。這些兵將都是分路陸續前往，無計劃的到廣州集合，因此廣東軍事可分爲琦善、楊芳、奕山三個時期。

琦善力主割讓香港，奏稱：「地勢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這是徹底的投降主義，但主戰的道光帝，毫無實際準備，憑自己的虛驕心，妄想「一鼓作氣，克服海隅」，受挫以後，同樣成了投降主義者，並不比琦善勇敢一些。琦善因爲面對敵軍，不管道光帝痛罵促戰，他總是堅持投降。二月初（二月二十五日），英軍進攻虎門炮台，提督關天培率兵死戰，琦

將不發援兵，關天培及將弁兵士四百數十人戰死，虎門失陷。上年林則徐所購西洋炮二百門，全被英軍佔有。虎門敗後，琦善鎖鑰入京。廣東戰事由楊芳主持。

楊芳是著名的內戰健將，因屠殺大量漢回人民有功封侯爵。對外戰事，他是投降主義者，在路上就奏請割香港，理由是『給與堆貨』。他改換字面，請『准令英屬之港脚商船在粵貿易』。『港脚』是印度各埠的統稱，准印度來船貿易，等於准英商貿易。道光帝下諭嚴斥，說『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楊芳得革職留位處分。三月下旬（四月十四日），奕山到廣州，主持廣東軍事。

奕山，也只有奕山，具備着結束廣東軍事的資格。他在統治階級裏地位極高，被看作有極大權威的人物，他都失敗了，誰還能說不該投降呢！滿清政府政治、軍事、民族一切反動性，通過這樣的人物，才充分體現出來，因此才招致充分的失敗。

奕山等首先是反對廣東軍民，『嚴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而不用粵勇。官兵擒捕漢奸，不問是非而殺之。粵民久不平』。他們又疑忌外來弁兵，用親信滿人西拉本、岱昌等當大將，『將各省之兵，互調分配，各離營伍。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嘩，全無紀律。所發鹽菜口糧，厚薄不均。令十五兵共一帳房』。他們又縱兵殺掠，以收買兵心：『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為漢奸，或劫其財帛。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雜入其中，肩挑擔負，千百成羣，竟行遁去。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應付回省，反以迫逐洋鬼迷路為詞，當事者猶以衆兵追敵放賞』。奕山等招美女日夜飲酒

作樂，軍官們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奔走鑽營，求製辦火藥木料等肥差，千把以上軍官都在城內，不到營伍中去。這些都是當時人可靠的記載，只有隱諱，決無誇張，滿清對外作戰的將軍與軍隊，就是這樣不堪的腐朽物。

道光帝責成他們『分路兜剿，務使該夷片帆不返，俾知傲畏。倘夷船聞風遠遁，空勞兵力，惟該將軍等是問』。這真是駭人的夢囈！英國方面得知道光帝宣戰，派陸軍少將臥烏古（Hugh Gough）、海軍提督巴爾克（Barker）率大軍增援，定海英軍也集中廣東，共有兵船五十六艘，半泊香港，半入虎門，船上插『出賣鴉片』的旗幟，與鴉片販交換食糧銀錢以充軍餉。奕山和隨員們以爲，『不戰則軍餉無可開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於傲倖一試。四月初（五月二十一日），英軍全部駛進虎門，準備進攻，奕山恰恰選定同日分三路攻擊英軍，遭英軍反擊，紛紛潰退。英船到天字碼頭放空炮數聲，守兵逃散。泥城、四方兩炮台，不戰失陷。英軍據四方炮台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奕山等面無人色；因英軍散布流言，說『專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乃下令：『官兵自城外退回，關門准進；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希望得些保護。英軍連發大小炮，城中兵民死傷無數，奕山等決計投降，在廣州城上豎起白旗，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向臥烏古行三跪九叩首禮，呈奕山求降書。臥烏古提出休戰條約五條，奕山等大喜接受，戰事停

止。
廣東地方這次所謂中英戰爭，前後凡七天（五月二十一夜半至二十七日）。英軍

步炮兵約二萬四千人，戰死十四人，負傷九十二人。滿清軍兵勇約三萬五千人，死傷不知確數。戰爭中破壞最顯著的是英軍搶掠十三洋行。它是滿清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實際執行者，如代官吏索賄，措勒物價，把持貿易，包運鴉片等一切阻礙正當貿易的惡劣行為，都是洋行在政府支持下作為合法的專業，被搶以後，全部破產，標誌着封建特權被外國侵略者擊破了。

按照休戰條約，一週內交給英軍贖城費六百萬元，英商館損失三十萬元。贖金繳清，奕山等率外省兵退駐六十里以外，英軍歸還所奪砲台，退出虎門。奕山搜括庫款四百萬及商、民私財，照約實行。英軍陸續退去。

四月初八日（五月二十八日）。廣州解嚴。奕山奏稱：「初八日焚擊痛剿，大挫其鋒」，保薦大批有功員弁；又奏：「義律窮蹙乞撫，止求照舊通商，並將歷年商欠清還。已暫准其與各國一體貿易，從前商欠業已代為清還」。道光帝諭稱：「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大敗改作大勝，投降改作受撫，賠款改作代還商欠，批准投降改作准令通商，一羣阿Q們居然大獲「勝利」。

阿Q們自稱勝利，引起人民及抵抗派廣泛的不滿，道光帝在輿論的壓迫下，曾令林則徐「馳赴浙江軍營」，並指明：「如有摺奏，林則徐毋庸列銜」，就是說，不准他表示意見。甬江總督裕謙傾向抵抗派，很尊重林則徐。五月（七月），英船在浙江洋面遊弋，道光帝怕林則徐鼓勵裕謙「妄動生事」，又怕抵抗派引證廣東軍事要求起用他，決計

先發制人，給林、鄧安上戰爭失敗的罪名。他下諭說：鄧廷楨「懶惰因循，不加整頓，所設排練，空費錢糧，全無實用。以致該省兵丁柔懦無能，諸多畏葸，思之殊堪痛恨」；又說：林則徐「既知兵丁染習甚深，便應多方訓導，勤加練習，其於夷務亦當德威並用，控馭得宜，乃辦事諸未妥協，深負委任」。根據這些莫須有的罪案，把林鄧「從重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卽由該處起解，以爲廢弛營務者戒」。奔山也用同樣的方法，說：「此次洋船開入省河，俱是漢奸引導，業經傳諭鄉勇分路搜殺多名」。實際上是收買地主武裝，冤殺人民多名。因爲眞漢奸有英人保護，他們是不敢殺的。按照「粵民皆漢奸」的成見，被殺者自然是表示不滿的「粵民」。

阿Q們鎮壓人民和抵抗派，只能堵人之口，到底不能服人之心。他們又採取一套欺騙手段來製造上天保佑海疆平靜的謠言。六月（八月），道光帝宣佈：「據奔山等奏請撤兵，分期啟行，已明降諭旨照議辦理，並諭令沿海各督撫酌量情形，奏請撤兵矣」。奔山又奏：「海風陡發，擊碎英夷房寮碼頭（香港），夷船被風吹沒無存，偶留船隻，又皆桅舵俱折。該夷等惡貫滿盈，竟違天譴，從此夷虜震懾，不敢再有覬覦」。道光帝據奏宣佈上諭說：「仰蒙昊蒼垂佑，淹斃夷匪漢奸不計其數，帳房寮篷，吹捲無存。所築碼頭，坍爲平地，掃蕩一空，浮屍滿海」。上天眷顧毀滅香港，怎樣答謝呢？他頒發大燄香二十炷，令奔山等「分詣各廟宇虔誠行禮，答謝神庥」，並許保薦文武數百員。這一羣愚頑的騙子正在大顯神通、得意忘形的時候，英軍攻陷廈門，進取浙江了。

(C) 閩浙方面的戰事再起

(一八四一年八月至一八四二年三月——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二年二月)

英政府接到川鼻草約，認為義律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不能全部實現致滿清宰相抗議書中所提各條件，是辦理不善，任命璞鼎查 (Pentel) 代義律為中國貿易正督官，協同在華海陸軍，武力壓迫清政府訂立正式通商條約。七月（八月）璞鼎查到澳門，率大小軍艦二十六艘，兵士三千五百人向北出發。六月間（八月），道光帝已諭令沿海各省裁撤防海兵勇，兩江總督裕謙得廣東方面探報，知道英國新調軍隊要進攻浙江，奏請免撤防兵。道光帝替英國辯護說：『該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且果別有思逞，斷無先將傳播透漏之理』。結果仍着裕謙『遵前旨將江浙調防官兵酌量裁撤，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這說明他在思想上絲毫沒有戰事再起的準備，行動上似乎儘可能給英軍以便利。他最親信的投降派首領穆彰阿是否暗助英人，——是無可疑的。

本期戰事可分為三種戰敗形式：(一) 顏伯鸞廈門抗戰；(二) 裕謙定海抗戰；(三) 奔經結束戰事。

顏伯燾

門抗戰

顏伯燾是極端排外主義者的代表，代替鄧廷楨做閩浙總督。到任以後，反對琦善、楊芳的『主款』，鄧廷楨的『主守』，提出進攻的主張。他造戰艦五十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添築砲台三座，鑄新砲一千尊，準備到大洋上與英軍角逐。道光帝下令『撤兵省費』，水勇全數遣散，空船空砲等於廢物，但他仍派多數水兵出巡外洋。七月初（八月二十五日），璞鼎查率大軍突襲廈門，顏伯燾急調水陸軍守鼓浪嶼，戰鬥相當激烈，擊沉英軍火輪船、兵船數艘，守將江繼芸以下將領戰死多人。鼓浪嶼陷落，廈門又陷，顏伯燾收集潰兵，退守同安縣。不久，英軍退去，顏伯燾奏稱失地收復。

顏伯燾虛驕自大，意氣用事，一戰即敗是必然的。不過他比投降派還是好得多。他力排所謂『撫局』，認真籌備防務；戰時身臨前敵，親自督戰；戰後自認『喪師辱國』，報告軍情，不甚虛捏，——在當時應該說是難得的官僚。

裕謙定

海抗戰

兩江總督裕謙是滿洲貴族中堅決主戰的唯一人物。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一八四一年三月），英軍調往廣東，裕謙收回定海。鎮海農民擊退偵察隊二十餘人，捕得副船主等英人二名，裕謙在奏摺中敘述屠殺俘虜的情形說：『活剝其皮，以爲奴才馬韁；生抽其筋，以爲奴才馬韁，……再行凌遲梟示』。又令定海軍民發掘英人墳墓，在街上焚燒屍體。他如此野蠻殘忍，充分表現了地主官僚的殘暴性。不過『英軍踞定海，虐使定民，用法嚴酷，殺人者先以刀割裂其皮

，納入水鏢，周身灌注，遂活剝而懸焉」（『中西紀事』），英國侵略者却也並不比裕謙更文明更人道些。八月（十月一日），英軍攻定海，漢奸、投降派宣稱英軍是來『報剝皮掘屍之恨』，並非破壞大局。因為裕謙是滿人，沒有被道光帝懲罰。

英軍艦二十九隻火輪船兩隻進攻定海，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率守兵五千人血戰六晝夜，力竭戰死，定海再陷。中英開戰以來，定海抵抗最力，英軍受創不小，把鼓浪嶼的軍隊都調來增援。當時香港兵力單薄，裕謙請求道光帝轉令奔山進攻。奔山等每月開銷軍費三十餘萬兩，大飽私囊，奏稱：『香港地方洋人並不久居』，又稱：『守爲上策，攻戰次之』，完全拒絕進攻的上諭。裕謙及提督余步雲率兵四千守鎮海。余步雲是內戰老手，號稱『宿將』，對外却毫無戰意，說『家有妻女三十餘口，可憐』，不
等英軍來攻，先在招寶山懸掛白旗。裕謙召集各營將士對神立誓：『不得以退守爲詞，離卻縣城一步；不得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紙』。英軍攻招寶山，余步雲逃走。鎮海城守兵，不戰自潰。裕謙投水死。寧波守城兵勇望風潰散。久居天津的大鴉片商鄧子立『出示安民』，管理寧波城。清軍退守曹娥江，以防衛紹興。

奔經結
東戰事

顏伯濤戰敗了，裕謙戰死了，敵軍侵佔寧波大城，快要席捲江南財富之區了。道光帝怎樣來挽救這個危局呢？他只能重複一番廣東方面的舊套，其他辦法是不能有的。

九月（十月），道光帝任命皇姪奔經爲揚威將軍，文蔚、特伊順爲參贊大臣，牛鑑

爲兩江總督，軍隊由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陝西、甘肅等省零星深調，陸續前往浙江集合，重走着過去的舊道路。

奕經等到蘇州，藉口籌備軍務，搜羅美女，勒索供應，酗酒賭博，作威作福，駐紮三個月，不會檢閱一次軍隊。宿遷人臧紆青建議：『浙江老兵不可用，除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招集山東河南江淮之士勇萬人，及沿海漁鹽梟販，江湖盜賊二萬餘，分伏三城（定、鎮、寧），城中伏鄉勇爲內應，水陸並攻。以南勇爲北勇之目，以北勇爲南勇之膽，惟用散攻，不動大隊，不刻期日。陸路伺敵出入，水路各乘風潮，逢敵即殺，遇船即燒，人自爲戰，使彼出沒難防，而後以大兵蹙之』。臧紆青的戰略思想是樸素的人民游擊戰思想。陸上水內隨時隨地擾擊敵人，等到敵人窮困，用正規軍配合游擊軍進攻，敵爲客，我爲主，敵勢孤，我勢盛，敵寡我衆，敵勞我逸，確是弱國戰勝外國侵略者的有效方法。奕經表面同意他的建議，但不實行他的計劃。

十二月（一八四二年一月），奕經做一個夢，見到『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第二天早晨他宣佈吉兆，文蔚隨聲附和，自稱夜間也做了同樣的夢。二人大喜，決意用兵。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月），奕經帶着同夢的文蔚進駐紹興，留不做夢的特依順守杭州。當時大雨大雪，所備火船薪草，都淋濕不堪用。三城兵勇佈置，要二月中旬才能辦妥。各路委員要求延期半月，奕經堅不肯等待，指定二十八日（四月八日）恢復三城。一個做倖速勝的夢，把『原議分伏散戰之法，一變而爲排陣對戰之法。』臧紆青的作

戰計劃，全部被破壞。

奕經、文蔚的速勝計劃如下：奕經率兵勇三千駐紹興，作爲後援。文蔚率兵勇二千駐慈谿城北，副將朱桂率兵勇二千駐慈谿城西，目的是鎮海。提督段永福率兵勇四千伏寧波城外，余步雲率兵二千駐奉化，目的是寧波。鄭鼎臣率水勇圍定海。奕經以爲內應擒縛英人，三城唾手可得，嚴令各軍不許攜帶火器火箭，只准用刀矛短兵。二十八日各路兵勇冒雨夜間出發。英軍探知奕經用兵計劃，早有佈置。段永福軍五百人入寧波城，與英軍巷戰，死傷過半，段永福督大隊到城邊時，得知英軍有備，立即逃奔，不回防地，直走紹興。余步雲軍半路上潰散。浙江老兵不可用，又不帶火器，攻寧波軍就此一潰了事。朱桂軍派河南土勇五百人攻鎮海城，英軍應戰，城外招寶山亦開炮轟擊，土勇退回慈谿防地。英軍跟踪反攻，朱桂率兵勇四百抵禦，文蔚拒發援兵，朱桂戰死。文蔚帶少數滿州隨員連夜逃遁，沿路重賞轎夫船夫，愈快愈好。前繞各營因失主將，陸續潰散。二月初（三月中），奕經、文蔚逃回杭州，捏奏「漢奸勾結鄉勇倒戈相向」，「文蔚大營被漢奸焚毀，烟焰蔽天」。其實一天以後，英軍才到空大營，擄獲輜重器械無數。又捏奏攻鎮海軍全軍覆沒，脫回僅七人，其實僅七人受傷。又捏奏慈谿英兵登陸一萬七千人，其實僅二千人。諸如此類，無非虛張敵人聲勢，表明自己戰敗無罪，最後奏請「暫不蠲廢」。道光帝據奏，認爲「俱係實在情形」，決計投降，下諭「不許進兵，並不許擒斬洋人。兵勇殺一黑洋人卽行正法，並治官弁之罪」。三路中僅鄭鼎臣水勇在定

海大有殺獲，被嚴令解散。奕經與奕山同樣，經過輕舉妄動，一觸即潰，喪膽乞降三個程序，結束了浙江軍事。

第九節 清政府的求降難

(一八四二年四月至七月——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至六月)

突經戰敗後，道光帝停止募調新兵，立即派遣投降派首領耆英、伊里布「馳赴浙江，相機籌辦，設法羈縻」。他給奕經的諭旨裏說：「該將軍惟當協力同心，攘外安內，切不可再失事機也」，譯成真實話，就是要安內（當時民間已發生起義和騷動），不要攘外，要奕經協同耆、伊，切不可失去投降的機會。道光帝抱着投降的誠意，英國侵略軍却毫不理會，繼續向目的地南京前進。

(A) 乍浦失陷——希望「解仇通好」

定海是英軍侵略長江流域的根據地。英軍決計收縮兵力，攻取南京，乃於三月下旬（五月七日），放棄寧波。突經奏稱：「大兵進攻寧郡，逆夷畏逼，紛紛竄退，現在派員收復」。四月初（五月中），英軍守招寶山，放棄鎮海城。突經又奏稱乘機暗襲鎮海，大獲勝利。道光帝獎勵這種欺騙，藉以維持崩潰着的「天威」。當時定海英軍只有兵

船四隻，兵士千餘人，香港只有兵船十四隻，兵士千餘人。浙粵人民自願奮勇出襲，火攻洋船，奪回兩地，都被奕山、奕經禁阻，說是『恐觸其怒』。英軍根據地有靖逆，揚威兩個將軍替它看守，放膽進軍，先攻乍浦。

乍浦是江浙兩省海防重鎮，有滿州駐防兵，平時驕橫放縱，凌辱漢人，當作奴役看待。四月初（五月十七日），英軍攻乍浦，滿人斥漢兵爲漢奸，令守海岸炮台及城郊，自己守內城。陝甘兵竭力抵抗，死三百餘人。英軍攻東門不能勝，轉攻南門，福建水勇受滿人侮辱，不肯力戰，英軍攻入南門，這些駐防軍大都是廢物，束手待殺，很少人敢於對敵，被英軍殺死二三百人（『中西紀事』）。乍浦戰鬥，漢兵確極勇敢，英人分不清滿漢，以爲滿兵敢戰；滿清官吏宣告戰況，影射漢兵所立戰績，替滿人掩飾恥辱，因此某些中外記載，誤認乍浦滿兵是頑強的戰士。漢兵在戰陣上俘獲黑白洋兵十六名，送嘉興城囚禁。伊里布到乍浦，求見郭子立，願送還俘虜，等到送去，英船已開出海口，又送到鎮海，交給招寶山英軍，希望『解仇通好』，英軍置之不理。

（B）求降被拒，失陷吳淞口。

五月初（六月中）英軍攻吳淞口，奕經密令兩江總督牛鑑：『權宜竊賊』。牛鑑派人攜帶禮物往見英將，被拒不得見。牛鑑率三四千人駐寶山縣，提督陳化成守吳淞砲台。陳化成是中英戰爭與關天培齊名的戰將。他備戰認真，自信可以一戰。他請牛鑑軍作

撥，自己督砲台兵力戰，英軍死傷頗重，不敢正面突進。牛鑑陳列總督儀仗，率大隊增援，被敵艦瞭見，發砲轟擊，牛鑑驚駭，拋棄轎子靴帽，混入士兵中亂竄，全軍大潰。英軍登陸，前後夾攻砲台，陳化成力竭戰死，牛鑑一直逃回南京，上海寶山官民逃避一空，兩城不戰而陷。提督尤渤率陝甘兵固守松江，英軍向之進攻，兩次被其擊敗；自上海駕三板小船試探行軍道路，又被崇明蘇州無錫等縣人民聚衆殺逐。英軍怕有力的抵抗，尤其怕人民的抵抗，它是孤軍客軍，必須避免久戰硬戰，因此退出吳淞口。

(C) 長江不守——城下定盟

陳化成戰死，道光帝令耆英、伊里布、牛鑑「馳赴上海相機籌辦」，就是要他們趕快議投降條件。英軍回答說：「現已集兵，不得不戰」。這些投降派仍要求免戰，請指定地點，約期會商，英軍不答，入長江向南京航行。

南京在當時是僅次於北京的大都會，城門鎖鑰歸滿洲駐防將軍掌管，總督有急事夜間出城，不得將軍令箭，不能開門。它這樣被重視主要由於控制長江運河兩大水道，南京失陷，江浙大宗漕米不能北上，北京便成死地。英軍選取這個議降地點，比原計劃進攻京、津更有利，因為數量不大的陸軍不能深入內地奪取一個大國的京城。不過英國兵船要進長江也有極嚴重的困難。長江口非常廣闊，兩岸半為黃泥所掩蓋，大船航行，必需不斷地測量深度，以免遭遇大沙灘。江口到崇明島末端，到處都有沙灘，崇明島到

鎮江，水道十分曲折，鎮江以上還有不少險要。英軍「遣人探水，由沿江一帶上溯安徽至蕪湖爲止，共先後探過七次。每遇險要處，停舟泊岸，周行蘆葦間，不見一兵一將，然後放心前進」（英國副使馬利遜在南京談話）。以牛鑑爲首的地方官吏，就是這樣的一些木偶。投降派認定「該夷船堅砲猛，非兵力所能制伏」（耆、伊、牛會奏），木偶般的不抵抗正是他們最「聰明的」辦法。

投降派不守長江，還有另一種計謀。英軍在寧波、乍浦發出佈告，都說「前往天津議和，遵國王所諭辦理」，這當然是滿清害怕的事。道光帝早已決心求降，在他看來，南京城下之盟，比「天津議和」要安全得多，所以他從不諭令長江設防。紳民請守險要，都被牛鑑駁斥，並且到處張貼告示，說「長江沙線曲折，洋船斷不能入」，勸兩岸居民無庸驚慌。他從上海逃回南京，每天警報傳來，一概不理，却天天派人探問着英的行程。耆英似乎等待着英軍先到南京，態度從容，先在蘇常一帶逗留觀望。被投降派盼望的英軍，因爲水道不熟悉，大船時常擱淺，要等潮水高漲才能駛進，六月初八日（七月十五日）才到達鎮江。

鎮江城形勢險固，居民號稱十萬戶，商業繁盛，無論人力、財力、地勢都可以堅守，阻遏敵船進犯南京。滿洲駐軍副都統海齡把乍浦的舊樣又翻出來，拒絕外來援軍進城，令在城外作戰。駐防滿兵一千餘人，綠營兵六百餘人守城內，寥寥如晨星，守城器械一切不備。禁阻難民遷徙出城，藉口搜索漢奸，不論真假，捕殺無數，造成極大的恐

節相混亂。城外軍抗戰二三日敗走，英軍攻入城內，先攻瀆營。這時候滿兵才拚死地纏鬥。英軍受到堅強的抵抗，損失一百八十五人，爲報復這個損失，大肆屠殺，居民被擄掠燒殺，非常慘苦。英軍這種極端殘酷的手段，和貪慾無厭的鴉片販行動完全相符合。無辜的鎮江人民就在英國侵略者和滿洲統治者雙重摧殘下作了重大的犧牲。

璞鼎查受到意外的抵抗，主張退出長江改往天津，馬利遜精通中國情形，竭力阻止說：『此（鎮江）中國情還明瞭，扼以要挾，必可如志』。六月底（八月初），英兵船八十餘艘到南京下關江面，牛鑑、伊里布通知璞鼎查說：『欽差大臣已奉諭旨，永定和好，不日即可到省』。璞鼎查表示贊受提議，七月初（八月中），着英到南京。

第十節 投降派大『勝利』

（一八四二年八月——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以後）

投降派的投降，侵略者的求戰，實際是相互爲用的。當時人民對滿清廣泛的憎惡以及統治階級內部抵抗，投降兩派深刻的鬥爭，這使投降派必需利用英軍的求戰，才能借『萬不得已』作口實達到賣國的目的。英軍方面專尋抵抗薄弱的地區進兵，以求戰來求得滿意的投降條件。南京正具備方會合的適宜地點。投降派首領穆彰阿公開發言了，他說：『兵與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剿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

惠民，於計爲便」。依據這個賣國理論，耆英、伊里布上了一個「江南民風柔懦，男婦數萬呼號籲救。不若姑允，以保大局」的奏摺；道光帝下了一個「念江南數百萬生靈，一經開仗，安危難保，既經該大臣等稟宜應允，朕亦只可以民命爲重」的上諭。耆英、伊里布又上了一個「璞鼎查貌甚恭謹，詞甚諄切，不得不俯順其請」的奏摺；道光帝又下了一個「當告以大皇帝以誠相待，允准通商，汝國亦應以誠相待，斷不准再啓兵端，違背天理」，「通商和約，俱着照所議辦理」的上諭。南京條約訂立了，投降派大「勝利」了，只是中國人民受了「呼號籲救」的侮辱，封建奴隸又加上了半殖民地奴隸的負擔，災難重重，一百年還翻不過身來。

六月二十八日（八月四日），英軍到下關。七月初三日（八月八日）伊里布、牛鑑接受英方條件。初九日（十四日）耆英全部承認，並奏請批准。二十四日（公曆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正式簽字。從提出到簽字，不曾經過一次會商，滿清政府出賣中國的瘋狂性與英國侵略者的貪殘性，第一次表現在南京條約上。按照條約的規定：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爲通商港口；永遠割讓香港；賠償鴉片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水陸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共二千一百萬元。其餘如海關稅則、保護漢外、保護傳教等條，權利非常廣泛。浙江巡撫劉韻琦論條約的後果說：「夫國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恃以納稅課通貨物者銀也。今法窮於夷，銀盡於夷，雖欲戡兵，其將能乎？」所謂「法窮財盡」，就是中國在政治上主權不完整，在經濟上財物無限止外溢，人

民生益加倍窮困，這恰恰是半殖民地社會的情況，南京條約開始了這種情況。

南京條約對投降派說來，確是大勝利。滿清統治中國的兩個基本工具：武力是旗兵和綠營兵；政治是漢族官吏和紳士。在戰爭中，武力的極端腐敗完全暴露了（比較能戰的綠營兵如關天培、陳化成和定海三總兵都是抵抗派），滿漢官紳間矛盾發展到幾乎破裂的程度（如林則徐、王鼎及廣州團紳不服從官府指揮），道光帝嚇得驚惶失措，他可以壓制抵抗派官紳，但無法禁止軍隊的臨陣潰散。他在批牛鑑奏摺裏說：『儼將士有所窺伺，稍有解體，將成瓦解，可設想耶！』流露出極大的焦急。他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就是『文官愛錢而又惜死，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無鬥志，民有亂心，帑藏空虛，脂膏竭盡』（劉韻珂『致著英書』），岌岌可危的形勢中，在他面前，擺着兩個敵人，一個是英國侵略者，一個是民間抗英反滿正在發生着的革命力量。要挽救滿洲統治的危機，對侵略者投降，保存軍隊來鎮壓革命，自然算是他們的勝利。投降派開始就反對禁烟，從皇帝官負到兵丁差役，都得到鴉片的利益，南京條約絕不提鴉片一字，就是允許無稅大量輸入。『廣州自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後，鴉片整箱運輸街市中，直如非違禁品』（裕威『議和後之中國』）。『鴉片貿易及吸用均成公開，並不隱避，青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見有運烟者往來』（『中華紀事報』）。洋商在通商口岸銷售，奸商運入內地就算『中國貨物』，成爲『各行之首業』，官吏收受陋規，仍恢復戰前的繁榮狀態，這又算是他們的勝利。他們是不是也有些損失呢？沒有的。賠償烟價六百萬

，梁山已用追還商欠名義支付了，南京條約又付烟價、商欠九百萬，數日內由藩庫運庫及民捐（向南京人民勸捐），湊足六百萬元，交給英軍作退兵條件。這種已付未付的賠款，全部要人民額外負擔，政府中人絲毫也不肯揮節自己的奢侈浪費。試看道光帝的上諭說：『所稱商欠一節，除三百萬元由廣東查明商欠追還外，其餘斷難官爲保交』。這就是說，政府擔保向廣東商民勒索三百萬元。上諭又說：『至現議先交之六百萬元，自應付給，以示誠信。除現在民捐一百數十萬兩外，其餘不敷之處，准其暫於江浙安徽滬運各庫，通融借撥，統於捐輸項下還款』。這就是說，庫款只准暫借，要勒逼人民交出捐款來歸還。不許虧短分文。賠償軍費及本國軍費數千萬元，自然用同樣的辦法。他諭各督撫說：『國家經費有常，必應量入爲出（實際是量出爲入），現在軍務緊要，費鉅用繁，尤須妥爲籌畫。在外籌畫一費，即在內省撥一項。着各督撫熟籌良法，即行條議具奏。至應徵一切新舊正雜錢糧，按款依限徵收，毋使短絀』。這就是說，巨大的軍費作爲額外捐款，人民已負的苛捐重稅，不許缺少或拖欠。各省督撫遵照上諭，熟籌所謂良法，不外勒捐和增稅。當時人民的痛苦怨恨，從劉韻珂『致著英書』裏反映了一些。他說：『議餉之款，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紳富捐輸歸款。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若責以賂夷之款，勒令捐輸，勢必不應。若議增糧賦，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賂夷之銀可勒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勒捐』。劉韻珂代表紳富抗議，全部捐款自然落到小民身上。

滿清政府製括財物，那種貪虐無恥，連口頭上理由也是不講的。上海開市，內地商絲運往上海，比戰前運往廣州路近，經過關卡減少，著英却規定：『查明赴粵路程，少過一關即補納一關稅數』。英領事誘華商求免補納，得到的答覆是『定章不能更改』。上海開市，粵海關收入短少，著英商得璞豐查同意，把主要輸出品茶葉每担（百斤）增稅兩倍，次要輸出品棉花每担增稅一倍。原來稅額茶葉每担九錢，棉花每担二錢，已是輕重懸殊，增稅以後，廣東一帶茶葉出口大受摧殘，他不顧這些，只求粵海關收入『有盈無絀』。在內穩彭阿，在外著英，都搜括有『良法』，勝任道光帝的腦和手。

著英善於執行對外國慷慨出賣、對人民無情剝削的政策。他的外交方針是『抑民以奉外』，他的外交方法是『外國人只可討誘，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這些還不夠，他得在文字上給道光帝製造一些體面，什麼『該夷執禮甚恭，情極馴順』，『上持國體，下順夷情』之類，使道光帝有面子來批准屈辱條約。他具備着這一套手段，到廣州訂立下列條約：（一）中英虎門條約（一八四三年——道光二三年）；（二）中美望廈（澳門附近村名）條約（一八四四年——二四年）；（三）中法黃浦條約（一八四四年——二四年）。這些條約中包括片面的最惠國條款、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三個最基本的

不平等條款，確定了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

第十一節 圍繞着鴉片的各種鬥爭

臭穢的鴉片當作中英兩國鬥爭的中心，是十九世紀中期特有的社會現象。那時候，英國資本主義工業正在興旺發展，但並不是絕對強大。在中英貿易上，英國的棉毛織物只抵得中國的湖絲、綢緞；印度的棉花、洋米，遠抵不得中國的茶葉、大黃。英印財政依賴對華貿易，成爲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中國自給自足而有餘，粵海關每年收稅不過百餘萬兩，確是『稅銀何足計較』。中國無求於英，採取傲慢自大態度，英國有求於中，採取隱忍遷就態度，這是很自然的事。中國統治者意識到無限制通商，會招致封建社會的解體，規定禁例，限制或禁止中外交通，如茶葉不得超過五十萬担；大黃不得超過一千担（乾隆時每國限購五百斤）；絲、綢、銀、錢、米、穀、荳、銅、鉛、鐵、錫、硝磺、書籍等物，不准通商，中國商船不准出外洋貿易，洋人不准入內地，洋婦不准到廣州商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表現嚴格的閉關精神。更主要的原因是清朝害怕外國人會扶助很大部份中國人那種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用這種（閉關）方法來使人民不與可恨的外國人發生任何往來。滿清政府（與明朝比較）對閉關政策特別堅持，排外思想特別濃厚，對新事物特別憎惡，對舊經驗特別保守。它不僅爲了保護封建制度，而且還爲了維持異族統治。二百年來少數滿族壓迫漢族的成法，它決不敢輕易修改。

，這使中國的大門格外緊閉起來。英國資本主義的任務是要開闢世界市場，決不允許中國關門，但它的正當商品布疋不能負起這個責任，唯一有效的敲門磚只能用臭穢的鴉片。雖然他們也知道這是『不名譽』的商品。

英國不得不利用鴉片，這表示它資本主義力量還不夠強大。中國統治階級對鴉片，一部份人表示歡迎，因為和他們墮落、荒淫、貪污、無恥一切黑暗腐爛的性質相符合。一部份人表示拒絕，因為他們保持着民族自尊、抵禦外侮的歷史舊傳統。前一部份人數是滿人，後一部份人多數是漢人。鴉片戰事從中英兩邊關係說來，是老大的封建主義社會與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鬥爭，也就是閉關自守與開闢市場的鬥爭。從中國內部說來，是抵抗派與投降派的鬥爭，這一鬥爭表現在思想上成為進步傾向與守舊頑固的鬥爭，表現在政治上轉成滿漢民族的鬥爭。總的結果，英國侵略者、滿洲統治者贏得暫時勝利，中國人民、進步傾向者遭受暫時失敗。

(A) 英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的鬥爭

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者必然戰勝。為什麼？因為他的對手是守舊頑固的、投降主義的、猜忌漢人的滿洲統治者。也就是說，腐爛了的封建主義決不能對抗新興的資本主義。上面所舉事實完全證明了。但英國遭遇的對手，如果是另一部份封建主義者，就是有民族精神的、進步傾向的抵抗派，那末就會改變戰爭形勢。在當時，抵抗派如林則徐、

威紆青以及著書立說的魏源（『聖武記』、『海國圖記』）夏燮（『中西紀事』），都主張發動民衆，『以商治夷』（利用國際矛盾），他們的軍事路線含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外國侵略軍最害怕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戰爭。

英軍的長處是船堅砲利，封鎖港口；它的短處是離本國遙遠，兵力不能過大，給養困難，人地生疎。就長處說，英軍也並不佔絕對優勢，那時候兵船還是帆船，火輪船只供通訊，效用不大。大砲射程比中國土砲遠，確是英軍的特長，但中國購入西洋（葡萄牙）美國大砲，可以對抗。封鎖海口對中國妨礙極微，它不靠航海通商立國，甚至希望永遠閉關孤立。英兵船吃水深，只能停泊洋面，不得中國引水引導，不敢行駛近海，更不敢駛入內河。兵士登陸，必用三板，每隻容十八至二十人，當然不能攜帶大砲。中國防範嚴密，禁止漢奸接濟，它就無法取得大批三板和食物。如果中河海口都採取林則徐的辦法，英軍即使奪得幾個定海那樣的海島，對中國並無大妨害。英軍只有得到中國投降派的應援時，才克服了短處，並獲得超過其長處的過分效果。

中國方面一切落後，不只是船不堅砲不利，但並不等於說，必不能作有效的抵抗。軍事上採取『以守爲戰』，以逸待勞』的戰略，採取『分伏散戰』，水陸並攻』的戰術。用水陸正規軍守海口，水勇火攻敵船，陸勇協助正規軍作戰，團練守衛鄉土。洋兵登陸，任何人得『持刀痛殺』。林則徐、威紆青這種軍事思想，符合於民族戰爭的法則，是很可珍貴的。在林則徐手上，英軍不能在廣東得志，證明這種軍事思想的正確。外交上林

則徐、魏源等強調『以夷治夷』，並非主觀的空想。美法兩國想奪取英國對華貿易的利益，葡萄牙怕英國奪取澳門，願供給中國船炮及新式技術，並通報新消息，這都是事實（『林則徐政書』及『聖武記』）。別一可惜的機會也被投降派放過。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滿清藩屬廓爾喀國（即尼泊尔國）向駐藏大臣稟稱，『小國與底里所屬之披楞部相鄰，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所謂底里即英吉利，披楞即孟加拉，京屬即廣東，滿清政府不加調查，照例子以飭駁說：『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廓爾喀又派使人來商議，仍被『逐一指駁，以杜妄念』。如果中國助兵助餉，聯合廓爾喀攻入鴉片主要出產地孟加拉，至少使英軍有內顧之憂，不敢放膽侵略。上述軍事外交各種有利條件，中國很可以利用來爭取勝利。但投降主義的統治者，他們需要失敗才適合自己的利益，不願利用這些條件。

（B）抵抗主義與投降主義的鬥爭

禁烟初期，統治階級有抵抗、妥協、投降三派意見。定海失陷以前，抵抗派得勢，妥協派一部轉入抵抗派（如鄧廷楨、怡良）。定海失陷以後，投降派得勢，一部份抵抗派轉入投降派（如怡良、劉韻珂）。實際鬥爭的只有抵抗投降兩派，妥協派不起什麼作用，多數轉到投降派方面。

抵抗投降兩派思想上基本不同點在於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上。抵抗派從民族自尊心出發，拒絕外國勢力的侵入，雖然他們也是傲慢自大對世界情況無所知，但在民族遭受危害的時候，他們願意探查外國情況，學習外國技術，這是進步的傾向。抵抗派的路綫，無論戰勝、戰敗或長期戰（多半是長期戰，中英都不甘失敗，要求繼續戰爭），都起着促進中國進步的作用，這樣的戰爭對中國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另一種人如顏伯廉、裕謙，他們形式上類似抵抗派，實際上是極端頑固的閉關主義者，這種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結果就是失敗。投降派從壓迫人民、保持少數人私利出發，他們清楚懂得，只要政權在手，民膏民脂，儘夠剝削，中國遭受任何傷害，對他們私利並無妨礙。不僅如此，中國任何一個傷害，對他們還都是乘機獲利的機會。投降派的路綫，顯然是守舊頑固、阻止生產力進步、依附各國侵略者、引導中國走向殖民地的路綫。這一路綫直到今天還沒有消滅。中國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國主義的鬥爭史。

抵抗派和投降派思想的相反，看下列幾個例證就夠明顯。

同是對外國情形無知，林則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繕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逐漸由無知走向有知；琦善相反，說：『我不似林總督，終日刺探外洋情事』，永遠不願有知。

同是面對外國船炮，林則徐主張抽關稅銀十分之一造船製砲，『師敵之長技以制敵』。道光帝批駁說：『一片胡言』。耆英說：『該夷船堅砲猛，非兵力所能制伏』。南

京訂約後，伊里布到廣東辦善後事宜，道光帝諭令『不得僱用夷人製造或購買輪船』。中美訂約後，美國贈送槍砲圖樣，陸海軍戰術及建築砲台法等書籍，耆英不敢收受。廣州人潘仕成『捐貲延佛蘭西洋官雷壬士於家，造洋船洋砲，又造水雷，能水中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戰船四艘，材堅工巧，悉如西洋式』。這個新式軍需工業的萌芽，是違反政府意志的。道光帝不願民間學會製造新武器，要潘仕成捐獻製成品，實際就是消滅這個萌芽的存在。

同是用兵，林則徐說：『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他主張訓練本地軍隊炮術精熟，不需『遠調百萬貔貅，只供臨敵之一哄』。道光帝恰恰是各省抽調兵丁，雜湊成軍，一聞炮聲，便『紛紛潰散，幾同兒戲』。

可是利用人民，林則徐說：『民心可用』，『號召民間丁壯，已足製其（英軍）命而有餘』。投降派抱定成見，誣義民爲頑民。奕山說：『粵民皆漢奸』；推諉自己的戰敗說：『洋船闖入省河，俱是漢奸引導』。道光帝掩飾無恥的投降說：『朕因億萬生靈所繫，實關天下大局，不得不勉允所請』。

這樣絕對相反的觀點，反映出少數貴族地主與多數普通地主利害的矛盾，同時也反映出統治的滿族與被統治的漢族間嚴重的矛盾。

(C) 滿族與漢族的鬥爭

滿族統治漢族，無時不在危疑猜忌中，尤其是外患臨頭，更增加了疑忌心。統治階級內部以抵抗派首領林則徐爲中心，展開很露骨的鬥爭。

定海失陷，道光帝歸罪林則徐，不久得革職處分。這是絲毫沒有理由的懲罰。奕山在廣東大敗，又歸罪林、鄧，充軍到新疆。當時黃河在河南東部決口，漢軍機大臣王鼎奏留林則徐襄辦河工。照例河工完成，該受重賞，至少要減免充軍罪。恰巧奕經在浙江大敗，道光帝仍令林則徐往伊犁効力贖罪。這是什麼用意呢？投降派把一切失敗的責任推給林則徐，抵抗派要推薦林則徐再辦洋務，道光帝蠻橫地迫令仍往伊犁，顯然是拒絕漢人參與軍事、外交大權。這樣無情的抑漢政策，給漢族官員極大的刺激。王鼎哭泣流涕，送林則徐上路，林則徐也做了兩首詩，有『寶劍還期賜上方』的句子，就是說，要『斬佞臣（穆彰阿）頭』。相傳王鼎回到北京，痛罵穆彰阿，自殺保薦林則徐可大用。林則徐『哭王文恪公詩』有『衛史（史魚）遺言成永憾，晉卿（范文子）祈死豈初心』句，用古人自殺屍諫事相比，可證這種傳說大概是事實。一個漢軍機大臣自殺來反對滿軍機大臣，在官僚社會裏是極少有的異事，足見滿漢鬥爭是如何的尖銳。

南京條約訂立以後，輿論更是嘩然。道光帝爲和緩羣情，玩了如下的手法。

二二年九月（一八四二年十月），『牛鑑着卽革職奪問，由着英派員解京交刑部治

罪』（二四年釋放）。牛鑑只是投降派的追隨者，被革職治罪；投降派首領耆英却做了兩江總督。對粵浙大敗的負責者，僅僅「召奕山、奕經、文蔚來京」，絲毫不負責任。這樣的處置當然不能服人心，不得已又下諭：「奕山、奕經、文蔚均着交部治罪，以示懲儆」。這種手法還是騙不過衆人，他只好宣佈：「奕山、奕經、文蔚鎖繫解京，革去職任，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短時期內接連下三道上諭，三個貴族從無罪到有輕罪又到有重罪，並保證秋後斬首，可說是滿洲統治者對漢族臣僕從來未有的大讓步。於是漢官們受騙了。道光帝却另玩一套手法。

十一月（十二月），宣佈余步雲「見敵即退」的罪狀，執行死刑。「見敵即退」的不只是余步雲，但裕謙却因失援敗死，殺余步雲含有替滿人報復、向漢人示威的意義。預約秋後處決的三個貴族，在這一示威下掩護過去了。二三年三月（一八四三年四月），「賞琦善三品頂戴爲熱河都統」，這個賣國賊也會被輿論壓迫，於二一年六月（一八四二年七月）宣佈過「斬監候，秋後處決」的判決，過了兩個秋後，又抬頭來，經過這個嘗試，「賞文蔚爲古城鎮隊大臣，突經爲葉爾羌幫辦大臣」，把罪惡尤大的奕山留下觀望風色。果然輿論大嘩，由御史陳慶鏞出面，上一本辭氣嚴厲的奏摺，主旨是說：「琦善等三人起用爲刑賞失措，無以服民」。賊膽心虛的道光帝受了反抗，只得厚着臉皮自認一些錯誤說：「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等迄無成功。朕惟有反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誣罪臣工，以自寬解」！這些欺騙性的辭句，目的是要免求琦善等「斬監候

的罪名，他在自己認錯以後，接着說：「琦善、奕經、文蔚均着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賞罰之平。」「斬監候」可以變成「閉門思過」，爲什麼林、鄧必須充軍到新疆？七月（一八四三年八月），他把鄧廷楨釋放回籍，企圖和緩漢官們的不平。漢官們又受騙了，他們是滿洲統治者的臣僕，不可能有進一步鬥爭的勇氣。十月（十二月），道光帝任命「奕山爲和闐辦事大臣，奕經爲葉爾羌參贊大臣，琦善爲駐藏大臣」，漢官們不敢再表示抗議。耆英辦完虎門、望廈、黃浦三條約，賣國工作告一結束後（一八四五年），始釋放林則徐回京，滿洲統治者玩弄權力，制服抵抗派，但不能制服他們的內心。首先是林則徐，他在送鄧廷楨回籍詩裏說：「青史憑誰定是非」，不滿投降派的顛倒是非；又說：「歧路又歧空有感」，不滿清政府的昏亂指導，軍事、外交錯中又錯，錯謬到底。抵抗、投降兩派對立，心理上依然存在。

兩派心理上對立，也就潛伏着滿漢統治階級的裂痕，這對滿洲統治者是極大的不祥徵兆。道光帝與穆彰阿同謀賣國，無法犧牲同謀者來消除這個矛盾。林則徐「答邵懿辰書」裏說：「夫爲國首以人才爲重，然有才而不用與無才同，用之而不使之盡其才與不用同。且當其未用之先猶有所冀也，及用之而不能盡其才，或以文法繩之，猜忌譴之，則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而天下之有才者聞之亦多自阻」（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即則徐死前一年）。書中所說的，完全是他本身的經歷。「天下有才者亦多自阻」也是事實。這個矛盾的嚴重，威脅滿洲統治到如此程度，就是三十年正月（一八五〇

年二月）道光帝病死，臨死遺言：不許配天、祔廟、立功德碑，表示對漢官們懺悔，實際是對漢人作最後一次欺騙。六月（七月），太平革命在金田爆發，滿洲統治者着實驚慌。十月（十一月），咸豐帝硃筆宣佈穆彰阿、耆英罪狀：『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英夷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為腹心，以遂其謀，欲使天下羣黎復遭塗炭。其心陰險實不可問。潘世恩（漢軍機大臣）等保林則徐，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穆彰阿暗而難知，耆英顯而易見。然貽害國家，厥罪惟均』。雖然處罰只是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耆英『降為五品頂戴』，但是非算是論定了。在一致反對太平革命的基礎上，滿漢統治階級又團結合作起來。

第二章 中國人民的反英反滿鬥爭

——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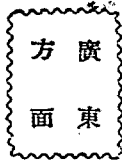
第一節 緒論

上章已經敘述過統治階級怎樣腐敗墮落、投降外國侵略者、大量出賣權利的事實，現在我們該注視中國人民怎樣開始他們反外國侵略、反滿州統治的革命鬥爭了。這種鬥爭不管它是原始的，規模不大的，意識纏糊的，方法陳舊的，甚至有時帶些野蠻氣味的，但必須承認它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開始，也必須承認它有無限的前途。

在英國侵略軍進入中國，滿清政府投降侵略者的同一時候，中國產生了反英反滿的人民武裝。反英武裝一部份是人民自發的組織，一部份與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們的領導。反滿武裝一般是人民秘密的組織。反英武裝發展為反帝運動，反滿武裝發展為反封建（以前的反滿不可能發展為反封建）運動。

第二節 反英武裝鬥爭

英國侵略軍足跡所到的地方，無例外地遭到人民武裝反抗。英軍避免與人民武裝對抗，驟使投降派官吏來破壞反抗，這種方法是暫時收效的，但同時也推動反英反滿鬥爭的發展。



中英衝突的焦點在廣東，英國的侵略，滿清的賣國，在廣東人民面前暴露得尤為明顯，因之廣東人民反英反滿的義憤也特別強烈。

平英團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一八四一年五月），英軍由泥城而上四方砲台，凡所經由之路，曾無一兵施放槍砲者（御史曹履泰奏）。初六日（二十六日），奕山投降英團侵略軍，訂屈辱條約，獻贖城費六百萬元。人民激起熾烈的愛國義憤，準備反抗侵略者。初十日（即公曆五月三十日），英一千餘人退出四方砲台，在城外擄掠，還企圖到佛山鎮擄掠，經過蕭關三元里。廣州城西北十餘里村民鳴鑼聚衆，豎立平英團大旗，攻擊英軍。附近一百〇三鄉（亦稱九十六村，又稱百十八村）男婦民衆數千人（王廷蘭說數千人，一說一萬至一萬五千人，一說數萬人，各書不同）奔集平英團旗幟下，圍英軍數重

。英軍整天冒死突圍不能出，民衆愈聚愈多，殺英兵官二人，黑白洋兵二百餘人。義律率兵往援，又被圍困。義律危急，派漢奸混出重圍，向廣州知府余保純求救。齊山太駭，急令余保純出城，用欺騙威脅手段強迫民衆解散。十一日（三十一日），余保純保護義律率殘兵逃回船上。同時三山村民衆擊殺別路英軍百餘人，獲砲二尊，刀槍五百餘條。佛山鎮民兵在龜岡砲台圍攻英軍，殺數十人，又擊破來援的三板船數隻。新安縣武舉人庾體華組織火船三隊，初四（二十四日）夜半攻襲虎門停泊的大兵船，燒燬一艘，餘船連夜逃走。十七日（六月六日）洋船陸續退出，有大艦擱淺不能動，鄉民羣衆要用火攻，被官所禁止。當時反英起義是廣泛的羣衆運動，三元里平英圍擊勢最大，所圍擊的英軍也最多，這次運動以平英圍擊代表是恰當的。五月三十日那樣光輝的革命發動日，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義律被廣東人民懲創，自覺慚愧，出「告示」說：「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毋再犯」。人民作繳交斥責說：「爾無謂艦砲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何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身拔，而求救於官廡？此次由奸相（琦善）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義律被斥，知民氣旺盛，不敢報復。

平英圍擊代表的民衆只認識林則徐和琦善一流人之區別，還不能認識到滿清是人民的仇敵。在這樣的認識程度上，他們與反英的地主官紳合作起來，甘心作滿清的「子民

。至於一般著述說平英團僅是因英兵「輪奸一老婦人起畔」，那是有意誣蔑或誤信傳聞。平英團有組織，有誓詞（『中西紀事』），決非倉猝烏合。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兩廣總督祁項奏稱：『夷人詞氣傲慢，省城十三洋行原住夷人各水手亦每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搶取貨物，或凌辱過路婦女，均經地方官當時彈壓，尙未激成事端，而士民蓄怒已深，爭欲得而甘心。』這也祇是次要原因之一種，真正起義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英國用武力侵略，中國人民就用武力來反抗侵略。

昇平社學

林則徐在粵曾辦民團和鄉勇。團由紳民自辦，勇由官府發餉。南京訂約後，英人要求進廣州城，紳民一致拒絕，表面理由是舊例洋人不准進城，實際是抗議強迫訂約。官吏怕見洋人，也不願他們進城，對紳民頗表同情。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南海、番禺兩縣『紳士耆老，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爲一甲，八甲爲一總，八總爲一社，八社爲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燈檣旗布爲之一空』（『中西紀事』）。省城附近各鄉設昇平社學公所（平英團一百三鄉組織在社學裏，成爲基幹力量），作爲團練機關。東路各縣設東平社學公所，與昇平社學互相聯絡。這個組織有巨大力量，璞鼎查因而不敢強硬要求進城，伊里布、耆英之流也因而不敢私許英方要求。社學『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唯『宗旨』就是監視官府私許英人進城及其他賣國行爲。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會履泰奏摺所謂

粵民與英夷爲仇讐，卽與地方官爲仇讐，確是實情。伊里布被英方迫促，不敢不許，又被社學監視，不敢私許，憂愁發病死。耆英同樣兩面爲難，他曾用『匪徒滋擾』、『無賴游棍造謠生事』等惡毒詞句誣蔑民衆抗英行動，到底不敢公開反對社學。他是最狡猾的官僚，一面與英人私定兩年後入城的密約，一面運動內調離開廣東。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徐廣縉繼着英爲兩廣總督。當時社學發展情形照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徐廣縉所說，『今城廂內外街之團勇，戶戶出兵，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舖捐資，儲備經費，合計有數十萬金』；又說：城廂社學『居民則以工人，舖戶則以伙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補充。挨戶註冊，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籌備經費，製造器械，添設柵欄。其團勇至十餘萬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卽至小街僻巷，亦皆竭力捍擋，爭先恐後』。這裏可看出城廂社學的嚴密組織和鬥爭情緒。鄉間外縣同樣旺盛，合計人數至少數十萬，真是空前偉大的人民武裝。

社學成立以後，做了多次鬥爭。著名的有二二年（一八四二年）燒洋館鬥爭，起因是『紅毛黑夷水手，在十三行地面，向華民買食水果，不給錢文。賣果者向討，反被該夷用刀劃傷』。民衆不平，攻燒洋館。二三年（一八四三年）反香港開市鬥爭，起因是『該夷欲在香港設立碼頭，希圖華商往來販運，將來出口入口貨物，稅皆出於華商，該夷竟可坐享其利』。社學聯合商人拒絕『與英夷互市』。璞鼎查壓迫伊里布禁止罷市，伊里

布愁死，最後英方只得「允遵照舊章，泊船黃埔，不敢膠執在香港交易之請」。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驅逐廣州知府劉澤的鬥爭，起因是香港總督德庇時帶水兵一千餘人，佔領砲台，將砲眼釘塞，兵船直入省河，要求入城。耆英出告示禁止人民阻撓，人民大嘩，撕毀告示，屢出屢斷。耆英無法，派劉澤到洋船秘密商訂進城日期。被社學偵知，立即發出揭帖，遍貼城廂內外，約定「夷人入城之日，閉門起事」。劉澤從洋船回城，社學數千人攻入府署，燒燬明珠公服。劉澤跳牆逃走，耆英想分化社學，請紳士轉勸民衆，紳士答稱：「衆怒不可犯。吾鄉之民能爲國家効勦力，不願從撫」。社學又出揭帖，約期攻擊城外十三洋行。德庇時怕事件擴大，退回香港。耆英被人民監視，難於放手媚外，不久也退回北京。

最大一次鬥爭是二九年（一八四九年）反進城鬥爭。耆英密約兩年期滿，香港總督文翰（Bowring）帶兵船到虎門外要求履行條約。徐廣縉得社學支持，親到洋船表示拒絕。第二天大批兵船火輪船闖入省河，南海、番禺各鄉社學先後趕來，準備戰鬥。徐廣縉上洋船交涉，文翰企圖扣留他迫使承認進城密約。省河南岸社學呼聲震天動地，等命令即時開戰。文翰恐懼，請「罷兵修好」，不再提出城要求。

耆英這個大賣國賊，當然不會允許社學存在，一心要把它分化以至於消滅，他把社學描寫成：「無事散處田間，有事聽官調遣，法有類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有公正紳士爲之鈐束。近年以來，不惟滋擾府署、與官爲仇者，社學之人，不與其事。即焚燬公

司館與夷構釁者，亦並無社學之入（『駁覆曹履泰奏』）。肯定社學完全是保甲，不與開政治的官辦組織。這個奏摺配合道光帝の上諭，顯然是投降派玩弄大陰謀。那個上諭說：『有人奏，廣州府一帶（昇平社學根據地），土匪劫掠爲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其著名積匪，如香山、新會、順德等處，姓名皆歷歷可數。近來匪徒漸多，地方文武不肯實力查拏，以致農民不安耕作。着著英按名拏獲究辦，務使盜賊肅清，農商安靖。』着革慣於誣踐民衆，如說燒洋館『皆係無賴游棍及俗名「爛崽」等輩所爲。一經查拏，旋即逃散』，『驅逐劉溥是匪徒藉端滋擾，務獲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他企圖根據上諭『肅清盜賊』，來分化社學中上下層。但社學團結得很堅固，紳士也不會受騙分化，雖然被他殺了些人，但投降派陰謀却是失敗了。

福建方面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一八四一年八月），英軍攻佔廈門，顏伯燾逃往同安，『夷人在廈門肆掠，有鄉民陳氏與之接仗。夷衆五千，我兵五百。夷用軍炮，民用抬槍。一以擊十，夷兵死者以百計，傷者以千計。陳氏之死者三人，傷者十二人耳。是以不敢久駐廈門而退屯鼓浪嶼』（謝蘭生：『思忠錄』，『中西紀事』摘引）。這個記載也許誇大一些，但陳氏以主擊客，以多擊少（英兵當是少數），擊退敵人，則可信是事實。

浙江

英軍佔定海鎮海寧波，當地有黑水黨，狙擊敵人。英人在定海用剝皮慘刑對待人民，足證鬥爭的激烈。鎮海鄉民擊退英軍偵察隊，

方面

俘獲副船主噶哩。噶哩口供說：『我船上共有黑白鬼三十五人，廣東漢奸四人，載的烟土洋布各貨向在廣東買賣。二十天前兵頭璞鼎查叫我們同了噶囉三桅船、叮嘛的兩桅船同到浙江洋面，以銷貨爲由，探聽各處海岸防守情形。我們三船就駛到浙江洋面，游弋了五六日，因無人到船買貨，無從探聽消息。缺少淡水食物，望見沿海山坳住有人家，我帶了白黑鬼二十多人，駕坐杉板小船，登岸搶擄，不料岸上埋伏兵民，把我們同咪哈叻（印度人）砍傷擒住。其餘各鬼子也有受傷逃回船上的，就有打落海中的，我沒有看得明白』。這是可信的材料，說明鎮海人民是盡了保衛國土的責任。

江蘇方面

英軍侵入吳淞口，佔領寶山上海，駕三板船向內地游弋，不少人被沿江居民狙擊斃命。後來改走長江，探路到靖江縣城，英兵十餘人被逐逃走。有童子從城上投磚，擊死『白夷』一人。第二天，英船三艘開大炮轟城，靖江人拒戰，用抬槍殺黑鬼十餘，最後擊中敵船火藥艙，一船燒燬，兩船逃去。牛鑑得報告，嚴斥靖江人民『大膽生事』。

英軍攻破鎮江，停船江上。瓜州、儀徵一帶『鹽梟』，攻襲英船，燒燬不少船隻。鹽民是勇敢的戰士，督英等正在進行投降，怕得罪英軍，用『招撫』名義誘騙鹽民。道光帝批准『招撫』的上諭說：『儀徵濱臨大江，曩徒乘間竊發，現在招集頭目，尙就約束，仍當妥爲彈壓，毋任滋生事端。其事平之後，應如何設法解散之處，着斟酌妥辦』。

。民爲了抗英受招撫，招撫了却失去抗英的自由。滿清招撫鹽民，爲了阻止抗英並於事平後解散。在同一上論中說：『沿江各村自相團練，均着照所議妥爲辦理』。就是說，事平後解散。

以上所記，雖然簡略，却說明了一個規律：凡英國侵略軍所到的地方，一定有人民反侵略武裝出來抵抗。馬克思說：『在一切實際事務中——戰爭也是一種實際事務——華人遠勝於一切東方民族』，就是因爲中國人民有這樣一種反抗精神。

第三節 反滿武裝鬥爭

中國人民（漢、回、苗、瑤等族）一貫進行着反滿起義，但滿清政府在政治、軍事上，積蓄了鎮壓人民的豐富經驗和內戰技術，常是獲得勝利。它是生成用來對內鎮壓的一套統治機器，一遇到新的外國侵略者，對內的虎狼突變爲對外的羔羊，它再想在人民面前恢復虎狼的地位是困難了，就是說，一切力量都削弱了。中英戰後，反滿起義蓬勃發生，短短十年，從單純的反清起義，發展到反滿反封建的太平天國革命。

鴉片戰爭的結果，支出大量賠款及經費，洋烟廣泛流行，土烟普遍種植，洋貨低關稅輸入，土貨重關稅輸出。這一切，既破壞社會生產力，又加重人民的捐稅負擔。過去皇帝要裝着『不言利』的假面目，搜括比較暗藏些，現在公開『言利』了。兩三年內，

連下「籌劃經費」、「各支款減平發放」、「開捐輸」(賣官)、「裁浮費歸公」、「查私墾隱賦，勒限照例升科」、「嚴催漕米，早兌早開」、「封禁沿海私灘，嚴拿私梟」等等一大串搜括的上諭。並定出「着賠」、「分賠」、「攤賠」、「代賠」、「溢領」、「覈減」等名目，向官吏搜括，而實際是勳員全體貪官污吏加緊向人民搜括。當然他也要玩些欺騙手段，表示爲民「興利除弊」，例如他指出：「向來完漕紳富謂之大戶，庶民謂之小戶。以大戶之短交，取償於小戶，因而刁劣紳衿挾制官吏，索取白規。大戶包攬小戶，小戶附託大戶，又有包戶之名。以致畸輕畸重，衆怨沸騰」。糾正的辦法是：「所有前項大戶、小戶、包戶各名目，概行禁絕，一律均收」，這其實是一句絲毫不生效力的空話。又如二五年(一八四五年)以「皇太后七旬萬壽」名義，普免(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以前「民欠錢糧」。事實上普通農民決不能拖欠錢糧到五年以上，所關民欠就是紳欠，紳欠免了，官替紳欠挪移的墊款(州縣官每年解交藩庫錢糧不得少於七成)便無着落，他們「懇恩豁免各州縣歷年墊完民欠」，被道光駁斥不准，只好仍向普通農民設法補償。農民反因免欠而加重了負擔。這種破壞生產，增強剝削的措施，促進反滿運動高漲，是很自然的。

閉關時代，皇帝到大小官吏保持着二級高過一級的威嚴，在人民思想裏造成他們不可侵犯的虛象。戰爭中皇帝以及大小官吏對外國侵略者驚慌怯懦，醜態畢露，而外國侵略者，人民是敢於對抗的。這樣，不可侵犯的威嚴是動搖了。抵抗主義爲人民所擁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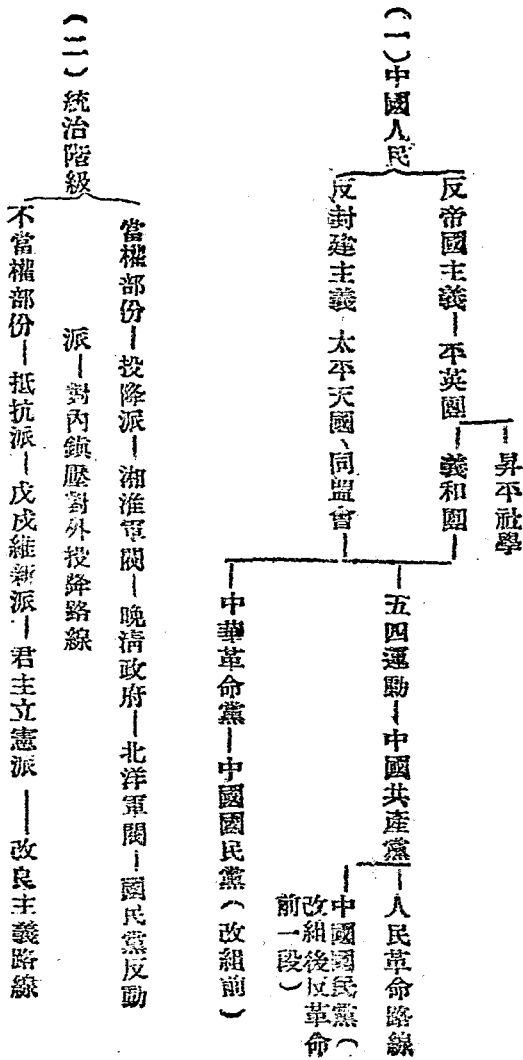
代表人林、鄧却無理由爲被充軍。投降主義爲人民所痛恨，琦善、耆英之流却掌握大權，包辦賣國。對照之下，滿漢分界特別顯明。所謂『滿漢一體，不分畛域』的騙術更加揭破了。廣東浙江兩次大出兵，除『御駕親征』，這算是第一等武力，似乎應該無敵，可是他們潰敗得像兒戲一般。當時如王庭蘭（廣東按察使）一類人已看到：『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的確，滿清軍的實力被人民看破了。這些也都是促淮反滿運動高漲的原因。

依據『東華錄』道光二一年至二九年（一八四一年至四九年）所記關於漢回番瑤各族起義及騷動事件，九年中凡一百十次。二七（一八四七年）年最多。凡二十六次。二八年（一八四八年）十次。二九年十六次。二九年以後不具事件減少，而是事件太多，地方官吏無法收拾，只得隱匿不報。三十年六月（一八五〇年七月）爆發了太平天國革命。

第四節 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所走的不同路線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會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了。戰前的歷史僅是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史（異族統治本質仍是地主政權）；戰後的歷史是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史，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封建主義依附帝

國主義，反革命力量特別頑強，人民革命過程因之也特別曲折和艱苦，但一百年來革命力量繼續在壯大，到今天已是接近最後決鬥取得澈底勝利的時候了。百年來鬥爭史列成簡表如下：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第一節 緒言

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創造了世界市場。自從南京條約訂立，五口通商，中國以半殖民地的資格，進入世界市場了。閉關時代，人民受封建剝削，已經極其痛苦；鴉片戰後，又加外來的資本主義剝削，這種新式剝削，破壞了中國手工業，使數千年來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合成一體的社會機構開始在某些地區趨於瓦解，更嚴重的是促迫滿清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猛烈增加封建剝削的強度，繁重得難以負擔的舊捐稅上，又加上新捐稅，用以填補賠款和鴉片貿易的虧額。鴉片戰後十年間，中國社會驟然遭遇這種史無前例的大變動，不論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全都震蕩起來，舊的財政、經濟、政治、禮教各種制度，愈更成爲中國人民的禍害，新的人民的反封建革命運動，在這樣時代條件

之下是必然要發生了。而揭開這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就是馬克思稱爲『處於社會革新底前夜』的太平革命。那時，以英國爲首（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四分之三）的外國侵略者與滿族皇帝爲首的封建剝削者，給予人民最大的痛苦，試看下列事實，英國的鴉片，滿清的暴政，顯然是痛苦的源泉。

英國輸入紡織品價額表（單位千金鎊）

年 份	棉織品	毛織品
一八四二年	四七〇	一四六
一八四三年	六五五	四二七
一八四四年	一〇四五七	五六五
一八四五年	一〇六三六	五三九
一八四六年	一〇二四	四三九

一八四二年——四五年，輸入額增長，到四六年開始低落，此後十年，輸入額平均說來幾乎沒有變動。這說明英國布疋對中國紡織手工業起了破壞作用，但不是嚴重的。輸出方面，中國絲茶逐年增長，在中英合法貿易上總是佔優勢，足夠抵補布疋及其他商品的價值而有餘。英國對華經濟侵略，主要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從南京條約的成立時起，鴉片貿易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大量輸入中國，每年換取等於數百萬金鎊的銀兩出口，從一八四〇年——一八五〇年，英國輸入鴉片箱數如下：

一八四〇年	二〇、六一九箱
一八四二年	三三、五〇八箱
一八四四年	二八、六六七箱
一八四六年	三四、〇七二箱
一八四八年	四六、〇〇〇箱
一八五〇年	五二、九二五箱

十年間，鴉片輸入增加一倍以上，消費者主要是統治階級中人，他們施行各種搜括方法，強迫人民補償耗失的銀兩，鴉片貿易繼續上漲，正與政治愈益腐朽，剝削愈益殘酷，銀源愈益枯竭，人民愈益困窮成正比例的發展。當時全部政治機關兒暴貪污，比鴉片戰前更甚，連會國藩那樣殘忍的漢奸，也不能不認爲『百姓顛連困苦』，舉出一些『民間疾苦』，勸告咸豐帝『務思所以更張之』了。照會國藩『備陳民間疾苦』所說：第一，是『銀價太昂，錢糧難納』——『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每石平均價三千文），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州縣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扑滿堂，血肉狼藉。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拳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里，實有日不聊生之勢』。這裏所謂小民，當然不是地主豪紳，這種人或與官吏勾結，朋比爲奸，或放高利貸，兼併土地，與其說受加賦之害，不如說受加

賦之利，土地集中現象在鴉片戰後特別緊張，地主豪紳因中小農破產，經濟反趨繁榮，鴉片銷路也順利擴張了。那時候中小農民生活的窮困是難以形容的，例如江浙產米地區，米一石平均值錢三千文。銀價在道光初年，每兩換錢千一二百文，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換錢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京中換錢約二千文，外省換錢二千二三百文，農民賣米所得，以錢折銀，實際減縮一半左右。官府徵收地丁，定價銀一兩，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後漸增至二千餘文以至二千八九百文，總比市價高數百文。農民完納地丁銀一兩，歷年遞增須賣米一石，再加漕米折銀，每畝又需米數斗，平常年景，一畝產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完納地丁漕米，已經剩餘無幾，暫時拖欠就遭血肉狼藉的慘刑，破產更不可免，因此他們唯一的生計，是壓縮自己的生活費，限於豆麥蠶桑紡織等副業範圍內，一遇天災疾病及其他意外事，副產不夠養生，當然成爲高利貸的犧牲品，佃農僱農生活尤其惡劣，上等佃戶耕田二十畝，每畝所費種籽、肥料、牛具、農器、農忙幫工等約一千文，春季缺糧必需填補，一般向當地富戶借貸錢米，秋收時加倍償還。每畝產米不過二石，共收四十石，還田主租米二十石，還債主錢四十千，米若干石，一年辛苦耕作，剩餘極微，經營副業，又需借八本錢，支付重息。中下等佃戶負債更多，終身不能脫離高利貸的盤剝。僱農工資通常每年十千文，無力娶妻成家，依附僱主過奴隸生活，是農民中最苦的一級。因地主的剝削，中小農佃戶繼續破產失業，多數轉入僱農或流民羣中，人口過剩成爲社會極嚴重的危機。

，止有革命才是出路。

第二是『盜賊太衆，良民難安』——『兵役平日皆與盜通，戰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這裏所謂盜賊，實際也是饑民反抗富戶，真正盜賊，却是全部行政機關，從官吏到兵役，無不『焚殺民房，訛索財物』，借口捕盜，實行燒殺搶奪，殘暴遠非普通盜賊可比。

第三是『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人民控告官吏役，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一家久訟，十家破產。往往有纖小之案，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髮指者』。這裏所謂冤獄，實際就是法律保障貪污。統治階級的法律必須僞裝一些公正面目，才能欺騙人民，現在真面目完全暴露，法律喪失信用，『令人髮指』的原因在此。

曾國藩代表一部份缺乏政治勢力的有產者訴苦，社會極大多數窮民的冤苦，他是不理解的。但僅就這三條說來，滿清官僚政治的黑暗，農業生產的摧殘，足夠證明人民要求革命的正當了。他在『議汰兵疏』裏又說『兵伍之情形，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各省皆然。見賊則望風崩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滿清養綠營兵七十萬，八旗兵二十五萬，全國分駐一百萬武裝強盜配合號稱官員吏役的文法強盜，共奉滿洲皇帝爲渠魁，一致

向人民敵視，悍然不顧。這樣一具殘暴腐敗的統治機器，只有對滿洲貴族、漢奸、地主、外國侵略者有存在的必要，從人民方面看，除了搗毀它，再沒有自救的道路。

中國人民反抗滿清，從來不曾停止，鴉片戰爭前後，南北各省反滿秘密結社，非常發達。被統治階級發覺的已經是名號繁多，實際並不止這些。例如咸豐元年七月（一八五一年八月）戊子上諭：『近來四川之噶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安徵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多有』。事實上捻黨散佈河南、安徽、山東二帶，為北方白蓮教天理教兩次大起義以後新起的大勢力，齋教散佈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一帶，為兩宋應教（北宋末應教主方臘起義）的流派，都不是僅限於一省。勢力尤大的天地會（又稱洪門、三合、三點），分長房福建、二房廣東、三房廣西、四房兩湖、五房浙江，會員佈滿南中國，以『反清復明』為共同宗旨。其他小派別，單是湖南二省就有串子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紅黑會、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種秘密結社，大致相類，這種散漫小規模的結社，不論它思想如何愚昧，方法如何落後，本質都是窮苦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一個力量。從鴉片戰爭起，大小會社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發動武裝起義，較著稱的如下：

一八四一年——湖北雲陽縣人鍾人杰聚眾數千人起義，自稱鍾勤王，並豎都督大元帥紅旗，次年戰敗被殺。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岡州八會如炷起義。

一八四四年——臺灣嘉義縣人洪協舉起義。湖南耒陽縣人楊六鵬等聚眾抗糧起義。

一八四五年——清山東巡撫發兵捕殺捻黨。

一八四六年——雲南永昌回民起義。湖南新田縣人王宗獻起義。江蘇昭文縣人徐壽順等起義。

一八四七年——天地會首領雷再浩、李得勝等起義，進攻全州，湖南廣西天地會員準備響應。

一八四八年——清廷諭兩廣、湖南、江西各督撫嚴拏天地會員。

一八四九年——廣西大饑，鄉村間飢民千百成羣，向富戶借貸錢米。富戶辦團練，藉口保全身家，請州縣官出示，特准對飢民「格殺勿論」。統治階級的殘忍性完全暴露，天地會和飢民紛紛起義，揭「官逼民變」、「天厭滿清」、「朱明再興」、「替天行道」、「劫富救貧」等旗號，攻佔城市，誅戮官吏，聲勢大振。廣西一省起義軍多至數十部，每部有衆數百人以至數千人，其中大部如湖南新寧縣天地會首領李元發佔據廣西、湖南、貴州三省邊境，三省天地會起兵響應，元發遣清兵圍攻，戰敗被殺。又廣西貴縣盜魁張嘉祥（降清後改爲張國標），迎合飢民心理，提出「上等的人欠我錢，中等的人得覺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四句口號，大得貧苦人擁護，在各部中兵力最強，不久張嘉祥戰敗，投降清軍，成太平天國的勁敵。當時清兵腐朽不能作戰，止是利用天地會山堂分立，缺乏統一指揮，首領貪得小利，並無政治思想等問題，居然

收各洞擊破，壓平反抗者，賄買反革命走狗的功效。可是太平革命軍與其他起義軍不同，它有堅強的軍事組織，統一的宗教信仰，顯明的政治綱領，強烈的民族意識，繼各部起義軍失敗之後，衝破清兵包圍，展開偉大場面，這決不是偶然的。

第二節 太平革命準備時期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商品、基督教、大炮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擊套工具。基督教裝着高善的面貌，另一面貌是粉粹地開放大炮，總目標在暢銷商品，主要是鴉片。馬克思說：『歷史之所以需要麻醉中國人民，爲的是要把他們從歷史的愚昧狀態中喚醒起來』。的確，鴉片使中國統治階級愈益腐爛，對中國人民却『不會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太平運動採取其宗教某些教義作爲反對封建思想的根據，這也是因鴉片而驚醒的一種表現。

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二年），英國傳道會派遣瑪禮遜博士到廣州傳教，譯耶教聖經成華文。他的第一信徒梁亞發著一種傳道書叫做『勸世良言』，在路上分發宣講，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到廣州應秀才考試，無意中得『勸世良言』，秀全是天資聰明，熟讀經史，很有才學，青年士人（二十五歲），他在科場屢次失意，激起反抗思想，試罷歸家

，裝瘋病四十餘日，說自己上天堂受了上帝的天命。這是歷史上『符瑞』、『受命』的舊傳統，與魔教拜日月神白蓮教拜彌勒佛同一意義，借用作號召民衆的旗幟。秀全病中吟詩有『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掃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等句，純屬政治性質，並無顯著的宗教色彩，洪秀全與基督教的第一步關係僅利用上帝，耶穌兩個名詞，宣稱自己受了天命。

一八三八年、四三年，秀全兩次應試，又遭失敗。那時候滿清政治軍事全部的無能在戰爭中完全暴露，他決心拋棄科舉，實行起義準備。他和同窗馮雲山等研究『勸世良言』，附會書中詞句，證明本人確實接受了耶穌的天命，他創立上帝教，勸人在上帝面前悔罪，不事邪神，不行惡事，遵守天條。秀全、雲山都是貧苦塾師，他們不顧失業的困難，把孔子牌位毀棄，結果學童驚散，書館停閉，不得不離開花縣本鄉，遠赴廣西傳教。封建社會的『至聖』孔子竟被看作邪神，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一八四四年，秀全雲山到廣西貴縣傳上帝教，農民百餘人受洗禮入教。一八四五年，雲山轉入桂平縣紫荆山向礦工宣傳，秀全回花縣製造傳教文書。原來上帝教止有一些簡單教義，主要是不拜偶像邪神，獨拜真神上帝，信奉耶穌，可得天堂永久快樂。這種教義不能號召廣大羣衆，需要理論的補充，秀全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論』兩篇，確掌握了窮苦人民的心理，初步發動反抗的熱情。救世勸人要作正人，切戒『淫、色、賭博』六個不正行爲。他

在戒條裏輸入政治上的平等思想，說「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天子的稱號和祭天的特權，一向歸皇帝獨佔，人民是皇帝的奴隸臣妾，「僧」號「侵」權便是大逆不道。人民都自稱天子，都有權拜自己的天父，恰恰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等級精神。因為人人都是兄弟，殘虐成性的統治階級自然是「嗜殺人民如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人民殺草寇完全是正義，戰爭所引起的禍災完全是草寇的罪惡。

『醒世論』裏又灌輸經濟上的平等思想。他根據「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這個原則，說「天下（世界）多男人，盡皆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之念」。顯然，那些滿洲人、官吏、地主、高利貸者剝削吞併，都是反「上帝之真道」的妖魔，必需殺逐，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變陵奪門殺之世為公平正直之世」。他引述孔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一段話，想實現「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上德」的太平世界。這種主觀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稱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要求根據無貧富之分的「新原則重新分配財產（製定天朝田畝制度）」，當馬克思在歐洲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洪秀全也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是空想，却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氣魄。

政治上經濟上兩大平等，是在封建壓迫之下困苦不堪的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救世、醒世兩篇論文，剝去它的宗教外衣

，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本質，太平革命運動就在這個平等思想推動之下壯大起來。

『太平天國起義記』載，秀全當時對族弟洪仁玕的秘密談話，說：

『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業？』

又說：

『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其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真理及知識，而各以體相接。這是我心中之大願也。』

這是秀全的民族平等思想，一八四六年，秀全依據這個思想作『原道覺世訓』，『覺世訓』是指鬥戰鬥目標的論文，它反覆說明『閩羅妖乃是老蛇妖鬼也，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所謂閩羅妖，實際就是人間的滿洲皇帝，所謂『閩羅妖之妖徒鬼卒』的各種偶像，就是人間的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賊，統治者口口聲聲責備人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應該感戴皇恩；『覺世訓』却說皇上帝造天地萬物，保佑人有衣有食，人明明沾皇上帝的恩典。那些妖魔鬼魔敢冒天恩，該誅該滅，那些感戴邪魔恩典的人是『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竟與妖魔鬼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他把皇

上帝與閻羅妖對立，勸告人民脫離妖魔的迷惑，獨拜真祖上帝，又把皇上帝與人間皇帝對立，認為「他是何人，敢靦然稱帝，妄自尊大」。在迷信神權王權的社會裏，給人民一種勇氣，敢於反對偶像，閻羅及皇帝，不管勇氣的來源出於宗教迷信，到底起着革命的作用，就宗教說，一神教比多神教、拜物教也是大進一步。

醒世、救世、覺世三篇的製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论基礎。

一八四七年，秀全離花縣到廣州禮拜堂從美國牧師羅孝全學耶穌教義，得讀新舊約聖經。他學了些對上帝禮拜的儀式，就去廣西尋馮雲山，在紫荊山設立上帝會機關，共同製定上帝教各種儀式及十條天條。他把人生日常動作，都表現為一種宗教儀式與上帝聯繫起來。教徒集會禮拜有讚美上帝詩，入教受洗有悔罪奏章，朝起夜睡有拜上帝祈禱文，吃飯有感謝文，其他如災病、喜慶、喪葬、生日、滿月、迎親、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動土等事，都有祭告上帝奏章。禱文大意不外「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誅滅妖魔，萬事勝意」，「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一類免禍得福的願望。統治階級中各個等級都有權壓迫人民，因之幻化為各種偶像鬼神都有權血食，上帝教集中禍福大權在一個皇上帝，也就是止承認一個人民自己的權力，這些迷信瑣碎的儀式，都成為組織革命羣衆的重要方法。

十條天條模仿摩西十誡，前四條屬宗教信仰，後六條即救世歌所舉六不正的條文規定，在平時當作教徒的生活法則，戰時變為軍事紀律（上帝教徒死後不用棺木，止用

帝寫奏摺，也是爲戰爭便利），天條比禱告儀式起更大的組織作用。

上帝教具備了理論和組織，派人四出宣傳，教徒人數大增。秀全與雲山等寫奏章祈禱上帝，秘密習武，選擇紫金山險固地方作根據地，聚眾會衆準備起義。爲要鼓勵羣衆的詠妖勇氣，秀全率馮雲山等往象州搗毀甘王廟。相傳甘王是殺母，貪暴淫亂的著名鬼神，象州人怕他作怪降禍，祭祀非常虔敬。秀全入廟宣佈甘王十大罪狀，舉大竹杖擊毀神像。從此秀全威名大振，入教人愈衆。上帝教徒劉處破壞廟宇偶像，宗教信仰轉成宗教鬥爭。地方紳士認爲『拜會謀叛』，起團練擒獲雲山等送桂平縣獄，會衆籌銀數百串贖營救雲山出獄，宗教鬥爭轉成政治鬥爭。一八四七年，上帝教起義準備初步完成。四八年至五〇年，上帝教與團練鬥爭愈益尖銳，起義準備成熟而爆發了。

一八四三年秀全創教，四四年到廣西傳教，四五年製作宣傳論文，四七年定組織規章，建立起議程據地，開始革命行動，前後五年，上帝教竟成有實力的革命團體。五〇年起兵前，以桂平縣紫金山爲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南到博白、陸川，北到武宣、象州，左黔、鬱南江流域的村落和山嶺裏，都散播了上帝會的種子。這樣迅速的發展，主要由於清清統治腐爛不堪，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主觀方面利用宗教迷信推行平等思想與組織，配合了客觀的革命要求。

一八四八年以後，上帝會與地主武裝團練進行着激烈的鬥爭，正如『李秀成自述』所說：『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

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在鬥爭發展中，洪秀全、馮雲山二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當然需要擴大，陸續加入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四人，最後加入洪大全，成爲七個人的領導集團。這個集團的結合與分裂，決定太平革命的勝利與失敗，這裏就必須敘述七人的階級成分及簡史：

洪秀全——廣東花縣客家人。中農家庭，父兄耕田謀生，家境窮困。秀全七歲（一八一九——嘉慶二十四年）入塾讀書，聰明異常，五六年間，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古文多篇，父兄和親族都希望他科舉成名。十六歲因家貧失學，助父兄耕田，十八歲（一八三〇年）受聘爲本村塾師，直到三十一歲（一八四三年）創立上帝教以前，不曾離開村塾教師的職業。一個讀經史多年，功名心極重，屢次應試得不滿秀才的失意人，悲憤不平，在鴉片戰爭後，走向革命道路是很自然的。他的學問知識使它可創教作教主，但實際傳教的是馮雲山，領導羣衆的是楊秀清，教主與教徒中間隔着一個媒介體，這使他脫出簡單的塾師生活，又進入高高在上的教主生活，不能積累起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去實際領導太平革命。

馮雲山——花縣客家人，與秀全同窗，也同是有才學考試失意的窮苦塾師。秀全創教，雲山首先受洗。一八四四年，二人到廣西貴縣傳教。不久，秀全歸家製造宣傳論文。雲山留桂平紫荆山，親身挑泥挖土，充當苦工，向附近各山燒炭工人、礦工及農民宣傳新教，到一八四七年秀全回紫荆山時，信徒已有數千人，造成雄厚勢力，號稱一拜

上帝會」。二人共訂宗教儀式及天條，開始作起義準備。雲山被團練捕獲押入縣獄，秀奎回廣州設法營救，楊秀清等燒炭工人籌集銀數百串充賄賂，四八年初，雲山得釋放歸山，教徒人人歡欣。即時殺牛宰馬，獻祭上帝，感謝天恩，雲山出獄後往花縣尋秀全，四九年六月才同行歸山。他是上帝會主持者，離會一年以上，不會指定代理人，會衆無人統率，發生分裂現象，這是極可惋惜的。

楊秀清——桂平縣平隘山峇家人。世代以燒炭種山爲業，秀清幼年喪父母，曾離家流蕩，五口通商前，結夥伴護送洋貨，交結許多兩廣江湖上豪客。上海開埠，廣州國際貿易衰落，秀清失業歸家，仍作燒炭工人，「他認字無多，好講異常」（『賊情彙纂』），敵人口中所謂「奸譎」實就是他的閱歷和智謀，高出一般常人。馮雲山出獄回花縣，會衆發生動搖，楊秀清自稱上帝附身顯聖，發佈號令，團結會衆。這在當時也還是必要的手段，秀全回來，不得不承認聖言，從此代上帝傳言的大權專屬秀清，洪馮都是廣東籍，不及秀清與羣衆有鄉土關係，再加上帝附身，秀全要跪地聽命，甚至接受杖責，秀清權力在羣衆中提高到第二教主的地位。馮雲山不幸早死，秀清掌握軍事政治大權及宗教權半部，與秀全權勢相逼，潛伏着後來楊韋內訌的禍根。

蕭朝貴——武宣縣農民，破產流落，糾合勇士入山，護送往來商客，與楊秀清結識，約爲義兄弟。廣州商業轉移上海，楊蕭失業，同入上帝會成羣衆首領。秀清稱上帝附身，朝貴稱耶穌附身，後來都被洪秀全承認有代言權。秀清多智謀，朝貴忠實坦率，勇

敢剛強，衝鋒第一，代表農民的革命性。楊蕭關係較深，秀全妹宣嬌嫁給朝貴，增強洪楊兩方面結合。朝貴在攻長沙時戰死，與馮雲山的早死同是重大的損失。

韋昌輝——桂平縣金田村人，地主兼典當商，為一縣首富，捐得監生，出入衙門辦事，又是豪紳身份。一八四九年，廣西飢民發動分糧，富戶多破家，昌輝獨能慷慨施予，得本縣一部分民衆擁護。上帝會勸昌輝入會，借他的紳富名義和資財，組織保良攻匪會，掩護革命活動。他出身剝削階級，貪污官吏指為謀反，被迫參加金田起義，在太平軍領導集團中是唯一動搖分子。後來楊韋內訌，大局敗壞，他是主要負責者。

石達開——貴縣北山里客家人。石家是當地土豪大姓，人口多，富有財產。達開讀書有大志，文武備足。加入保良攻匪會，圖謀革命。韋、石二人都是當地多年紳富，各擁有一部份羣衆，他們對上帝會關係較淺，在領導集團中地位也較低，因之達開雖是第一等軍事政治人才，却不能取得洪楊的絕對信任。

洪大全——湖南衡山縣人。他在供詞裏自述：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不當和尚。還俗後，又考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他和洪秀全一樣，應試失意，轉向革命，秀全接觸一些西洋文化，創造平等思想的上帝教，大全生長在內地，止能組織舊形式的天地會，自然，上帝會是較前進的。可是天地會勢力浩大，大至遊行兩廣兩湖各地，結識山堂首領，擁有廣泛的羣衆。上帝會是新起的，一個地區的

團體，羣衆基礎遠不及天地會。金田起義後，大全以天地會大首領軍事專家資格前來合作，上帝會推尊他爲天德王，居次於洪秀全的地位，是有政治意義的適宜處置。洪大全的眞姓名是焦大，參加起義後，改稱萬大洪（『朱』、『洪』、『萬』都是天地會的貴姓，天地會本尊奉萬雲龍爲開山始祖），他對天地會稱萬大洪姓名，爲的便於號召會黨。對上帝會又用洪大全姓名，表示與洪秀全有兄弟對等的關係。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國二年，咸豐二年）在永安圍城中使用『天德』年號頒發告示，對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人民，號召『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狠吏盡行除滅，救民於水火之中』，全篇不見一句宗教語，與上帝會開口必稱天父天兄顯然不同。太平天國用陽曆，天德仍用陰曆（但承認太平曆），太平天國領導人稱王，萬大洪自稱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又有都督大元帥稱號），不受天德王名義。天地會沿用『天德』二字以爲理想中小主的年號（起於康熙時順治一奉朱三太子起義），非朱姓的起義人多自稱大元帥（如一八五〇年廣州發現天德二年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萬大洪即洪大全，是天地會首領始無疑間。他承認『奉天承運太平天國』，洪秀全討清詔書裏也自認『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在復明反滿一論上，天地會上帝二會是可以合作的。

以上七人，從團結方面說，在太平天國名義下，一致反對滿清統治者；農民、手工業工人、運輸工人、會黨、流氓，以及一部份失意的士人、被欺壓的地主商人，都有代表參加了這個領導集團，形成龐大無比的革命聲勢。滿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在永安戰

敗後，感到『此賊不是尋常的賊，總願旁人不要同我一樣才好』，這就是團結所表現的威力。但從分歧方面說，首先是上帝、天地二會存在着裂痕。上帝會崇拜一個真神，楊秀清代真神發言，因之楊秀清等於真神。天地會標『反清復明』為宗旨，並非宗教團體，洪大全在自述裏說：『妖術行為，古來從無成事的』，他不能聽從楊秀清指揮，可以推見。其次是上帝教本身，洪馮為一組，楊蕭又為一組，洪馮創教，楊蕭代上帝耶穌發言，宗教領導二元化，隱藏着分裂的嚴重危機。韋石並非上帝教信徒，韋被迫參加，石『讀書有大志』，在一定時機下，韋可以爭權內亂，石可以負氣獨立，簡單的宗教迷信是不能束縛他們的，洪（大全）馮蕭三人早死，洪楊韋石四人間紛歧的因素繼續發展到分裂，蓬勃的太平天國也就由衰弱而至於崩潰了。

太平革命的基本羣衆，在金田起義時，一般是廣西人、客家人、上帝會人（教徒總數約三千人）。按職業區別，有下列二類。

第一類

羣衆

燒炭工人——上帝會主幹之一，首領楊秀清、蕭朝貴。上帝會人多數燒炭為業，俗稱為炭黨，集中地在桂平縣平隘山。

礦工——鴉片戰爭後，道光帝令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等省招商開礦，廣西開礦最多，貴縣招集客家人開採銀礦，馮雲山入北山里、龍山中，宣傳上帝教，成為上帝會主幹之一，起義參加者約千餘人。

客家農民——鴉片戰後，道光帝令各省廣開荒地。廣西地廣人稀，廣東或鄰省客家

人多遷來墾田謀生。客家村落不及本地土人村落強大，常被土人掠奪，彼此感情極惡，往往尋仇械鬥，一八五〇年，貴縣土客發生大械鬥，客家戰敗，男婦老弱三千餘人棄田產逃走，隨北山裏礦工隊加入金田起義，成爲主幹之一。

這一類工人農民數千人是太平軍最基本的戰士。其他陸續參加的，正如李秀成自述：「從（入教）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太平軍中農民佔最大多數，不限於客家，也不限於先入上帝教，他們的共同信仰是「同家食飯」、「自由平等」。

第一類
羣衆

章昌輝部屬約一千人，隨昌輝參加起義。這羣人有農民、商人、流氓，後來一部份結成章黨。

變兵——金田戰前一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清軍中客家軍人數千反清加入太平軍。

會黨——金田起義，洪秀全允許三合會首領八人率部加入，條件是同拜上帝及遵守會規（天條）。其中七人嫌會規太嚴，相率退出。獨有羅大綱愛太平軍的紀律及教義，改奉上帝教。此後，「秀全誠其部屬不再收容三合會人物於其軍中，惟其甘自改變其舊習而遵從真道者始行納之」（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

交通運輸業失業者——鴉片戰前，廣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貨經兩條大路，一路起廣州經大庾嶺沿贛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廣州經南風嶺達湘潭。容闈「西學東漸記」說「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交通皆以陸，勞動工人肩貨往來於南風嶺者不下

十萬人」。鐵路水陸運輸、護商、旅店、商販等業及依附爲生的人數常不下百萬。商華中心移到上海，兩廣贛湘驟增百萬失業者，腐朽的社會是經不住這潮地震般的劇變的。他們要求生活，就必須反抗社會舊秩序，參加太平軍的如楊秀清、蕭朝貴、吳如孝（封王）、羅苾芳都是這一類人，其餘不知名的當不在少數。不過天地會對他們的影響遠比上帝會大，萬大洪告示，主要就是對這羣失業者發出號召。

被迫參加者——太平起義記：『清軍戰敗，遷怒於新編居民，焚燒一二千鋪戶而搶掠財物，且又捕殺居民多人，故加以逆黨或助逆之罪。』此等殘酷行爲令人民憤激不勝，許多人留在家中不禮拜上帝而不願加入革命運動的，至是迫得離家而投入洪軍。

這一類人品類較雜，但在宗教信仰、軍事紀律的統一領導下，也成爲重要的革命戰士。

以上兩類到金田起義前後，總數已達萬人，這是堅強統一的團體，具備政治思想、組織、領導集團、基本羣衆、人民同情擁護等必要條件。從創教到起義不過八年，準備完全成熟。容闕說『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自然，革命並非少數人的製造品，容闕指出了主要的一方面，但洪秀全能首先提出並實行反封建革命（雖然因幼稚、錯誤而不免失敗），他個人所起的倡導作用，還是不容否認的偉大成就。

第三節 太平革命勝利時期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

本時期又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〇年七月——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起義至一八五三年四月——咸豐三年二月攻克南京，革命形勢飛躍的發展；後期從咸豐三年二月建都南京至一八五六年九月——咸豐六年八月楊韋內訌，革命陷入停滯狀態。從飛躍到停滯，完全是由於領導集團裂痕的加深與戰略指導的錯誤，滿清方面却因此獲得重新調度反革命力量的機會。

(A) 前·期·的·革·命·形·勢——飛·躍。

上帝教徒到處搗毀廟宇偶像；與地方紳士衝突日趨激烈，「各教徒感覺有聯合一體共禦公敵之必要。彼等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為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均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制度，人數愈為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以棄家集合」(『太平天國起義記』)。革命羣衆的鬥爭情緒高漲到如此程度，道光三十年六月(一八五〇年七月)，太平軍在紫荊山前金田村公開豎立義旗，陸川、博白、花

洲（屬平南縣）、白沙（屬桂平縣）各地也同日起事。十月（十一月），各地會衆到達金田，十一月（十二月），大破清軍。咸豐元年閏八月（一八五一年十月）攻克永安州（蒙山縣），建立太平天國。

太平軍駐永安城半年，頒行各種制度，建國規模大體具備。秀全被推爲太平天王，再由天王大封官職，王是最高官職，分四等，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列一等，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列二等，翼王石達開列三等，以上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太平天國政制、軍制、曆法都是馮雲山訂製，他當然知道節制權應屬天王，但楊蕭取得代天父天兄發言權，事實上秀全早受楊蕭主要是楊的節制，論宗教地位及起義功績，雲山不在楊蕭下，也因同樣事實，不得不退居第三位。領導集團內部的分歧，在建國開始，已顯示分裂的危機，這個危機又是在發展而無法克服的。

太平軍初起，清軍每戰必敗，咸豐帝派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督大軍圍攻永安城。咸豐二年二月（一八五二年四月），城中糧盡，太平軍突圍，大破清軍，殺四個總兵官，乘勝進攻桂林。在突圍中，洪大全被清兵俘獲，這是巨大的損失，天地會有廣大的羣衆基礎，有二百年的反滿歷史，有自己崇奉的萬雲龍大哥和五祖，有傳教的組織形式和特殊習慣，另一方面，它沒有上帝會那樣統一組織與嚴格紀律，這些，都阻礙了它和上帝會的合作。洪大全在承認太平天國和天王是「明太祖後裔」兩個條件下，用天德年號，天下大元帥名義與上帝會聯合，地位是對等的。這一聯合形式的發展，不僅天地會可在政

治經濟平等的思想下合作，就是北方的捻黨、白蓮教、西北的回民、西南的苗民，也可
以同樣聯合協力行動。這種反滿大聯合，在上帝教領導下，可以推倒滿洲統治。洪大全
被俘，天地會失去有力首領，此後天地會員或單獨起義，或改奉上帝教加入太平軍，不
成爲一個對等聯合的力量，上帝會也從此合併上帝與革命爲一事，不許太平軍中有非
上帝教徒。上帝會與各種反滿勢力不能合作，從永安突圍後開始。所以太平軍喪失洪大
全，對革命前途有極嚴重的意義。

桂林是廣西反革命的中心地，提督向榮、狀元龍啓瑞率綠營兵、團練固守，不敢出
戰。太平軍駕雲梯猛攻，婦女助戰，兒童吶喊助威，但清軍有槍砲，太平軍不能取勝，
解圍北上攻克全州。從全州到湖南路上，馮雲山戰死。雲山死後，洪秀全勢更孤弱，大
權盡歸楊秀清。太平軍進攻長沙，沿路吸收羣衆五六萬，其中挖煤工人數千，另立土營
，專開地道攻城。蕭朝貴在長沙城下陣亡，太平軍圍攻兩月不能破，轉攻岳州，十月（
十一月），克岳州。

咸豐二年二月到十月（一八五二年四月到十一月），太平軍損失三個領導人。當時
缺乏戰事經驗與攻城武器，將士全憑勇敢衝鋒，用血肉換取勝利。清軍不敢對陣作戰，
專靠城池與槍砲，馮爾都是中砲死的，桂林長沙都是靠槍砲守住的。太平軍痛感軍械的
重要，在岳州獲得大量船隻及器械槍砲，實力大增，改變「欲取湖南爲家」（李秀成
自述）的計劃，決心進攻湖北。

十一月（十二月），太平軍自岳州水陸兩路並進。十二月（一八五三年一月），佔領武漢三鎮。咸豐三年正月（二月），太平軍水師有船一萬艘，載糧食軍火財物蔽江東下，陸軍夾兩岸前進，水陸號稱五十萬人。沿路民衆踴躍從軍，聲勢浩大，清軍喪膽，望風崩潰。太平軍連克九江、安慶、太平、蕪湖，水陸號稱一百萬人。二月初八日（三月十七日）攻克南京。

南京的攻克，自然是革命一大勝利，但還不是滿清的致命傷，「此時天王、東王尙是計及分軍鎮守江南，欲住河南，取河南爲業」（『李秀成自述』），這個計劃完全正確。證以後來林鳳祥、李開芳率偏師北征，直到天津附近，嚇得咸豐帝預料到「北京快要失陷，詔諭各省巡撫將皇帝的收入送到行宮所在地熱河」（馬恩合著：『亞洲與俄國』引一八五四年二月東方郵電），滿清勢力在北方空虛腐朽可以想見。如果此時天王東王率主力軍乘大勝餘威，長驅北上，滿清措手不及，除倉皇逃遁，決無他途可走，全國反革命失去滿洲主子，就是最兇惡的曾國藩，也無法組織湘軍。可惜洪楊對這一計劃是動搖的，楊秀清聽信一個湖南老水手「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的話，決計定都南京。這說明太平軍領導思想上保守主義戰勝了進取主義，安富尊榮觀念戰勝了刻苦戰鬥觀念，總之是機會主義戰勝了革命主義。這個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太平革命失敗的決定因素之一。

太平軍別一大失策是棄地不守。岳州、武漢、九江、安慶等地，全部放棄，滿清官

吏很快的恢復統治機構，殘殺革命民衆。如果派兵駐守，援助當地民衆反抗滿清統治，擴大革命佔領地，南京形勢也就會鞏固起來。太平軍不知守地，清欽差大臣向榮率盜魁張國樞自廣西尾隨在後，止隔十天，向榮到達南京城東孝陵衛，成立江南九營。又一滿清大帥琦善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各軍自河南至揚州，成立所謂江北六營。南北大營都是些八旗兵綠營兵，不堪一戰，但政治影響對滿清有利。滿清在江浙上海搜括財物，供給兩大營，大批流氓強盜應募入營，兵力愈益強大，盜魁張國樞兇悍善戰，成爲主幹人物，它戰鬥力雖不及湘軍，但對南京是一個大威脅。

戰略上的失策，要引起嚴重的後果。但太平軍還有極大成功的一面，使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造成堅強的基礎。這就是百萬人民的直接參戰與廣大人民的擁護革命。太平軍從廣西出發，沿路誅戮妖麗（官、幕、吏、役），焚燒衙門、糧冊、田契、借券，殺逐豪紳、地主、和尙、道士——這種人多數是土地佔有者或高利貸者。人民驟然封建剝削的束縛，感受革命所給予的愉快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他們參戰，當然不是所謂脅從；擁護，當然不是所謂好亂。太平天國野史說：「沒入財物，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且每以摺得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湘楚之民大有「後我后，後來其蘇」之概，太平軍至則爭迎之，官兵至皆罷市」。這是事實，就是反革命渠魁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太平天國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滿清軍隊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根本不知有所謂紀律。太平軍恰恰相反，普遍保持極嚴格的軍事紀律。『李秀成自述』說『天王駕入南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一八五三年）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事實上太平軍紀律始終良好，連曾國藩也不敢否認這個事實，太平軍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太平軍錯誤戰略的影響剛在開始，而革命基礎却已迅速長成，這就是前期飛躍發展的原因。

(B) 後期的革命形勢——停滯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正式成立國家政權。軍事、外交、政治、經濟都是急待處理的重大問題，太平軍實際領導者楊秀清怎樣來處理這些問題呢？他是『才能極大』，『令嚴軍民畏』的剛強人物，他依據平等原則，建立起嶄新的天國制度，成績是偉大的。但因為個人權利之爭，釀成內部大變亂，錯誤也極大。

要則滅滿清必需北征，要鞏固南京必需西征，要斷絕滿清財源必須東征，太平軍處置三方面軍事基本上是失敗了。當時南北各地，民衆紛紛起義，對太平軍絕對有利。黃河流域捻軍大起，首領有張洛行、李兆受、李士林、劉疙痞、劉元吉、任二皮、龔得樹

等，張治行勢力最大；長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天地會到處發動，陳開起兵廣東佛山縣，黃威起兵福建廈門，劉麗川起兵上海最爲著名，此外較小事變真是不可勝數，例如湖南，照會國藩說『去年粵逆入楚，凡入孫弟（天地）會者，大半附之而去』（咸豐三年二月）『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但是他在『移駐衡州摺』裏表示驚慌失措，認爲『若非加誅劔，則禍患將無了日』。他說：

『數月之間，四屬匪徒屢次滋擾，如常寧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興有獅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燒衙署之案，桂東有縣城失守，戕害把總之案，宜章臨武有廣東匪徒滋擾之案，永明、江華有廣西匪徒竄入戕害總千之案。此外四屬中，聚衆倡亂，搶劫拒捕，爲案甚多，未及一一上瀆聖聽。』

這樣多的起義，證明在太平革命影響下，人民憎恨滿清已達頂點，會國藩不認爲滿清統治完全破產，却描寫成『皆由上年粵匪經過衡、永、柳、桂一帶，豪脅最衆，或久授偽職，或飽掠潛歸，以致羣民構煽，甘心從逆，勸輒貼粵匪之偽示，張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兒偷盜，三五成羣，亦敢倡言謀亂，毫無忌憚』。事實上太平軍不曾經過的地區，同樣如火如荼在爆發，而太平軍佔領的地區，人民安居樂業，擁護太平軍。會國藩自己供認：

『伏查崇（湖北崇陽縣）通（通城縣）兩縣向爲匪盜嘯聚之區，自正月以來，居民多已蓄髮，樂爲賊用。其旁近州縣，如通山、蒲圻、大冶、興國、咸寧、嘉魚

等屬，皆已爲賊所據，官兵到境，無土人爲之嚮導，無米鹽可供買辦，人心之壞，實堪痛恨。」（咸豐四年三月）報崇通剿匪勝仗摺」。

根據上述例證，可以斷定太平軍無論北征、西征、東征都有可能獲得最大的勝利，但太平軍並不能利用這樣優越的形勢。

北征——太平軍克南京，卽派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率兵攻下鎮江、揚州二重鎮。洪楊計議北征，羅大綱主張「欲圖北必先定豫，車駕駐汴，軍乃渡河，若懸軍深入，犯險無後援，臣不敢奉詔」。洪楊不聽大綱這個正確主張，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率兵五萬，自揚州出發。三人都是廣西老兄弟，忠勇有餘，志謀不足，臨行又受洪楊「師行問道，疾趨燕都，毋貪攻城隳時日」的詔諭，北征軍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咸豐三年四月（一八五三年五月），破安徽鳳陽城，五月（六月）入河南，攻開封，六月（七月），渡河攻懷慶。滿清集合北方軍隊死力防堵，吉文元戰死。七月（八月），棄懷慶攻入山西，沿路血戰，餘衆不過二萬。楊秀清僅派兵二萬往援。九月（十月），北征軍入直隸攻至天津，清軍聯合團練開放河水，四野漫漶。十月（十一月），退靜海一帶。北征軍不慣北方冬季氣候，耳鼻凍裂，手足潰爛，糧食又缺，清軍四面圍攻，兵力大受耗損。咸豐四年正月（一八五四年二月），北征軍放棄靜海，轉至阜城與清軍相持。五月（六月），李開芳率一軍攻入山東高唐州，迎接南京新來援軍，林鳳祥困守直隸連鎮待援。四月（五月），南京援軍在山東戰敗，林李分散不能會合，勢更孤弱。咸豐五年正

月（一八五五年三月），林鳳祥軍糧盡，兵士飢極不能忍刀矛，連鎮被清帥僧格林沁攻陷，全軍戰死，無一人求降。清軍全力合圍高唐州，李開芳軍堅守不屈。四月（五月），清軍引運河水灌城，李開芳軍全軍淹沒。

北征軍勇最堅決，血戰兩年，全部戰死，真不愧為革命戰士、民族英雄，雖然戰敗，還會囑咐北征軍的『堅忍不屈』。北方大平原利於騎兵，地近北京，滿清統治比較鞏固，北征軍多是廣西、湖南山鄉人，不慣北方的氣候、地形、麵食；又不通北方的言語、風俗、習慣，更加宗教隔閡，雜處民衆接近；這些，都是北征軍的劣勢，戰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吳佩孚軍深入，先聯合河南、安徽、湖北、山東一帶拾軍，既可掩護西征軍保守武漢，又可增加馬步實力，南京援軍也不會沿路被堵，北征勝利的希望還是很大，可惜被楊秀清的錯誤指導斷送了。

西征——要確保南京，必需確保長江上游武漢。九江、安慶三大據點，關鍵尤在武漢的得失。太平軍與反革命湘軍長期戰爭，實際就是上游三大據點爭奪戰；最後終因內部不團結，發生內亂，被反革命戰勝，武漢落入胡林翼手中。曾國藩得專力進攻九江、安慶，太平軍從此只能作防禦戰了。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與北征軍出發同時，南京派遣胡以晃、羅大綱、賴漢英、石祥貞、韋俊進兵安徽江西，五月（六月），克安慶，圍南昌。吉安等地民衆起義響應，聲勢大振。清軍危急，曾國藩在湖南被迫出湘身披數路來援，一戰潰敗，羅澤南部死傷最大。太平軍久攻南昌不下，退兵攻取九江。吉安等地

民軍被湘勇羅澤南部擊滅。四年六月（一八五四年七月），攻克武昌。曾國藩湘軍水陸並進，會合其他清軍死力爭奪武漢，八月（十月），陷武漢。經幾次大戰，太平軍退出湖北境。湘軍圍九江，守將林啓容善於戰守，屢破湘軍，但形勢對湘軍有利。

西征軍由石達開指揮，在江西境內大破湘軍，專度出兵攻武漢，五年正月（一八五五年三月），連克漢口漢陽，曾國藩攻九江不下。湖北又告急，他是第一等重視上游的，分全部兵力為四股，令顏等攻奸胡林黨，羅澤南各率陸軍一股，彭玉麟率長江水師一股援救武昌。曾塔齊布五千人圍九江，二月（三月），太平軍克武昌。這一次大戰是革命與反革命雙方決死的鬥爭，太平軍雖然獲得暫時的勝利，但滿清政府與曾國藩湘軍密切合作，竭盡全力從失敗中求取勝利，太平軍方面却因領導集團內部不和，在決定關頭，從勝利轉入失敗。這裏必需敘述戰爭指導者楊秀清與軍事指揮者石達開的事蹟，說明太平軍失敗是極可痛心的內訌產生的必然惡果。

咸豐三年，胡以晃攻克安慶，人民不習僧太平宗教與法制，頗多抗命。『天王命達開赴安慶一帶安民，達開既至安慶，以誠意相要結，擇村里之有聲望者為鄉官，緝盜賊，嚴軍旅，使各安其業。更督民造糧船，接敵輸餉米，於海里之豪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立樞關於大星橋，徵江面商稅。軍用裕而百姓安之，無聲大起』（『太平天國野史』）。這是最基本的建設，可是不滿三個月，『東王楊秀清忌之，以燕王秦日綱代達開，命遠京襄理朝政』。

等到咸豐四年七月（一八五四年八月），曾國藩湘軍大舉攻破岳州，進攻武漢，才再派達開率兵往救。劉蕪湖，湘軍已奪取武漢，入江西省攻九江了。達開守安慶，出兵援九江，大破曾國藩軍，又大破羅澤南軍。湘軍陸軍受挫，水師仍在江上猖獗，十二月（一八五五年一月），水師主力駛入鄱陽湖，達開鑿壘斷水師後路（湘軍水師因此分爲外江內湖兩部）命胡以晃、羅大綱率小艇襲破曾營，奪得曾國藩座船，國藩駭極投水尋死，被附近小船撈起，倉皇逃入羅澤南營（這情漢奸頭子四日裏在靖港曾投水尋死一次，回長沙整頓了一番湘軍，這一次又大敗尋死。羅是惡觀失望到極點，在羅澤南營寫遺疏千餘字，準備再尋死。羅澤南竭力苦勸，說是『天若亡本朝，此老必不死』，果然，他又幹起漢奸勾當了）。達開乘勝進克武昌，六年（一八五六年），攻南昌，湘軍撤九江圍兵數萬人控南昌。達開兵力才數千，自率敢死士夜襲樟樹鎮湘軍大營，湘軍最怕達開，不戰潰逃，達開率騎兵數十人猛追，湘軍全軍大奔不能止，曾國藩逃入南昌城困守。江西十三府中，時八府五十餘縣都入太平軍手中。石達開既克武昌，曾國藩深知『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築兵力，爲恢復之計』（『與顏林翼書』），出四分之三兵力與西征軍武漢，江兩湖北兩省大戰以來，湘軍敗多勝少，大將羅澤南，塔齊布相繼斃命，曾國藩在南昌危城中，內外隔絕，『凡江楚文報自賊軍經過，輒被殺害，臣等屢募長髮探卒，臘丸緝字，作爲隱語，以通消息（五月『陳明鄰省援兵協餉片』）。他驚駭到『道途夢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魄屢驚』，已成鑿

中隨的形勢。他是被當時漢奸辜奉爲唯一領袖的，羅澤南所謂「但留曾公一人在，其他均不足計」的，南昌如果攻下，國藩就擒，等於滿清政府和漢奸辜失去靈魂。正在兩軍肉搏最緊張的時候，七月（八月），楊韋內訌勃發，石達開聞變，急自湖北洪山馳回南京，被洪秀全解除兵權。達開畏禍率部自由行動，從此太平天國轉入衰亡階段，無力再爭上游。十一月～十二月，湘軍攻陷武昌，大舉進攻九江城。

石達開是會國藩最怕的敵人，說「逆首石達開狡悍爲諸賊之冠」（咸豐八年）陳明石達開情形」。咸豐帝聽說楊韋內訌，喜歡得大發幻想，命會國藩準備達開來降，說「倘向會國藩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使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亦當預爲籌畫」（十月二十日——十一月十七日——上諭）。反革命對他畏懼重視如此，洪秀全却自壞長城，迫他逃出南京。北征軍因孤軍失援，放走了咸豐帝，西征軍又因內部衝突，放走了會國藩，兩次失敗，革命頹勢很難挽救了。

東征——江南江北兩大營威脅南京，太平軍留大部份精銳守城，兵力不能出鎮江以東。江浙地方官廡，從財源說，正如會國藩所稱「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同治元年「近日軍情片」），從軍事說，南北大營招募兵丁費，北京政府官員旗人生活費，主要依靠江浙上海三處供給，正如胡林翼所說，「江浙爲倉廩根本，京師性命所系。」東征江浙，正是破壞南北大營、援助北征軍，削弱北京政府的重要途徑，洪揚在這方面完全不加考慮，是最大的失策之一。

太平軍攻克南京，人們都預料上海一定是攻擊的目標，英領事組織勇團保護租界，清官吏要求各國干涉，保護上海城，於各國拒絕，當時上海有廣東人八萬，福建人五萬，都同情太平軍，準備起義響應。咸豐三年八月（一八五三年九月），廣東七首黨（天地會的一派）首領劉麗川聯合福建青巾黨首領陳亞林及江西編鐵會二千餘人，從北門攻入知縣衙門，佔領上海城。這次起義止殺死一個知縣官，傷一個北門守門人，秩序非常良好。粵、閩、贛同鄉及上海人寧波人輩子的加入，勢力大增。他們用『大明太平天國』名義出佈告，一律蓄長髮，但不奉上帝教。他們在美國教士家中發現馮雲山的幼子，立即歡迎入城，花五百銀元買一匹好馬贈他騎上。在城內遊街，很熱鬧。這就是天地會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他們派代表到南京接洽，呈上一個奏摺說『臣劉麗川、廣東香山縣人，向因貿易寄居上海。見官激民變，首先率領衆兄弟起義。數日之間，克服三城，封儲倉庫，以待大兵之至。並獻寶刀一柄，以表忠忱』。洪楊認此首黨是天地會的支派，有『腐敗之習慣，放恣之性癖』，拒絕合作，起義軍與清軍三萬人交戰，不管大砲轟城，也不管開地道進攻，屢次殺敗清軍，不少清軍自動投到起義軍方面來。咸豐四年十二月（一八五五年一月），法國水師提督及領事聯合清軍攻城，法艦發砲轟擊，擊毀東北角城牆，法軍二百五十八人率大隊清軍攻城，起義軍奮勇抵抗，殺死法軍十三人，擊傷五六十人，清軍死一千二百人，傷一千人。法軍逃走，清軍還留在城上，上海都首領小鏡子（即潘可祥）率一二百人以上城搏鬥，全隊大聲呼喊。『清軍聞聲，心驚胆震，急忙

奔逃，出城門也來不及了，即從城上跳下，其時天寒冰結，清軍許多跌死城下，有些跌在長矛之上，有些斷腿折骨，傷者皆被抬回清營。清軍既逃回本營，黨人復關閉城門（雅爾教士『太平軍紀事』）。清軍得租界援助，圍困上海城十七個月，咸豐五年正月（一八五五年二月），起義軍糧食斷絕，終於放棄縣城，突圍逃走。如果太平軍不因宗教偏見，派兵援救起義軍，確實佔領上海，外交上（當時英美聲稱守中立）財政上都有極大的利益，滿清後來也不易組織淮軍常勝軍，戰局可能發生另一個面貌。

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戰勝上海起義軍，五年正月，進攻鎮江，江南大營加緊圍困南京，太平天國的形勢危急。楊秀清派遣李秀成，陳玉成等四丞相救鎮江，大破江蘇軍，殺吉爾杭阿。六年三月（一八五六年四月），秀成渡江擊破江北大營。秀清又命李秀成、陳玉成等進攻向榮大營，五月（六月），李陳軍從西面，鎮江軍從東面夾攻，恰巧石達開率軍來援，三面奮擊，大破回軍。張國樑扶向榮突圍逃往丹陽（七月向榮死，和春代為欽差大臣）。三四年來圍困南京的江南大營，一戰瓦解，楊秀清見外敵已去，開始在南京發動內亂。

軍事是革命的骨幹，太平軍將領和士兵都是勇敢堅決的戰士，可是在錯誤指導下，雖然戰爭中獲得不少偉大勝利，到底不能得到應得的果實，革命發展陷於停滯了。

第四節 天國建設諸問題

外交問題

上海是英美法三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它們不願中國有新的變動，尤其不願上海有新變動。咸豐三年四月（一八五三年五月），其公使卜亨給太平天國信裏說：『總之中國既准五口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固惟以兵戎從事』。這就是各國對太平天國的一般態度。

當時滿清政府大施卑污賣國手段，要求外國援助。一面宣稱疆界西人都贊成清政府，歐洲兵船十餘艘，準備協助『剿匪』，進攻南京，一面劃上海內外城箱地，請各國海軍保護。各國拒絕不允。清政府計窮，乃偽造太平軍排外告示，威嚇外人。英香港總督邦漢親到南京訪問太平軍首領，天王接見邦漢，自稱為教主，稱英國為藩屬，英王為藩臣，邦漢很不愉快的回去。

其實太平天國方面，不懂得國際情勢與外交手腕、禮儀等，那是不足怪的。外國侵略者反對太平天國，主要並不在洪秀全的傲慢態度，而在他們的正確主張：就是國際地位平等（中外是兄弟之國，要共同生活如弟兄），國際貿易的完全自由，但嚴禁鴉片輸入。其次是『將來外國人可以隨便用汽船、鐵路、電綫及其他西洋器具而無礙』（『太平軍紀事』）。當時侵略者自稱『文明傳播者』，把中國人當作野蠻人對待，而國際貿易

易情況，舉一八五五年爲例，上海輸入總額達一百六十萬鎊（現金和鴉片不在內），其中英國佔一百一十二萬鎊，美國佔二十七萬鎊，其他國家佔二十萬鎊。上海輸出總額則達一千二百六十萬鎊，其中英國佔六百四十萬鎊，美國佔五百三十九萬鎊，其他國家佔十萬鎊。這樣巨大的輸出超額，完全靠鴉片輸入來抵補。一八五六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值三千五百萬元，英印政府在這一年內，鴉片收入二千五百萬元，佔國家收入總額的六分之一（一八五三年佔七分之一）。嚴禁鴉片，等於致英印政府於死命，這是英國爲首的侵略者反對天國的基本原因。其次，天國允許將來外國人可在中國辦新式交通和工業，那時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帝國主義階段，不能大宗向國外輸出資本，事實上等於天國有將來自辦新式交通的意志。英國會議員斯威士萊登對選舉人演說：「假使中國成爲一個大工業國，那我們不知道，歐洲從事工業的居民如果對於自己降到自己競爭人的地位，如何能夠經受得住和這些競爭人的鬥爭」（『資本論』引）。他們深怕「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的中國人」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反對天國的第二原因。所以英法雖然宣布局外中立，是對蓬勃發展的太平革命勢力有所顧忌，並非善意的真正中立。太平天國考慮禁烟問題，不願引起外國衝突，採取消極政策，停止向江浙作軍事行動（賴文光『供辭』說明這種政策確是畏避外國侵略者）。其實乘革命漲潮奪取上海，與英國訂約逐年減少鴉片輸入量，英國爲保持絲茶貿易（產地在天國境）及發展布匹貿易（英國特產），衝突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政治思想與
宗教問題

洪秀全倡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中國廣大窮苦人民反官紳地主富商高利貸一切封建剝削制度的產物，同時它又是英國大砲的產物，這就是說，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有機地聯繫着的。秀全生在國際貿易發達的廣東，通過基督教接受某些資本主義影響，與人民反對封建剝削的實踐要求結合起來，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與周禮中制度，形成一套特殊的上帝教義，其中包含着民主內容，主觀有共產主義的空想，客觀上正是資本主義要求發展的反映。

洪秀全的上帝是不等自由博愛的上帝（楊韋內訌以後，上帝變樣了），是戰鬥詛妖的上帝，總之是一個革命的上帝。恩格斯說：「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在當時（歐洲資產階級開始革命時代）都要帶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對教會（天主教會）」。上帝教正是這樣的宗教，它不要在中國有六七千教徒的天主教做朋友，却要和一千四百教徒的基督教做兄弟，這不是偶然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權力集中的天主教會，而有散漫繁雜的菩薩、神仙、孔子、儒先、以及無數牛鬼蛇神，替封建統治者服務。洪秀全把「正」的方面集中出一個「皇上帝」，「邪」的方面集中出一個「閻羅妖」，鬥爭營壘劃分得很清楚。他開始傳教，一個地方紳士勸說「中國人皆拜偶像的，讓他們自由拜神罷」，這個統治階級的所謂自由，被他拒絕了，他把自己畫墓裏的孔子牌位拋棄，又打毀威風極大的甘王爺神像，上帝教徒受他的感化，從舊神權中解放出來，敢於向人

間社會要求信仰自由。當桂平縣官吏派兵捉拿洪秀全、馮雲山時，教徒大呼『我們要拜什麼神是不能受人號令的』（『太平軍紀事』）。金田起義後，清兵屠殺新墟，教徒直立受刑，不肯下跪，對清兵大呼『爲何遲遲不動手，要殺便殺罷，我是不怕死的』（『太平天國起義記』），這是多麼英勇的戰鬥精神啊！

『救世』、『醒世』、『覺世』三篇是上帝教根本教義，要求在上帝統率下，國與國平等，人與人平等，男與女平等，貧與富平等，反對私，反對妖，反對不正，反對壓迫，充滿着對閻羅妖戰鬥的勇氣。此後天國教義，都從三篇教義出發，成爲太平革命運動的最高原則。

上帝教包含宗教迷信與革命思想兩部份，在廣西，迷信部份會起了極大的組織作用，但從全國範圍說來，一般人保守拜鬼神尤其是拜祖先的習慣，不能輕易放棄，外國神耶穌更不合鴉片戰後全國反侵略的心理。太平軍入湖南境，如果參照萬大洪告示的方法，強調反滿革命理論，少提天父天兄一類耶教迷信，號召力定會增大無數倍。可是太平軍不懂得一出廣西，宗教部份必須放鬆的道理，自湖南到南京途中用東王、西王名義，發布『奉天討胡』『奉天誅妖』『諭救世人』等檄文，後兩道勸人丟邪神，拜上帝，信奉上帝教，前一道申明民族大義，鼓舞革命義憤，文字極強健有力，但至少被後兩道打折扣一半。據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會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不論左宗棠舉有其事

與否，反滿不反孔，確代表一部份士人的思想，這種人既不像官僚那樣腐朽無能，又有能力去欺騙落後民衆，是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曾國藩『討粵匪檄』特別強調『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又說『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這一宣傳，曾國藩勝利了。湘軍的領導骨幹是士人，借『衛道』名義掩護漢奸的實質，如果太平軍對士人有正確政策，可以削弱湘軍一部份實力。

太平軍出廣西境，落後的人民對完全陌生的上帝教，自然會看作外國教，接受曾國藩『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的惡宣傳。太平軍在信仰方面，應改『打倒一切偶像』爲『打倒菩薩、神仙、淫祠』，不必毀孔子關岳廟，更不必強迫人民專拜上帝，理論方面應發展儒書中進步學說（『救世』、『醒世』兩篇就是這樣做的），與平等思想結合，不必把儒經當作『妖書』。這是革命的讓步，也是對反革命的進攻，止有這樣，才能減輕社會的阻力，打擊曾國藩一類人的陰謀。但後來洪楊愈更偏重發展迷信部份，尤其是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遂行私意，僧妄自大，造成『宗教腐化』（『太平軍紀事評語』）及洪楊衝突的惡果，發動革命的工具却轉化爲破壞革命的毒索了。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在南京刊布『天朝田畝制度』，這是天國政治經濟的基本思想。文件中有下列一段話：

經 濟

問 題

「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能暖也。」

根據這個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在土地問題上產生分田法，根本推翻地主佔有土地制。

「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爲上上田，可出一千一百斤爲上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不分男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寡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半，分上上田五分。一家六人，則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半。」

這個分田法規定得如此詳盡細密，就不得不陷於空想，據現有各種史料看來，它似乎不會實行過。不會實行的原因，首先是土地與人口的配合，情形非常複雜，不像想像那樣容易；其次是滿清軍隊不斷進攻，燒殺搶掠，天國領土常起變動，農村秩序無法安定。但從另一意義看，也可以說實行了田地分配。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兩江總督沈葆楨奏報江寧府屬熟墾情形說：「鄉民自種自食，每戶不過十數畝而止，餘地招募客民，給以資本，倘加催索則席捲潛逃。」太平戰後地廣人稀，一個勞動單位（一人）一股佔

田千餘畝，與現存太平天國寶安局執照：『周志記田主租捐報明，計田十四畝八分』大致相符，據天國十三年（一八六三年）便民由單：『馮嘉龍戶本年應完漕米二斗四升』，如按十四畝計算，漕米在總收入中僅佔極小部份。因為地主高利貸者或死或逃，土地歸耕者所有，地主剝削已不存在；漕清地方政權摧毀，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舉的三條暴政也已廢除，農民有田可耕，無各種剝削，僅對天國政府繳納輕微的糧米，生活確是改善了。『太平天國外記』說賦稅極輕，農田視土地之肥瘠，分九等課稅。照曾國藩（一八六三年）說『民間耕獲，與賦各分其半』，照楊秀清奏：『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照李秀成自述：『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收足，田畝也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照林彩新『勸諭青岩民衆檄文』（一八六二年）：『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依據這些材料，太平軍取之於農民的主要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至所謂照舊捐糧，如果照滿清漕米舊規『錢糧之重甲於天下』的江南，每畝正額不過二斗內外，即使加上『漕斛』『幫費』，總數也不過六斗，佔每畝產量（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中三分之一左右（漕清錢糧太重，不在額數而在米變錢，錢變銀及其他折色、浮收、訛詐、刑追等惡弊），尙不及『公私各半』，天國農民生活與滿清統治時期對照，顯然有天淵之別。這就給『最純粹的、最激進的、完滿到合於理想的資本主義』造成最迅速發展的先決條件，太平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此，曾國藩爲首的一羣賊匪所『痛恨』的理由也在此。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實際上只是要求廢除封建私有財產）原則下，又產生聖庫（藏銀錢）、聖糧（藏米糧）制度。太平軍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領俸錢，止是食肉有區別，天王每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等於滿清知府官）每日半斤，總制以下不給肉，每逢禮拜日，各官開單赴聖庫、聖糧領禮拜錢、糧米油鹽及祭上帝物品。兩司馬（管轄二十五人的小軍官）每七日給錢一百文，普通兵士五十文，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鹽各七斤，另外有買菜錢，下級軍官可向上級請求，錢數不等，買豬鷄等供衆兵會餐。原則上天王到士兵不准私蓄財產，衣食器物一切生活費用（包括醫藥）殍廢院、老人館）全由公家供給，實際也是極大多數官員及士兵始終保持嚴格紀律，表現高度的革命純潔性。例如維多利亞主教稱太平軍紀律「較清教徒尤為嚴正」，反對太平天國的卜羅斯在致魯塞爾信裏，不能不承認「寧波已為亂軍所據，城內尚無殺戮之事，生命財產之損失極少，亂軍秩序奇嚴」這個事實。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原則下，又產生近於工業國有的諸匠營制度。太平軍領土內，集中各種工人，按技術分別設立諸匠營。照「賊情彙纂」所載，有木匠、金匠、織匠、金靴、緞錦、鐫刻等營，這種匠營止管生產物品，不管收發。又有各種典官，如典紅粉，主製造火藥；典硝，主煎熬硝磺；典鐵，主製造兵器、鐵器；典銅，主製造銅器。典官管製造兼收發，與諸匠營同為管理生產的機關。這個制度已近於手工工廠性質，比手工業提高一步。據「賊情彙纂」的批評，稱為「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

意」，足見生產效率是優良的，如果繼續前進，可以順利地轉到機器工業階段。

廢除私有財產的理想，在實行時表現為摧毀地主階級、耕者有其田，官員兵士生活共產化，工業國營三種形式，基本上是成功的。後面兩種所以成功，由於前一種的成功，前一種所以成功，由於太平軍領導者的實際行動不是硬照教義的空想，而是照顧到農民商人（主要是農民）的容觀要求。『天朝田畝制度』規定：

『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

張錫庚『難民陳述賊情記』載下列詞句，與太平軍告示（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語意符合。

『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終年所得粒米全行歸天王收去。每年每大口給米二石，小口減半，以作養身。鋪店本利，亦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

這自然是不能實行的辦法。定都南京不久，修改政策，對農民採取徵收漕米，對商人採取自由貿易，天國軍事政治才獲得隱定的經濟基礎，農村因之組織起來，金融因之活動起來。

天國領土內採取古代寓兵於農的組織法，普遍建立守土鄉官制。鄉官編制與軍隊同，平時管理民政（徵糧、工程、教育、辯訟、保舉），由每家出一人當兵，即成鄉軍

，鄉官卽成軍官。編制法全照周禮，就是五家爲伍，設伍長一人；五伍爲兩，設兩司馬一人；四兩爲卒，設卒長一人；五卒爲旅，設旅帥一人；五旅爲師，設帥一人；五師爲軍，設軍帥一人。每鄉共一萬二千五百家，成軍得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軍帥以下各鄉官，全由人民公舉。『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天朝田畝制度』）。這雖然止是有限的民主權利，但在統治階級看來，已是恐慌失色，『賊情彙纂』說『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畫無窮於此者』。換句話說，就是專制統治最損民主政治。天國人民已經獲得初步的選舉鄉官權，地方自治權，不僅從古所無，直到今天將近百年，除在各解放區已經實行了比這完備多倍的民主政治外，在其餘許多地方，人民還不會取得這些權利。

太平軍對國際、國內貿易，採取自由政策，抽稅極輕。『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烘、米爲粗貨，絲綢蘇貨爲細貨。抽稅之後，給以船票一張，如遇他軍，可以驗票放行，無票則沒收之』（『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比較滿清與天國南方商稅，得出如下的觀感：

『余自仙女廟（江蘇江都縣屬）購米後，回南京，途中遇釐卡甚多。每二三里卽有一所，草屋上懸『抽釐助餉』字樣。自仙女廟至瓜州（南京對岸儀徵縣屬）釐卡二十處，所定之稅，視法定額增加數倍，任意剝削，小民控訴無門』。這是滿清

統治地區的捐稅。『太平軍於各處所設之稅局，其組織極公平正確簡單。每鎮每村僅一所（大概是捐鄉官所管國庫），貨物已納稅者，給與憑照，不再於他處科款。』絲業之所以發達，未始不由於稅法之良善也。歐人之至南京貿易者，皆能言之。這是太平天國治下地區的捐稅。

太平天國稅法良好，境內平安（例如一八六〇年，容國帶現銀四萬兩，在天國太平縣買茶葉二十八船回上海），農民購買力增強，自然促進商業的發展。英教士洛勃特甫在『香港日報』通信說『南京城外，商務發達，秩序安謐，城內居民則衣食豐足，安居樂業』。這種繁榮情況，外國商人應該也是歡迎的，事實却相反，因為他們是侵略者，愈引起對天國的憎惡，試看下列輸出入表：

絲茶輸出（茶單位十萬磅，絲單位千包）

	上海	福州
一八五一年		
一八五二年	六〇〇	
一八五三年		
一八五四年	五〇〇	
一八五五年	八〇二	一五七

一八五六年	五九三	四一〇	
一八五七年	四一〇	三二〇	
一八五八年	五一〇	二八〇	八六
一八五九年	三九〇	四六五	
一八六〇年	五三五	四〇〇	六九

上海出口的茶，大部份產地在天國境內，絲也佔不小部份。絲茶輸出總額一般是比
 起戰前增長，英國來抵補的鴉片輸入同樣增長起來。

上海鴉片輸入

全國鴉片輸入
 (單位：百箱)

一八五三年	二四二	六六五
一八五七年	三一九	七二三
一八五八年	三三〇	七四九
一八五九年	三三七	七五八
一八六〇年	二八四	五八六

太平軍境內絕對禁止鴉片(可能少數偷運入境)，因之上海輸入鴉片不及全國總數
 的一半。一八六〇年李秀成攻入江浙，陳玉成大戰安徽湖北一帶，上海及全國銷路大
 減，太平軍與鴉片貿易不能相容，英國政府看得很清楚。而且英國又必須採購一部份江

西安徵茶（一部份在福建廣東採購）及江浙生絲，不得不忍痛用現銀購買。上海道吳麟彰記咸豐三年（一八六三年）英兵船訪問南京情形說：「英船至鎮江，賊自用旗招往過船相見，云：如有大炮火藥米糧可來銷售。英夷告以此等貨物如賣與你等。有違中國和好，如要烟土，儘有可售。答云：我處不用此物。」英國侵略者開始就憎惡太平軍，因為它是鴉片的仇敵。滿清政府取相反的方面，一面儘量歡迎鴉片，一面向侵略者搖尾求援。例如咸豐三年署兩江總督楊文定「致英美兩國公使照會」說：

「為借船助剿以安商民而全永好事：竊自賊匪擄船東下，連陷江寧鎮江……欽差大臣向榮亦以須借貴國火輪兵船為……希念兩國通商合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烟禁甚嚴，一遇我國吸烟之人，無不被殺。統希速發火輪兵船，來江剿擊，本署部堂欲為商民除害，斷不大言欺人。倘蒙允發火輪兵船前來洗蕩賊匪，必當奉明皇上，加重酬勞，而貴國借兵恤鄰之聲名，亦永傳不朽矣。」

楊文定無恥到借太平軍嚴禁鴉片作為理由來恐嚇利誘英美，充分暴露出統治階級的卑污賈爾心理。會國藩以及後來的那些獨夫民賊，思想上完全是楊文定的繼續。

太平軍在土地政策、商業政策上的成就，使外國侵略者與封建統治者由恐慌而聯合。太平軍却因領導集團內訌，使反革命有機會在虛毀這個成就，中國社會從此停滯了一百年。

婦女與婚

姻題問

太平軍根據平等自由的原則，作了偉大的婦女解放運動。恩格斯說：「在每一社會中，婦女解放底程度，是一般解放底天然尺度。傅利葉是說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我們可以說，太平軍是實行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太平軍看婦女是姊妹而不是奴隸，因此與看作兄弟的男子一切平等。在婚姻上，「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天朝田畝制度』），在經濟上，「各按家口之多寡以行分田，不論男女」（同上）。在政治地位上，女官與男官同等，最高官級是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開科取士，男女同有應試權。在軍事上，有女軍四十軍（每軍二千五百人），「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胆同殺妖」（『永安城突圍詔』）。在生產上，設立女館，學習工藝。在軍律上，「凡強姦經婦人喊冤，定即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相姦，男女皆斬」。其他如禁纏足，禁買賣奴婢，禁娼妓，禁人民畜妾，所有惡俗，悉數剷除。這樣澈底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世界歷史上不會有第二個，真是人類最光榮最先進的行動。會國藩號召「扶持名教，敦敘人倫」（『討粵匪檄』），就是要驅迫婦女回到奴隸園裏去生活。

婦女解放運動改變了婦女的卑弱姿態，英人吳士禮在『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裏說

供淫亂，侵略者仇視進步，本無足怪。可惜是太平軍領導集團中人多數趨妄，洪楊尤縱慾腐化。吳士禮說『他們每藉神聖下凡的啓示以爲作惡行淫的護符，甚且藉以廢除第十誠』，這是事實，楊韋二人爭奪美色竟成爲內訌的原因之一，不免給解放運動留下一個污點。

太平天國的建設在政治經濟方面一般是成功的，外交方面避免衝突，取得英美法式上的中立，還不算大失策，只有軍事方面戰略指導錯誤，失去鴉毀滿清中央政權的機會。雖然石達開在上游仍能保持進攻形勢，擴大革命領土，但却在勝敗相持的緊急關頭，發生內亂，便功敗垂成了。

第五節 太平革命衰敗時期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本時期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六年楊韋內訌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八月安慶失守，革命勢力處在防禦地位。會國藩逐步進逼，戰爭是爲了打破合圍形勢。後期從安慶失守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六月南京陷落，革命勢力處在被圍困地位，反革命合圍成功，戰爭爲了解圍，自然解圍是不可能的，太平革命終於失敗了。

(A) 前期的革命形勢——防禦

永安封王以後，楊秀清專擅領導權，洪秀全退居閒散，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向榮『迭次詢訪難民口述賊情片』裏說『臣等於抵金陵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愈稱洪秀全實無其人，聞已於湖南爲官兵擊斃，或云病死，現在刻一木偶，飾以衣冠，秘置僞王府內，揚逆七日一朝，其餘受僞職者皆不能見』。雖說是謠傳，但洪秀全止是名義上的領袖，可以想見。秀清上逼秀全，下壓韋石，彼此猜忌怨恨，繼續增長。咸豐六年七八月間（一八五六年八九月），向榮已敗逃，南京城圍暫解，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他選擇這個時機，顯然顧慮到鞏固內亂時，免外敵乘機攻城。北竄二王也密謀『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李秀成自述』）。章昌輝是豪紳地主出身，野心極大，自成一個人於楊黨的所謂章黨。秀全密令昌輝圖楊，昌輝從江西急速入京，殺秀清及楊黨（當然不全是非秀清私人）數千人。達開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殺害許多之人，狼狽趕回，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翼王走上安省。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洪仁發）福（洪仁達）兩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非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策計，一味固執，認識天情，與我天王一設

之意見不差，壓制翼王。逼翼王他逃」。這是李秀成所說當時實情，最爲可信。從這裏可知大批革命戰士在楊黨、韋黨罪名下被冤殺，損失是不可數計的。洪秀全遠反衆意，逼走石達開；他是唯一勝任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物，如果天王親理朝政，任達開爲輔佐，局面可能比秀清專政時期好轉，秀全這一認誤處置，損失也是不可補償的。達開走後，秀全依然過着腐化生活，隱居深宮，朝政委託衆人厭惡的蒙得恩（嬖臣）、洪仁發、洪仁達（二洪是秀全胞兄）三人掌管，後來又加入洪仁政、洪仁玕（二洪是秀全堂兄弟）二人。這些人都是貪鄙醜態，專做危害天國惡事的破壞者，弄得「人心敗壞，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各有散意」（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陳玉成爲首的革命力量在戰場上支持，天國早就覆亡了。太平軍一壞於楊秀清的專橫跋扈，再壞於韋昌輝的瘋狂屠殺，最後壞於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後一壞，歷時較久。禍國的軍令政令迫使太平軍逐步削弱以至於潰滅。

石達開是個人英雄主義者。洪氏集團和他決裂，並不等於太平軍和他決裂，不該獨立行動，企圖自己創業。他的錯誤行動，終於覆軍喪身，太平軍也勢孤敗滅，個人英雄主義害了他又害了太平軍。

韋昌輝殺達開一家人，達開在安慶讓湖北洪山軍到安徽寧國，準備報仇。秀全借東楊餘黨之力殺昌輝，召達開入京，用「留京輔弼」名義，解除達開兵權。東楊餘黨謀大殺韋黨，幸得陳玉成反對，說：「太平軍皆東北二王舊部，如欲株連，非殺盡太平軍

不可」。但楊韋兩黨結成深仇，人人自危。當時守武昌城主將正是昌輝的兄弟韋俊，他是太平軍驍將之一，如果城外洪山援軍不撤退，楊軍餘黨不互仇，武昌可以堅守不失。洪氏集團既不派遣新援軍，又不安慰守城軍心。十一月（十二月），韋俊因糧盡退出武昌。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韋俊投降湘軍，太平軍從此喪失上游重鎮，無力再圖恢復。達開受洪氏排斥，疑慮不安，又感到大勢已去，南京難保，咸豐七年五月（一八五七年六月），約集將士十餘萬人往安慶，與太平軍分裂，自成一軍。

正當太平軍內部分裂的時候，反革命陣營也起了頗深的裂痕。原來咸豐帝並不信任這個漢奸頭子——曾國藩，相反，對他和他的湘軍懷着極大的猜忌心。咸豐帝聽到楊韋內訌，非常快意，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作出兩種估計。一是「該逆（石達開）於賭賊之中，最為凶悍，若令回竄江西，占踞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一是「該逆倘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使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他着重第二估計，怕曾國藩貪功殺降，預先把它指出。對曾國藩則加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即不遽加該侍郎等以貽誤之罪，該侍郎等何顏對江西士民耶」的訓斥，準備成功以後，免爵曾國藩及湘軍將領特功要挾。咸豐帝一貫採取這樣的態度，從來不給他軍政實權。曾國藩在「滙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摺」（咸豐七年六月）裏訴苦說「臣未奉有統兵之旨，歷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官兵，所居兵部堂官之地，而事權反不如提鎮」。又說「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為客，

總不管上司爲主，實主既已政視，呼應斷難違。這些「艱難」還不算，再加七中央政權的「部」和他爲難。他說「部類繁衆之件，亦不徑交臣營，四年所請部照，因久稽而重請，六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尙無交到確耗。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部「不承認他是正式統兵大員，因爲他『未奉有統兵之旨』，成豐帝連差遣他作軍事行動，總是避免『旨』。止用『廷寄』（軍機大臣轉達）的形式。會國藩受盡了皇帝、部、地方官的閉氣，還要受各方面的閉氣，他說『外間時有讒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辦欵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迄今歲月太久，開防之可擔太多，往往疑爲僞造。讓臣事端』。但是會國藩堅決的反革命，不論遭受多少閉氣暗氣，總抱定『低首茹歎，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他上了這個訴苦奏摺，原想滿洲主子給他一些實權，不料成豐帝毫不體恤，竟奪去他的湘軍統率權，下諭「准其開去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會國藩大出意外，再上一個奏摺，表示「軍勢未定，寸心難安」。成豐帝又給他硃批說「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也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反革命內部矛盾與革命內部矛盾互爲因果，如果翼王能善處逆境，忍受侮辱，竭力保持內部和平，必然等到反革命內部矛盾擴大，湘軍被綠營兵壓倒的機會。會國藩在家閑住一年，因石軍攻入浙江省常山，開化，縱浙湘軍將領不服調遣，成豐帝恐慌，給他辦理浙江軍務名義，去「挽救東南大局」。他「奉命即行」，又掌握了湘軍統率權，而石鑿王却成爲無

石達開的孤軍了。

石達開率大軍到安慶，轉入江西，攻取許多郡縣。當時情形是『拏獲賊中僞文，均稱石達開諭令諸賊謹守江西。凡江西境內之賊概未調赴下游，而下游之賊反由景德鎮以赴授撫（撫州）建（建昌）。蓋安慶爲石逆舊踞之巢穴，江西爲石逆新陷之土地，總督所謂石逆糾合黨與，自圖占踞，已可概見』（曾國藩咸豐六年十一月『江西近日軍情據實覆奏摺』）。照曾國藩的估計是『以大局言之，北岸安慶，南岸九江，該逆之所必爭也。以江西言之，瑞州、臨江爲根本，撫州、吉安爲膏腴，亦該逆之所不肯輕棄也』。如果透開真像曾國藩所幫那樣做，據安徽江西兩省，與陳玉成李秀成遙相應援，夾擊湘軍，不僅九江安慶可以堅守，陳玉成不會失援敗死，楊韋餘黨投降清軍可能減少，而且那時候捻軍已與太平軍合作，戰爭擴展到中原地區，革命反革命的決鬥，勝敗還是未可知的。石達開不顧皖贛有民衆擁護的有利條件，却決心遠征四川，自立一國。路線錯了。雖然擄數十萬大軍，轉戰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廣東、貴州、湖北、四川九省，歷時七年，表現了革命軍隊的高度堅韌性，到底不免一敗塗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在四川大渡河戰死）。狡猾的曾國藩，看出達開已不是大敵，咸豐九年，定四路進兵策，一意取安慶南京，把達開軍當作『流賊』，放到第二等地位上去。

石達開走錯了路，太平革命重擔不得不加在李秀成、陳玉成二人肩上。陳李都是天才的軍事家，陳保衛安慶，縱橫上游皖鄂兩省，與曾國藩湘軍、胡林翼楚軍、勝保北軍

相持數年，曾胡竭全力抵抗。微倖獲勝，陳敗安慶失陷。卒保衛南京，克復下游江浙兩省，與曾國藩湘軍，左宗棠湘軍，李鴻章淮軍，戈登常勝軍，英法侵略軍力戰數年，勝敗略等，李敗南京不守。陳李失敗主要由於洪氏集團從中破壞與石達開不願配合作戰，第二個原因才是外國侵略者直接幫助滿清，共同鎮壓太平軍。

本期戰爭以陳玉成安慶保衛戰為主，李秀成東征軍爲輔，戰爭目的在打破反革命軍進攻南京。

陳李聯
合作戰

楊韋兩黨互殺，再加石達開帶走將士十餘萬人，太平軍實力大受耗損。陳玉成勇猛有戰功，又是洪仁玕的姪婿，李秀成新招張洛行、龔得樹等部捻軍，號稱五十萬，兵力最大。洪秀全不得依靠陳李來支持局面，但並不真心信任。

咸豐七年九月（一八六七年十月），和春、張國樑陷鎮江。八年三月（一八六八年四月），和張進至雨花臺，又建立江南大營，與德興阿的江北大營隔江呼應，掘長溝，困南京城。四月（五月），九江被湘軍李續賓部攻陷，守將林啓容全軍一萬七千餘人戰死，無一人投降。這時候南京，安徽同時危急，天王下詔在外將領勤王，沒有人奉召來救。天王只得封秀成爲忠王（陳玉成先封英王），都督中外諸軍。秀成威信極高，親到安徽縱陽鎮（桐城縣東南）大會各鎮將領百餘人，慷慨誓師，諸將都願服從指揮，太平軍重新團結起來。在縱陽大會上定計先破江北大營，通南京糧道。八月（九月），秀成聯合

玉成前後夾擊，大破德興阿、勝保馬步軍，殺萬餘人，又大破張國樑援軍，江北大營潰散，南京與江北的交通恢復。李續賓得九江，乘勝進攻安徽，連陷太湖、潛山、石牌、桐城等地，九月（十月），攻三河鎮。陳玉成率兵往救，李秀成援軍繼進，大破李續賓軍。李續賓是湘軍主力，一戰被殲滅，文武官死四百餘人，兵卒死六千餘人。反革命所打擊，止要看胡林翼自供就很明白，他說：『三河敗潰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而且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這兩次大捷，都由於陳李兩軍聯合作戰，此後陳玉成經營安徽，拒湘軍進攻安徽，李秀成守浦口，拒江南大營進攻南京，陳李兩軍各當大敵，事實上不能機動佈置，互相救援了。

陳玉成安

慶保衛戰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曾國藩胡林翼定計，合湘楚兩軍水陸全力，四路進攻安徽。陳玉成聯合張洛行，襲得樹等捻軍十餘萬人奮力抗擊，激起革命反革命空前激烈的戰鬥。正營兩軍在太湖、潛山一帶惡鬥，十月（十一月），池州（貴池縣）守將章俊投降湘軍，『情願收取蕪湖。太平關、建德等處，立功贖罪』。這個無恥的叛賊『久踞池州，所部不下數萬，強悍衆多』，『且係狗逆（會胡極怕陳玉成，呼爲狗逆，四眼狗以洩忿）舊屬。於用兵機謀，早能觀破』（胡林翼『致揚載福書』）。會胡如獲至寶，賞他一萬兩銀子，一個『游擊』虛銜，他也表示『投誠歸順，無有二心，請調赴皖北，以圖報效』。他娶取得信任，劉玉成軍確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九年十一月（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兩軍大會戰，十年正

月（一八六〇年二月），玉成軍戰敗。胡林翼稱這次戰爭爲「軍興數年以來僅見之大戰」（『克羅太湖縣城疏』），「此次血戰似係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覆官文書』）。當「前敵軍情，萬分吃緊」的時候，急得曾國藩幻想「狗已冥誅」，胡林翼急得「近日肝氣決裂，見兵將尙和，見吏則怒不可解，有痛罵不堪者，自知太過，百怒不可遏，大約是病矣」（『致曾國藩書』）。大戰的結果，太平軍失去太湖，潛山兩個縣城，湘軍曾國藩進駐集賢關，開始圍攻安慶。

陳玉成敗後退軍，會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營。胡林翼料到太平軍秋後定要反攻，惶恐地說「不過三個月，狗技又耗，狗膽又雄，楚其肝食矣！又終是天下之禍根，弟苦心焦慮六七年矣，竟未能屠滅此賊」（『致丁月台書』）。五月（七月），他請求咸豐帝允許添募湖南勇丁，說「去冬今春兵力未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與曾國藩合力圖謀，血戰月餘，屢瀕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壞（指江南大營潰散），賊勢既無所顧忌牽綴，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待智士而已知之矣」（『奏陳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總斷情形疏』）。他竭力籌備戰守，嚴密戒備，趁玉成軍在下游，催促楊載福、彭玉麟水師攻取樞陽，他說「樞陽爲安慶之吭首，不得樞陽，不能合圍，卽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五月，楊彭督率後部血戰攻破樞陽。這個叛賊立了大功，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說，「韋軍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

良苦，要國藩令章俊率重兵守樅陽，並保薦他得官職。太平軍失樅陽，安慶形勢愈益危急。

九十月間（十一月），玉成率黃文金、楊輔清、吳汝孝等聯合捻軍襲得樹、孫奎星等十餘萬人救安慶。曾國荃被猛攻，準備撤退圍城軍，章俊自樅陽出兵斷絕糧道，玉成軍乏食，國荃用章俊計，屢獲勝利，玉成退歸桐城。

與玉成救安慶同時，李秀成自浙江回南京，奉天王命援皖。江西湖北各州縣起義首領四十餘名，派人向秀成「公呈降表投軍」，約定援應太平軍。秀成軍攻破皖南黟縣，入浙江轉向江西進發。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春，陳玉成直搗胡林翼的老巢——武昌，李秀成直搗曾國藩的老巢——祁門，造成太平軍與湘楚軍戰爭以來最緊張的一次大戰。陳玉成軍自桐城趨霍山縣攻入湖北，沿途連敗敵軍，勢如破竹。二月（三月），攻克孝感、黃州、德安、隨州、黃安、黃陂等城，民衆武裝響應，僅德安一處，就有二萬二千餘人，當時胡林翼楚軍駐太湖，助曾國荃圍安慶，不會想到玉成行軍「風馳雨驟，晝夜兼行」，飛調水陸援軍，一時緩不濟急。武昌城總督滿人官文，昏瞶無能，守城旗兵綠營兵總數不滿三千。他料定武昌必失，大勢已去。本來太湖大戰，已經嚇成大病，這一次悲觀已極，索性連「軍報亦廢擱不閱。五心燒熱如火炙，夜間尤甚。咳嗽吐濃紫色血」，希望速死（八月裏吐血死去）。這個危局怎地得救呢？自成豐八年（一八六八年），英國在漢

口取得租界，它用武力阻止陳玉成渡江取武昌，把一羣反革命從絕處救活了。玉成分兵協助人民守城，自率萬餘人回救安慶。

李秀成屢破曾國藩軍，二月（三月）攻克景德鎮，絕曾軍餉道。曾國藩是向來不上戰場的，這時候急了，三月（四月），親到休寧督各軍攻徽州城，希望打通浙皖交通線，一戰大敗，逃回祁門。秀成軍圍祁門猛攻，曾國藩困守絕望，寫遺囑給妻子，準備自殺。這個漢奸頭子三次尋死，靖港、鄱陽湖是倉惶失措，這一次是計窮力竭，形勢比前兩次更嚴重。自然，所有漢奸都拚命救他，左宗棠在樂平打了大勝仗，秀成撤圍入江西，攻克大部份郡縣，把安徽放蕩了。他得江西湖北起義首領和民衆接應，行軍順利，五月（六月），由吉安、瑞州進佔修水、武寧、逼近湖北。胡林翼全力抵禦，節節敗退。六月（七月），秀成佔領興國、通城、蒲圻、崇陽一帶城池，武昌萬分危急，嚇得在太湖的胡林翼「咳逆彌甚，嘔血日至升餘，形銷神瘁，氣息奄奄」（『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秀成無意進攻武昌，長江被湘軍水師封鎖，望見楚北的玉成軍旗幟，也未設法渡江會合。他收得起義民兵三十萬，退出楚南，經江西攻入浙江，放棄與陳軍的配合作戰。三月間，玉成率馬步精兵回救安慶，與曾國荃水陸軍大戰，不能取勝，他留下劉鎗林率『平日第一枝悍黨，戰守可恃』（曾國藩語）的精兵守集賢關營壘，自己去南京求救。五日曾軍攻擊集賢關，劉鎗林被殺，這次戰敗，損失異常巨大，曾國藩說『查粵逆自出擾以來，我軍所斬長髮老賊至多不過數百名，此次殲滅長髮賊至四千名

之多，實爲從來所未有」(「官軍圍攻赤崗嶺賊壘悍賊殲除摺」)，胡林翼說，瑜林是「悍擊著名，四眼狗所依賴，此次就擒，老賊誅戮殆盡，功抵塔忠武(塔齊布)番州、李忠武(續賓)九江矣」(「致曾國藩等書」)。玉成得到敗報，趕回再救安慶，但精銳傷亡太多，雖經幾次血戰，仍不能挽回頹勢。八月(九月)，安慶終於陷落了，守將葉芸來率全軍戰死。

陳玉成想去湖北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由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廬州(合肥)。英王見勢不得已，亦是隨回轉頭廬城。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頗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李秀成自述」)。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四月，廬州失守，玉成率殘兵往壽州(今安徽壽縣)，被團練苗沛霖誘獲，獻給清帥勝保。這個太平軍兩大支柱之一的英王爲革命犧牲了！他死時還只有二十六歲。

陳玉成的主要對手是胡林翼，他怎樣畏懼玉成呢？他說「賊勢較石逆爲少，賊計較石逆爲狡爲悍」(「致金觀察書」)。尤其畏懼玉成的深得民心，在致羅澹村信裏說「昔年民欲賊來，不肯清野，近年民不願(？)賊來，然尙不肯清野也。欲清野，尙待創深痛鉅之後」。於是自己率領一羣民賊來製造「創深痛鉅」，教州縣官要「居今日而圖治，非用震懾手段不能顯善睦心腸，必須辣手示懲，使知畏法」(「復吳陽縣賀月樵」)，這等於說「不聽反革命的命令者殺無赦」。又教軍官放火燒城，說「得城之時，

密派勇丁各持一炬，將城內大小房屋米糧付之一炬，片瓦不留，則異日必無賊可守矣。」（『擾吳幹臣』）。統治階級推崇備至的『胡文忠公』，就是這樣一個出賣民族專門殺人放火的強盜。他還強迫文武官員搶糧，在札余副將霍山縣裏說：

『查霍山樂兒嶺附近等處，士民無仇賊之心，有助賊之意，將所有穀米圍聚，不碾不售，以致兵食缺乏，試問是何居心？應由余副將嚴查有穀有米之家，出示封鎖，勒令運營出售。如該處士民始終抗拒，其中必有不明大義、甘心助賊倡率阻礙之紳民。仰即查明擱斬十餘人，並將米穀充實。倘該將有心討好，不知輕重緩急，姑息養奸，定予嚴參。』

紳民有米不願出售，這就該『擱殺十數人麼』？他又不反省一下，爲什麼紳民『有助賊之意，無仇賊之心』，這不是所謂官、實際是民賊，而所謂賊，實際是民友的鐵證麼？自然，民賊是不能反省的，因爲他們的頭腦是剝削階級的。試看他『致前敵各營書』：

『舉賊竄擾以來，皖民受禍既久，迷溺尤深，誠恐軍行之際，賊黨造作謠言，蠱惑人心，果於從逆，亟應出示曉諭，破其從前之惑，予以自新之途，亦知散賊黨之一法……俾其家諭戶曉，去邪歸正，實爲至要。』

人民解放叫做『受禍』，覺悟叫做『迷溺』，當澳洲奴隸叫做『去邪歸正』，堅決反抗異族侵略者叫做『果於從逆』，這就是從民賊們特殊頭腦裏發出來的特殊語言。

民族英雄陳玉成被反革命殺害了，竟被描寫成殘暴無比的「狗逆」，究竟誰是狗是逆呢？可看英國人令利「揚子江日記」：

「此處（指南京上游大通地方）村落，荒苦不堪言狀，其破壞之遺跡，大都政府黨兵士之所爲也。太平黨兵士之蹂躪，焚燬寺院，瓦礫無餘，此其遺跡，所有而是。而政府黨兵士之蹂躪，則父老痛哭而談，以爲奸淫婦人，妄意殺戮，慘無人道，太平軍之暴行，不過強人民益其運輸糧食，若寧辱婦人，則往往處以死刑，罪人之首，高揭於犯事之地。尤記太平軍之名，所謂英王者，訓其部下，不得妄取民間一物。政府黨之兵士不及遠矣。」

李秀成南

京破圍戰

江南北大營是咸豐帝與曾國藩也就是反革命內部滿與漢矛盾的產物。咸豐帝的計劃是湘軍出力，江南北大營收功，因此對它特別重視，兵額增至七萬人，餉原指定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廣東、江西等處供應，幾乎佔東南財力的大部份。大營唯一戰將張國樞與和春成見很深；軍隊是湖南、兩廣人，各地流氓的雜合體，軍風紀是「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爲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羣與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烟館，淫心蕩志，極樂忘疲。」（胡林翼飭各統帶查辦各營）。它逼近南京，形式上成爲可怕的大敵。但實際大敵是上游的湘楚軍。太平軍對江南北大營應取守勢；對湘楚軍應陳李聯合全力攻擊，首先要確保安慶。

咸豐十年正月（一八六〇年二月），張翼樑攻陷九江洲要寨，南京震動。胡林翼給曾國荃信說：『江南得九江洲，敵動一切，東南疲功尚早，我輩自行其志，不睬他人。』曾胡看得很真切，一心爭奪安慶，李秀成却看錯了。定策消滅大營。秀成率精兵自皖南攻入浙江，以調動江南大營。二月（三月），破杭州城。大營果分兵救浙江，秀成軍從間道馳回南京城外，玉成軍也從上游來會。閏三月（五月），大破江南江北兩大營，和春張瀆樑敗死，大營潰散。

這次戰爭在革命反革命雙方都是重要的關鍵。太平軍方面，李秀成着重下游用兵，想佔領江浙兩省作根據地，他到江西湖北，是招收投軍新兵，目的不在爭奪上游。陳玉成往來江北成了孤軍，得不到秀成軍的有力援助。從此太平軍形成江南江北兩個獨立軍，勢力分散，江浙軍事勝利，反加速南京的陷落。反革命方面，咸豐帝計劃失敗，不得不全部依靠曾國藩，給他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的軍政實權。指揮統一了，餉源充裕了，反對派不敢爲難了，湘軍的勢力和地位從此大進一步。左宗棠聽到大營潰散，歡笑道：『天意其有轉機乎！江南大營將蹙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滌，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聽到曾國藩得兵權，政權，喜歡道：『藩帥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劍極而復，天下土氣爲之一振。』反革命的喜歡就是革命的困難，李秀成還在注自江浙上海，不急救安慶，敗局不可挽回了。

(B) 後期的革命形勢——臨守

安慶失守，南京危在旦夕。正以太平軍振作精神，死裏求生的緊急關頭。李秀成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可是洪秀全和洪氏集團黨化了的習氣太深，眼中只看見南京一座孤城，心中只依賴天爺一位『上帝』，拒絕李秀成棄城運動，向遠大處現實處開闢新環境的建議，終不免於亡國慘運的迅速到來。

楊韋內訌後，洪秀全在精神上喪失了永安以前的發皇氣象，也消失了內訌以前的信人勇氣，繼續增長的却是暮氣沉沉的保守思想。他要保有自己的地位，對臣下採取有疑忌沒有團結，有懲罰沒有愛護的消極手段。像李秀成陳玉成那樣忠義有功，人人信服的

大臣却更遭他的猜疑，竟亂封九十多個王來互相牽制。結果『人心不服』（李秀成語）『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曾國藩語）。太平軍呈瓦解現象，主要將領許多投降滿清，出死力攻擊太平軍，變成了滿清的猛將；這固然由於叛徒們無恥貪生，出賣革命，但秀全猜疑政策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洪氏集團專擅政權，把楊秀清時代建立的聖庫。聖糧制度破壞無遺。照李秀成自述所說：『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接戶查尋男女（人口），不得安然』。就在最後一次圍城中，還是『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

查管掌，我（秀成）在京並未任閫城之專，見秀成『慈愛軍民，恐有自害國之心，聲言我（秀成）忠而變奸』。李秀成所說『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事實上洪氏集團正是秀全猜疑政策的產物。

洪秀全和洪氏集團本身並無兵力，不能抵禦反革命的攻勢，握兵權的李秀成，軍事上自有一種見解，與洪秀全不合，對洪氏集團更是嚴重的對立。太平軍內部紛歧，力量分散，大局難法挽救。但天國還延長二年，這全靠李秀成爲首的一枝軍隊對革命無限忠誠和江浙人民對革命的有力支持。

咸豐十年閏三月（一八六〇年五月），秀成軍破江南大營，追擊潰兵，四月（六月），取得常州、蘇州、嘉興等地，江浙肥沃地區大部份歸入天國領土。這種意外迅速的戰勝，與其說太平軍的勇猛，不如說人民力量的偉大。例如李秀成到蘇州城外，『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民房，門首俱貼字云：『同心殺盡敵和兩帥官兵』。秀成在新領土施行善良政治，民心悅服，合力守衛解放地區。滿清江蘇巡撫薛煥勾結美國人華爾（F. J. Ward）率洋兵進攻青浦縣，秀成率兵迎擊，『兩陣交鋒，鬼兵大敗，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槍二千餘條，大砲十餘條，洋刀三百餘口，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圍』。『李秀成自述』。乘勝攻克松江，進兵至徐家匯，離上海十八里（曾國藩也承認『上海舟師（洋兵）大挫，危迫殊甚』）。英法兵替滿清守上海城，秀成準備進攻，因嘉興方面軍情緊急，退兵救嘉興，上海解圍。

這一次追擊戰，是洪秀全陳玉成解救安慶的計劃。原計劃是『派楊輔清、李世賢、李秀成等直取蕪常，再攻徽浙，以入江西；又派吳如存、張洛行由定遠、壽、穎、六、霍入湖北，定於秋間，開路大舉』（會國藩安慶軍營搜獲『陳玉成自南京發來密件』），這計劃確打中了滿清的要害，反革命全體大恐慌，議論紛紛，都注目到下游地方，咸譽帝認爲湘軍『規取安慶，頓兵堅城，即使安慶得手，亦歸得不償失』，嚴令『會國藩接奉此旨，即統李所部兵勇，徑赴蘇州，以保至東南大局，毋稍遲誤』（十年四月七諭）。『會國藩』胡林翼是不動搖的，他把湘楚軍主力死釘住安慶，奏稱『但求立脚之堅定，無論逆氛之增長』（會國藩『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摺』），一面保薦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分任浙蘇贛三省軍務，自己督大軍全力進攻安慶，洪陳計劃被會胡破壞了。

李秀成似乎不會參與洪陳謀議，自述說『自六解京圍（江南大營潰散）之後，愚兵三日，天王嚴詔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蕪常，限我一月肅清回奏。人生斯世，時爲其用，不得不從』。他出兵是勉強的。後來用兵順利，民情愛戴，又見物產富饒，洋兵易打，產生取江浙作根據地的思想，對上游甚至南京比較看輕了。九月，陳玉成在安徽大戰，『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軍而掃北。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掃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出師而上江西，湖北』（『李秀成自述』）。當時江浙並無大敵，會胡又不肯中計，調秀成軍援皖是完全必要的，不過那

種強迫命令的方式，使秀成不能忘情江浙，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上半年經江西入湖北，收新兵三十萬。石達開部逃兵二十萬，又回到浙江來。陳玉成在皖北戰敗，奏調秀成兵千餘人助守安慶，秀成不甚願意，並預料『其省不能保也』，集賢關慘敗後，又不撥大兵助玉成恢復實力。安慶失陷，秀成至少要負不相救的責任。

安慶失陷的危險性與會胡的戰略目標，秀成沒有足夠的認識，加深了洪秀全及洪氏集團對秀成的猜疑與裂痕。洪秀全的戰略思想着重在上游，用兵江浙止是牽制性質。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滿清與英法（兩個主要侵略國）訂天津條約，出賣長江流域，英法更不許革命勢力的伸張，反對太平軍到達江浙地區，秀全深知這種情形，一向不主張東進。十年（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準備進攻天津，怕太平軍來上海，英法軍艦隊司令賀布往南京，提出『太平軍不得行至距上海、吳淞二日路程以內，英軍也盡力阻止清軍從上述二地攻擊太平軍』的條件。得秀全允許，約定以一年為有效期限。秀全利用這個時機，規定用兵限於江浙內地，不攻上海，避免與侵略者直接衝突。英法聯軍在北方獲得意外迅速的勝利，背約攻擾太平軍，引起太平軍的反擊，當時反擊是需要的自衛，但進攻上海却給英國藉口保護上海正式作戰。賴文光說：『忠王李秀成，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賴文光自述』）。忠王經營江浙，顯然與秀全計劃不合，被看作違反『君命』的自由行動。洪秀全失和，雙方都該負責，但在力爭上游這一點，秀全並不錯誤。曾國藩稱『洪逆老於戎

行」，足見反革命是認識他的。

李秀成於十一年六月（一八六一年七月），自湖北經江西攻入浙江，克浙東各府縣，十一月（十二月），克杭州省城，浙西相繼攻克，浙蘇兩省膏腴盡爲秀成所有。會國藩稱「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太平軍的聲威，確把一切反革命駭倒了，連會國藩也動搖起來，要會國荃遵旨去救蘇杭。國荃却說「不然。金陵爲賊之根本，我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可以圖蘇杭之地」。國藩因此又堅持原定計劃，派國荃到湖南添募新勇，準備進攻南京。滿洲主子西太后給國藩節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軍政大權，並公開宣示「江浙等省軍務朕惟會國藩是賴」。這是滿洲皇帝第一次對羣族奴才低頭，但這個奴才有誰可氣呢？當然，他止有向外國侵略者屈膝依賴。

會國藩的計劃首先依賴外國侵略者保護上海，說「目下情勢，合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同治元年二月「遵旨進籌全局摺」）。其次是想乘太平軍英勇抗擊侵略者的機會，從中取利。他說「臣處搜殘僞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畔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逆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魯逆之會也」（三月「籌議借洋兵剿賊摺」）。他又規定對洋兵應取的奴隸態度，說「臣等謹將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

義，更無防範之方（六月「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他那種對太平軍幸災樂禍對侵略者奴顏婢膝的漢奸民賊思想，被一切反革命分子奉爲典範，李鴻章、左宗棠都依樣實行了。李秀成敘述當時漢奸軍「忠信篤敬」的情況說：「鬼兵到太倉攻打，外有清兵前來助戰，打入城者，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官兵不敢與言，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但漢奸軍還有另一副兇殘面目，李鴻章「與彭玉麟書」說：「該軍（「常勝軍」）往往破賊，而不能多殺賊，故須我軍偕作，以輔其力之所不逮也」。這樣絕非人類所有的殘忍性，甚至戈登（Gordon）也以爲太甚，斥責李鴻章，鴻章的答覆是「此中國而非歐洲也」。這就是說按照中國統治階級的特性，應該瘋狂屠殺中國人民。不過這自然不是因外國反革命者如戈登那一類人對中國人民還有些人類同情心。李秀成、譚紹光（守蘇州主將）「致戈登書」說「戈登桂（貴）台惠覽，頃接來信，知欲放出受傷諸人，以便醫治，並欲往來買賣槍砲，兼有回去之人，道及我處待人情誼，故來候函，具見桂台義重情摯……今者桂台之助清剿，亦猶白聚文之來我處，各從其便。至各人軍裝砲械，彼此皆知底細，你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此時你處如有槍砲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若或桂台肯到我處，我等亦樂共事……即或桂台一騎進城亦無不可」。這裏說明太平軍行動文明，放向受傷俘虜，使戈登不敢過分殘殺太平軍，更重要的是軍火貿易，有利可圖，使他不願過度破壞太平軍。

李秀成佔領江浙，外國侵略者當然要武力干涉。同治元年三月（一八六二年四月），李鴻章率淮軍八千人到上海，聯合英法軍，「常勝軍」，開始對太平軍作戰。太平軍抗擊反革命聯軍，勇敢堅決，充分表現中國人民無限的英雄氣概。反革命聯軍有強大的力量：第一、英國、法國駐滬海陸軍，配備着當時最新式的武裝，有英法反動政府作後盾，聲勢最盛。第二、美國流氓華爾統率的「常勝軍」，人數約五千，外國軍官約一百五十人，軍餉每年多至九十萬兩，每攻下一城，滿清酬華爾本人銀三萬或三萬六千兩（戈登攻下蘇州城，酬銀八萬銀）。事實上華爾及「常勝軍」的主要收入，不是從報關和軍餉，而是被漢奸們所承認的搶掠。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一八六二年九月一日）李鴻章「上會相書」裏說：「華爾今日見過，諄求鴻章札調協剿金陵，謂三日到，三日紮砲台，三日攻打，定可克城。克城後財物與官軍均分等語」。曾國藩要獨佔南京財物，當然不允許華爾李鴻章來均分。但是這封信提供了一個鐵證，就是這一羣中外強盜公開商議分贓，毫不隱諱他們的搶掠行爲。「常勝軍」是一枝新式武裝的強盜軍隊，有居住上海的官僚、買辦、紳士、商人作主要後盾，這些人把華爾當作救星，大商人楊坊送女兒給他，鼓勵他的戰意。第三，李鴻章統率的淮軍是一枝屠夫軍隊，武器用外洋槍砲，專跟在外國軍隊後補充殺人並接收土地。它有整個統治階級作後盾，被認為江蘇方面的主力軍。這個聯合軍是反革命的結晶體，力量不容輕視，但李秀成却打了一連串的勝仗，不曾失敗過。聯合軍一敗於太倉，再敗於嘉定，三敗於青浦，法水師提督普羅帖戰艦

致命，英法軍乘嘉定、青浦兩城逃走，李秀成說：『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確是事實。不過戰爭勝利，並不能挽救南京的危急。』

正當秀成在下游用兵，五月（六月），曾國荃圍逼南京，黎營雨花臺附近。天王調秀成軍來援，秀成與諸將會議，議定『待二十四個月之後，再與曾國荃決戰』，天王急了，『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啟隊發行？爾意欲何為？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秀成被迫歸救南京，閏八月（一八六二年十月），親率大軍三十萬號稱六十萬進攻圍城軍，大戰四十六日，曾國荃死力抵禦，曾國荃飛調『常勝軍』應援，『常勝軍』不敢前來，形勢確極危急。秀成軍內未帶冬衣，九月（十一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部下各王不肯齊心合擊，曾國荃得倖守住營壘。『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職，調我當殿明責，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不冒雪前往』（『李秀成自述』）。當時上游反革命兵力薄弱，賴文光、陳得才在湖北、河南、陝西行動，聲勢浩大，洪秀全派秀成北進，會合賴陳軍，從上游來解救南京，原不失為一個計劃。可是疑忌秀成過甚，既損他的威信，又奪他的兵權，調遣秀成『手下各將，任王次兄洪仁達亂為』，江浙留守軍無人調度，任其自行。君臣上下互相猜怨，離心離德，全局更接近瓦解的形勢。秀成率孤軍轉戰江北，進到安徽壽州。曾國藩定計『急爭金陵老巢，以攻其所必救』，同治二年五月（一八六三年六月），竭全力攻破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石壘。『那時京內驚慌，天王差官捧詔，召我（秀成）回京，當即分軍回轉』，軍

士戰死、落隊及飢寒病死前後失去十數萬人，戰鬥力大受損傷。

南京陷落，這時候已經決定了。李秀成建議：「內少糧草，外救不來，饒城別走。」。棄城別走有兩個方向。走向上游聯合賴陳軍、捻軍、回軍在北方發展，證以後來捻回的強大，建立新國不是不可能的。走下游佔江浙閩粵沿海各省，利用同情革命投効太平軍的不少外國友人，運入新式軍火，繼續抵抗反革命聯合軍，也可以支持危局。曾國藩深怕太平軍「變爲流賊，更難收拾」，足見秀成這一建議是可以實行而有效的計劃。在反革命方面，當時湘軍已是精疲力盡，矛盾到處發生。首先是滿洲主子對曾國藩的猜忌。曾國藩「流陳餉緝情形片」說「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權利。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權利者，每避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憂且懼」。其次是湘軍本身腐化沒落，「臣帶兵九年，今年始有餉糧兵逃之事」（同治二年曾國藩「近日軍情並陳餉緝情形片」），湘軍初起「用儒生將農人，今則所謂儒者不儒，農者不農」（「湘軍志」「營制篇」）。其三是新起的左宗棠老湘軍、李鴻章淮軍自成勢力，用兵各有企圖，單獨行動，不受曾國藩調度（「湘軍志」「曾軍後篇」）。反革命陣營有這許多裂痕，如果洪秀全聽從秀成的建議，自率一軍北進聯合捻軍，命秀成回江浙團結部屬，攻擊沿海各省，南北呼應，重振戰局，滿清必然驚慌失措，即使譚湘軍追擊，在滿漢矛盾下（北方清帥官文、僧格林沁地位比曾國藩高，仇視湘軍），曾國藩喪失漢奸信用，無法再施展湘軍的長技（湘軍失長江

水師，又無馬隊，戰鬥力減去大半，無疑的要潰敗。可惜洪秀全疑秀成有異心，更着重提防內變，不放秀成出京，君臣困守危城，坐待滅亡，給左李在江浙方面順利地擊破各個孤立的太平軍守將。

左宗棠攻

陷浙江省

同治元年正月（一八六二年二月），左宗棠從安徽進入浙江衢州城（滿清在浙江唯一的城池），太平軍大將李世賢阻擊左軍，到六月（七月），左軍還不能出衢州境。閏八月（十月），世賢回援南京，左軍才得沿錢塘江進攻。浙江的失陷，左軍和江蘇李鴻章軍一樣，都是跟在外國反革命軍後面，做殺人、收地、搶掠的工作。外國反革命軍的取得勝利，却因太平軍失去李秀成的領導，各地孤立無援，軍心動搖，沒有整個戰守計劃。浙江失陷，不從左軍入衢州城開始而是從英法軍攻陷寧波開始。

同治元年四月（五月），英法軍艦砲擊寧波城，英法陸軍聯合滿清寧紹台道張景渠所率海盜攻城，太平軍退至鄉間抵抗。李鴻章請華爾自上海率「常勝軍」往援英法軍至慈谿縣（離寧波三十里）太平軍擊斃華爾。

閏八月，花旗國副將法爾師德輪船到定海，會同官兵民團合剿「海盜」（左宗棠「定海兵團會同輪船搜捕海盜情形片」）。

十月（十二月），「法國因寧波海口吃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帶兵防剿。該副將在寧波所屬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應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常勝軍」

舊章）支放（左宗棠『發給勒伯勒東劉德片』引上諭）。

十一月（一八六三年一月），上諭『左宗棠、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可恥的名稱！）攻克上虞一摺……惟據法國公使哥士耆言及蘇城竟日，而城中絕無動靜，遣人往視，始知賊已宵遁。與此次所奏官兵奮勇登城，賊由西南逃竄情形不符。與外國人共事，全在乎以誠信，若稍有粉飾，即爲所笑，嗣後務須據實詳報，不得一字虛假』。反革命首魁曾胡左李都是這樣的一個騙子，止是這一次不幸被外國反革命揭穿而已。

同治二年正月（一八六三年三月），上諭『據李鴻章等奏，英國擬派白齊文（White）、法思爾德會帶『常勝軍』，法思爾德現住寧波防剿等語。花旗國副將洪爾師德是否卽法思爾德』。

正月，『署總兵勒伯勒東傷故後，洋將買忒勒繼之。臣飾蔣益澧一軍會同洋將進規紹興，密囑蔣益澧與洋將共事，惟守禮示信，勿計功攘利，致啟爭競之端』（『奏報連復六縣情形摺』）。

二月（四月），『上年勒伯勒東傷故後，法國參將買忒勒權受中國副將職任，來寧接替該營兵勇。英國總兵晤樂德克親運大砲到營籌剿紹郡賊匪。正月初一日（二月十八日），晤樂德克、買忒勒帶領洋兵花綠頭各勇，車輪大砲徑攻西郭門。突有黑洋人五六十名助賊施放洋槍，彈入買忒勒腦左，登時殞命』（『查明法國參陣亡請卹摺』）。

五月（七月），富陽久圍不下，增募外國兵助攻（『湘軍志』、『浙江篇』）。

八月（九月），迭次助剿最爲出力之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呿樂德克、法國參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教主田雷恩等九員，臣細加考核，克復各城，外國官兵，實屬出力（『外國官兵助剿出力請酌賞物件片』）。

八月，楊政謨率水勇，德克碑率炮勇。此次中外官兵會攻富陽，其苦戰克城，以法國總兵德克碑爲最（『奏報克復富陽縣城摺』）。據『李秀成自述』，鬼子兵攻寧波得賞銀之後，又領賞銀來打紹興，錢塘江上游太平軍恐後路斷絕，陸續放棄金華、龍遊、嚴郡（今建德縣）、溫、台等地，退屯富陽。左軍才得順流而下，請鬼兵由水路攻城，配合鬼兵炮隊，連戰數十仗，鬼敗，又調鬼兵多來，攻破富陽城。『秀成自述』與『湘兵志』符合。

十二月（一八六四年一月），洋將德克碑帶花勇前來助剿，並令淺水輪船點放開花大炮（『攻剿杭州餘杭情形摺』）。

同治三年二月（一八六四年三月），德克碑開放大炮，轟塌城垛數丈（『附陳杭州餘杭攻剿情形片』）。

三月（四月），法國參將德克碑此次助攻杭城，每次攻剿，極肯出力，杭城克復，實著勞績，臣籌給紋銀二萬兩，分散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洋將助克杭城出力擬請獎賞片』）。

以上都是左宗棠勾結外國反革命軍（左與李鴻章不和，請法國人組織「常捷軍」與李對立）屠殺中國人民的一些自供，浙江人民就在這樣可恥的「中外官軍」共同的屠殺之下又被奴役了。

李鴻章攻

陷江蘇省

華爾死後，美國人白齊文繼任。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英國人戈登代白齊文統率「常勝軍」，用英國大砲五十二門會同淮軍陷常熟、崑山等城。九月（十一月），進攻蘇州，「江浙各將告急，日日夜夜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我主限我下蘇州四十日回贖，銀不交足，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李秀成自述」）。秀成到蘇州堅守，十二月（一八六四年一月），見內部有變，出城逃回南京。蘇州失陷。「常勝軍」乘勝攻陷約五十城，所謂淮軍的戰功，就在跟着「常勝軍」後大殺大搶。「湘軍志」說「復蘇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容闕「西學東漸記」說，李鴻章「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自然，大部份是後來貪污所得，不過在攻掠江蘇時，獲得大量財物，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會同藩會國

岑攻陷南京

江浙一帶太平軍一部份堅守湖州城，大部份轉入江西境。秀成帶來守城軍人數不多，因為南京食糧不能供給太大的軍隊。在危城中，秀全疑忌秀成更甚，城內居民饑餓，「賊盜蜂起，逢夜間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物」。南京無法支持了。同治三年四月（一八六

四年五月），洪秀全服毒殉國。六月（七月），南京陷落。轟轟烈烈的人民大革命同南京失陷而暫時失敗了！

李秀成奉幼主洪福衝出城牆缺口，不幸散失，洪福逃往湖州，秀成藏匿民間，奸人向清營告密，被曾國荃捕獲。曾國藩從安慶趕來，親自審問。秀成並無多言，止說『速將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實錄，爲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後。』他在囚籠中寫天國始末、本人戰績數萬字。並不隱諱天國亡國的原因，也不隱諱本人對天王的不滿。這當然不是對敵人誹謗自己，而是想借最後一個機會流傳天國信史（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情事真確』），給未來的革命人民留一悲慘教訓，用心是極苦的，萬惡的漢奸曾國藩既把洪秀全掘出遺體『戮屍焚化』，又把『萬古忠義』（天王寫四字封秀成）的民族英雄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獸）心』（曾國藩『賊會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這已經是盡殘忍兇暴之能事，但曾國藩還要對死者行最後的侮辱。他不僅刪去秀成自述至少一半，塗改字句不知若干，而且卑污到代造乞憐語句和什麼『招降十要』、『天王十誤』。曾國藩明明說他『文理不甚通順』，而這些僞品恰恰文從字順，與真品顯出兩手，又明明說『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秀成如果真有乞降的意思，正可『誘以甘言，許以不死』，爲什麼怕他『在途不食而死』？曾國藩所代表的這類人，自己穢濁黑暗，却要忌別人的清白光明，定要讓死人也蒙些不潔才覺快意，真是狗彘不食其餘的可恥儒

夫。

第六節 太平革命失敗的原因

太平革命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經濟、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運動。自從太平革命揭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陳勝、吳廣以下數千百次的舊式農民起義，面目爲之大變。太平革命是中國歷史對時代的大事件，與五四運動同爲一百年來歷史上兩大轉變時代的標幟，它的光榮成就永不會廢滅，它的偉大精神也永遠在繼續和發展。

太平革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主觀方面，主要由於領導方面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歸納起來，有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安樂思想三種。

宗派思想

永安突圍以前，太平軍領導集團包括革命各階級各團體，從工人、農民到富農、流氓無產者、兵士、失意士人、某些政治上被壓迫的地主、豪紳、商賈；從新式的上帝會到舊式的天地會，團結在反滿旗

幟下，展開廣泛的革命運動。永安到南京，勢如破竹，就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效果。洪大全死後，上帝天地兩團體開始分裂，失去一部份助力。定都南京以後，宗派思想繼續發展。第一，老兄弟之間的分歧。洪秀全爲首的廣東派與楊秀清爲首的廣西派發生裂痕，

廣西派壓迫廣東派。例如智勇兼備的羅大綱，「嘗謂人曰，吾與秦日綱、胡以晃同起兵，功亦不相下，二人以廣西老兄弟故，皆封王，我以粵籍乃不得一侯，天下之事未有不平如此者，天王也自忘其爲花縣籍乎？秀清聞之，疑其有異志，由是不敢以重軍付之」（『太平天國野史』），又如多謀善戰的捻軍首領賴文光（秀全妻弟），「楊秀清忌之，不使聞軍事，授文職」（『野史』）。『文光自述』也說：『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秋，廣東派聯合廣西別派韋昌輝派殘殺楊派，韋派又壓迫廣東派，廣東派聯合殘餘的楊派屠殺韋派，造成極大的內訌，結果石達開出走，天國元氣大傷。第二，老兄弟與新兄弟的分歧。兩廣起義人稱老兄弟或老軍，享特殊權利，『天王倚爲羽翼，雖無職，每加功勳、平湖（胡）諸衙，有過亦不盡法懲治。而老兄弟恃功驕恣，任使多不稱其職，太平大局之壞，此一原因也』（『野史』）。太平軍初入南京時，廣東、廣西人十分不過二三，湖南十有五六，湖北八十有二三」（『那舊藻』『賊情訪聞記』）。後來湖北三江人數量大增，地位却在兩廣人下，自然引起不平之感。到太平末期，湘淮軍悍將多是太平軍叛徒，屠殺革命軍民比滿清將領更殘忍，這些人大抵出身新兄弟或楊韋餘黨，因怨恨不平投降反革命。第三，軍人與文士的分歧。『賊情彙纂』說『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爲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已也』。又說『擄來書寫人，統稱先生，

褲穿長衫，著鞋襪。小館繫黑綢包巾，大館繫黃包巾，無腰牌號掛。讀書人受到歧視，地位比士兵低，多數乘機逃走或充滿清の間諜。至於著名文士如浙江人錢江，在永安城中已封『三法大司馬』，江蘇人王韜勸李秀成與洋人講和，專力攻擊上游曾國藩軍，廣東人容闈向洪仁玕建議七策（辦海陸軍營校，改進軍隊，建設善良政府；立各種實業學校及銀行等），後都失意離開太平軍，甚至有些人轉到反革命方面當謀士。第四，英忠兩王的分歧。英忠兩王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天國支柱，可是英王在上游苦戰，不向忠王告急，忠王也不出力援助，自向下游用兵，兩王間意見不一致，多少流露在秀成自述裏。第五，天王與英忠兩王的分歧。楊韋內訌後，政權歸洪氏集團爲首的廣東派，對英忠兩王取猜忌態度，大封列王九十餘人（實際不止九十餘人），使不相統屬，意在牽制兩王，指揮賞罰不能如意。英王在安徽戰敗，洪氏集團藉口防潰兵，封江阻他歸南京。玉成『致馬婦和等論』裏說『今兄（玉成自稱）因偶爾見朝中辦事不公平，兄在廬郡具本啓奏，現下不以本章爲然，小事釀成大端』，又『致扶王陳得才等四王書』說『去歲耘天燕之案，曾經兄直奏回朝，致觸聖怒，復命敬王、畏王恭捧聖詔三道，聖旗二道責兄前退太湖後退安省……罪皆在兄。現已荷蒙聖恩，出以賞罰革黜。思慮此之時，亦是萬幸』。洪氏集團無理欺壓，使玉成處境愈感困難，絲毫不見愛護扶助的意思。玉成殉國，李秀成獨力支持，洪氏集團猜忌更甚。『去年（一八六三年）天王改政，要合內外大小軍營將相……稱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御林兵等，皆算

渠一人之兵。我等稱爲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佔其國，此實言也。何人敢稱自兵者，五馬分屍」（李秀成自述）。秀成守南京，「洪姓用廣東之人巡各門要隘」，「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滅亡在眼前，還專廣東、廣西的私見，宗派思想使人昏迷猜忌，至死不悟，這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

保守思想

太平軍佔領南京，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海進取心減退，保守心轉居統

治地位。在軍事上，北征、西征兩軍都派二等將領率領（北征林鳳祥、李爾芳、吉文元，西征羅大綱、賴漢英、石祥貞、章俊），又不指定主帥，軍情全由楊秀清遙制，缺少全力進攻的精神。在制度上，採取許多封建舊習慣。例如「太平禮制」規定各種稱謂，鄙陋可笑。禁人稱大哥，禁人用紅黃兩色，因大哥是耶穌專稱（秀全稱二兄），紅黃是「天朝貴重之物」，犯者處斬刑。官員都坐轎，天王轎夫六十四人，東王轎夫四十八人，最下至兩司馬還有轎夫四人。東王儀仗隊多至千數百人，有開路龍燈等無聊器物，很像民間迎神賽會。又有野蠻禁律，如：

一，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置。

一，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置。

這雖是軍律，並非強迫人民也跪道旁，但列王及大官對小官兵士的威嚴已經超過滿

清的制度。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頒佈『欽定土階條例』，居然恢復開闢制度世襲制度，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在洪氏集團掌政時期，事實上是否還有若干存在，是很可疑的。

安樂思想

洪楊到南京，就大興土木，建築王宮。『楊逆起造僞天王府，周圍築牆，厚若城垣，高又過之，可以俯瞰城外。臣等於紫金山遙見甚明』（向榮『奏報太平軍情』）。天王居深宮中，從不出門，也不朝見羣臣，生活腐化，中外各書所記大體相同，可信確是事實。楊秀清才能極高，腐化程度却不亞於秀全。章昌輝『雖貴爲列王，常販運貨物以營利』（『太平天國野史』）。劉瑣林戒昌輝說『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知此二語，乃免於難』，後來楊韋殘殺，原因就在『此二語』。洪氏集團統治時期，腐化發展到朽爛。仁發『貪冒聚斂，無所不爲』；仁達『嗜洋烟』，與仁發『貪貨蠹法，狼狽爲奸』；仁政『時攜狡童，被豔服，往來於市』；仁玕『好使酒，矜意氣，忌賢殊甚』。這樣一個酒、色、財、氣的無賴羣，把持政權，李秀成對洪姓痛心疾首，陳玉成認朝政不公平，完全是有理的。不過太平軍將士生活，與一般領導者相反，始終保持良好的紀律。楊秀清却還能雖腐化『令嚴軍民畏』，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更能以身作則，阻止軍隊腐化，所以若干領導者的墮落，並不減低太平軍的聲譽，不然就無法解釋人民擁護太平軍的原因了。

宗派、保守、安樂三種思想，總根源在農民階級消極方面的熱誠性、保守性與私有

性。太平軍領導集團的腐化分裂，正是這些特性的反映，也就決定了太平天國的必然崩潰。

除去上述主觀方面必敗的原因，客觀方面也不允許它取得勝利。如果說，太平軍也曾有過可能勝利的機會，那就是佔領南京以後兩三年內，全力進攻北京，迅速摧毀滿清政府，當時英法美與滿清勾結還沒有成功，事實上不得不承認「天國」政權，不管「天國」此後如何變化，萬惡的滿清總是可以消滅了。失去北征這個時機，太平天國不可能獲得最後勝利，原因是：第一，滿清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逐漸結合，反革命勢力壯大起來，力量超過革命勢力。第二，那時候中國不會有進步階級的存在，農民階級不得進步階級的領導就無法負起民主革命的任務。太平天國在主觀客觀兩方面都缺少勝利的條件，北伐是唯一的機會，又因戰略指導錯誤而失敗。所以，歷史決定這個革命只能起着民主革命先驅者的作用。

第七節 太平革命的餘波

南京陷落了，洪秀全、李秀成殉國了，太平天國滅亡了，但這並不等於革命消滅。相反的，中國人民還是堅持巨大的革命鬥爭。

天國滅亡後，還有下列革命力量。

太平軍殘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至六五年——同治四年）

總黨起義軍（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至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

苗族起義軍（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

雲南回族起義軍（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西北回族起義軍（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太平軍 李秀成最後一次入南京，浙江方面止保有湖州（守將黃文金）等

殘部

數城，大部份軍隊如李世賢、汪海洋等十餘部都轉入江西境。秀成殉國，各將領無人指揮，大體分成湖州軍與江西軍兩大部。

同治三年六月（一八六四年七月），淮軍、老湘軍、「常捷軍」會攻湖州，「英國

將（官）發砲以攻屯，不能克，「英國將遇寇戰輒敗退」（「湘軍志」）。七月（八

月）初，黃文金遣弟黃文英護送幼主洪福到安徽廣德縣，準備守城大戰。七月（八月）

底，叛將蔡元隆勾結南門守將投降清軍，文金棄城奔廣德，奉洪福轉戰皖浙邊境，文金

戰死，殘部入江西，洪福被江西清軍掃獲，湖州軍敗散。洪福在南昌被殺，太平軍更失

中心，九月（十月），李世賢、汪海洋等攻入福建，擊斃湘軍大將「運蘭」，福建提督林

文察，民衆羣起響應。李世賢駐漳州，汪海洋駐汀州，衆號二十餘萬。滿清急調左、李

會（「鮑超部」）三軍配合外國海軍攻福建，清軍屢敗，左宗棠請廈門英法領事嚴密封鎖海

岸，斷太平軍運入軍火。同治四年二月（一八六五年三月），汪海洋率軍攻入廣東鎮平

縣（舊嶺縣）。清軍全力圍漳州。世賢向海洋求援，海洋不應。四月（五月），世賢棄城走永定縣，與清軍戰大敗，逃匿山中。軍中訛傳世賢戰死，餘衆推李元茂率領歸海洋。海洋陰謀併吞李部，殺元茂示威，軍心不服。七月（八月），世賢自山中晝伏夜行到鎮平，海洋大驚，夜中刺殺世賢。太平軍與清軍相持，十二月（一八六六年二月），清軍圍嘉應州（梅縣），海洋突圍戰死。餘衆推譚體元守城，繼續突圍，清軍四面進擊，體元戰死。清軍登山大呼「棄械者免死」，太平軍失主將大潰亂，被清軍斬殺兵士五六萬人，將官七百三十四人。「湘軍志」說「自寇起至破滅，未嘗見斬刈如此之易」，原因很顯然，汪海洋殘殺李世賢，將士離心，鬥志消沉了。太平軍經過這次大殲滅，嫡系軍隊，喪亡已盡，南中國全部被滿清征服。

石達開對會國藩、胡林翼，因楊韋內訌而失利，李秀成陳玉成對曾胡及李鴻章，因洪氏軍圍猜忌而失敗，李世賢對左宗棠，因汪海洋吞併而殲滅，宗派思想的危害，斷送了太平革命，真是可怕極了。

捻黨起 義軍

「捻」黨是山東、河南、安徽等省農民一種秘密結社的名稱。捻黨中人傳述一個故事，說孔丘厄於陳蔡的時候，餓得要死，派弟子向范丹借糧，范丹是著名窮苦的人（東漢時高士，所謂釜中生塵范萊蕪）經常不得飯吃。因為要救孔丘的生命，把家裏僅有的一點糧食慷慨出借。後來孔丘做了官，發了財，不承認范丹曾借過糧，乾脆把債賴了。捻黨中人說，那些讀書人（地主

階級)都是孔丘的後代，捻黨是范丹的後代。范丹的後代有權向孔丘的後代討還舊債。這種樸素的階級鬥爭理論，武裝了廣大窮苦農民。安徽河南一帶(淮徐地方)數人或數十人結合成『小捻子』，一二百人結合成『大捻子』，『肆行劫掠』(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上諭)足見捻黨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反地主團體。太平軍攻下南京，捻軍大起，各部數千人數百人不等。太平北征軍戰敗，殘兵散入捻黨，捻勢漸強。首領張洛行據雋河集(安徽渦陽縣)，衆增至數十萬，最稱大部。李秀成招洛行助戰，捻軍蓄長髮接受太平軍紀律，大得民衆擁護，成爲太平軍的北方友軍。後來陳玉成在皖北大戰，得捻軍助力極大，洪秀全封洛行爲沃王。玉成敗後，部將賴文光，陳德才率孤軍渡淮，『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一八六二年)由鄖陽而進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一八六四年)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圍解京師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離散』(『賴文光自述』)。當時張洛行戰死(一八六二年被叛徒謀害)，捻軍失統帥，『其頭目任化邦、牛宏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賴文光自述』)。這說明什麼呢？第一，安慶失守以後，湘軍全力下注，北方兵力空虛，文光、德才帶頭一枝小軍隊，經過安徽、河南、湖北、陝西四省，變成數十萬人的大軍，足見北方雄厚的革命力量，太平軍未能充分利用；第二，北方革命羣衆，需要太平軍領導，南京方面如果及早派遣大將數人，發動捻軍，攻湘軍後路，南京城圍可能減輕。等到文光被推爲首領，捻軍已

軍，文光自述也看到『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了。

文光統率揔軍，聲威大振，清軍不敢接仗。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在山東大破清軍，殺清帥僧格林沁。滿清大驚，調曾國藩督湘淮軍抵禦，曾國藩率新湘勇駐湖北。揔軍深入湖北，擊潰國藩軍，新湘勇全部殲滅。國藩督戰無功，退回兩江總督原任，滿清改調李鴻章督戰，淮軍全用洋式武器，揔軍止有刀矛，但揔軍有民衆擁護，萬騎奔騰，一日行百數十里或二百里，往來自如。曾國藩奏稱『官兵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籠，吳通如洗之慘，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怨詞，即從賊亦無愧色』。這個民賊的供辭，多少洩露一些統治者的罪惡。五年（一八六六年）秋，文光感到孤立，『特命梁玉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洛行子）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賴文光自述』）。自此揔軍分東西兩部，賴文光任化邦率東揔軍攻山東，張宗禹等率西揔軍攻河南轉入陝西。滿清又調左宗棠老湘軍抵禦西揔軍。六年（一八六七年），任化邦戰死。七年（一八六八年）春，賴文光被捕殉國，東揔軍潰散。西揔軍自陝西入山西，轉攻直隸，清廷大駭，派恭親王奕訢（咸豐帝同母弟）督旗兵迎敵，湘、淮軍，安徽、山東各省軍追蹤北上。直隸民衆沿路襲殺清兵，十數人小隊不敢行鄉間。左宗棠給他的兒子信裏說『直隸之大（名）順（德）廣（宗）一帶，與山東河南接壤，各處民團兇悍異常，專以兵勇爲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似此光景，成何世界。淮軍驕逸習氣，實冠諸軍，皖軍戰不足恃，東軍弱不勝戰，僅我軍士馬一萬九千，尙未至大壞耳』，照左宗棠自

供，大羣所謂「官軍」的賊匪燒殺淫掠，試問成何世界？人民見賊匪必殺，試問是否合理的自衛？左宗棠一類民賊所造成的世界，無疑是人民的地獄，這不是明顯的事實麼？西捻軍寡不敵衆，七年秋轉入山東，徒駭河水漲不能渡，西捻軍被殲滅。捻軍起義凡十六年，戰爭地區經江蘇、安徽、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直隸凡八省。

苗族起義軍

貴州東南部（榕江、台拱爲中心）是苗族居住地，雍正、乾隆時侵略苗疆，設官吏治苗民，稱爲「改土歸流」。苗民所受的痛苦，可在羅應旒的奏摺裏稍見一二：

「苗疆定後，尙有土司（苗族中貴族）通事（苗奸）其人助官爲虐，挾其詐力，殘剝無已。一切食米、煙火、喪葬、娶嫁、夫馬供應之費，無不取之於苗民。此外，又復千百其術，藉事勒索，不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機絕矣。」

苗民納稅本輕，或不出稅，而官吏則以民願報效，不敢領價，勒索民物，均由土司通事辦理，官收其一，而土司通事則增數倍。

苗民例須供役，平日攏班，及至委員過境，或官吏下鄉，則合境應役。其不至或無役者，折錢二三百文，否則拘罰至數倍。苗民貧困，乃於役前數日裹糶守役，男病女役，官吏待之一如牛馬。其尤令苗民恐慌者，則客民入境，奪其田地，而相仇恨也。」

苗民在滿清官吏、漢族地主、苗族土司、通事等的聯合壓迫下，生活還不如牛馬，他們

屢起正義的反抗，決不是所謂『野性難馴』，相反，他們是有公正合理的民族精神的。『湘軍志』載『羣苗』的信條說：

『吾輩不知何者爲反，以兵來則戰，以好來則撫（和），飢則掠，怒則殺耳。吾不擾官，官乃擾吾，唯有強者勝耳。』

滿清置貴州防兵一萬七千人，就是不採取『以好來則和』而決心『擾』苗的表示。湖南巡撫李瀚章說『究其始禍，無不由漢民之欺凌，官吏之貪暴』，但始禍之始禍，歸根還由於滿清挑撥民族仇恨的卑劣政策。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苗民受太平革命的影響，推張秀眉爲首領，起義反抗滿清，攻取城池。五年（一八五五年），出境攻湖南邊境。官吏派兵屠殺，『因亂株連良儒，皆悔其不反』，起義軍勢力更盛。滿清調湘軍、川軍、桂軍以助貴州軍，苗民也聯合漢民協力對抗。漢民有貴州、廣西的會黨，有思南的天主教民（教民分三部，思南爲白號，銅仁爲紅號，思州爲黃號），苗、教聚衆至數十萬人。九年八月（一八五九年九月），石達開軍入貴州，苗教紛起響應，合力攻擊清軍，省城貴陽危急，清官困守孤城，政令不及數十里外。苗教軍出入廣西、湖南、雲南三省，以湘軍爲主力的清軍守壘不敢出。『苗以此並輕湘軍，當入寇，輒叩壘門呼曰，吾嘗往攻汝湖南矣。既掠歸，復謝曰，多擾汝』（『湘軍志』）。當時清廷深怕石達開率苗教軍攻入湖南，邊境屯防兵，無力進攻，遂開志在入川。苗教『無遠略』，戰事中心不離貴州境。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滿清合四川湖南兩省財力，進圖貴州。六年（一八六七年），調湘軍席寶田專任軍事，席寶田是湘軍著名悍將之一，有惡毒的戰爭經驗，又用洋槍砲，便於攻山寨，張秀眉語羣苗曰，苗疆危矣，往日官軍敗則走，今深入尋戰，此癡軍也。汝曹謹備之」（『湘軍志』）。寶田合各軍攻荆竹園險要，七年（一八六八年），被攻破，『白號、黃號教及石達開餘黨俘斬略盡。言黔事者皆驚喜以為奇功』（『湘軍志』）。苗教軍從此失勢，專依山險取守勢。寶田又採『雕剿』法，選精兵入深山奇襲，燒燬苗民糧草，一面誘降苗寨，分化苗教軍，雙方惡戰到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張秀眉戰死，苗民起義才被鎮壓下去。

滿清屠殺苗民，幾乎盡滅苗民的種類。『湘軍志』：『苗峇存者十之二，皆良苗，其能劫掠精壯者殆盡』。『席寶田傳』（『先正事略』）：『拓地千餘里，破寨十數，殲苗及百萬。自有三苗以來，兵威所及，未有至此者也』。貴州巡撫黎培敬籌辦善後摺『黔省兵燹垂二十年，百姓存者不及前之十一』。

雲南回族

起義軍

回族與漢族雜居，滿清挑撥民族惡感尤着重在漢回兩族。法律規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實際是『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官吏審斷辭訟，總是『護漢抑回』，故意造成兩族間不平等，滿清得從中操縱取利。

雲南回族，相傳元初隨蒙古軍遷來，到滿清時代，人口不及漢人十之二三，但團結

力極強，不斷與漢人衝突。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回漢爭奪礦產，總督恆春，巡撫舒興阿乘漢回互殺，密令大殺回人，省城回人被殺數千，永昌被殺八千，其他州縣同樣殘殺，回民首領杜文秀等起兵反抗，攻佔大理府。清政府派吳振械帶四川兵入滇查辦，奏稱紳士黃琮倡議「滅回」，激起事變，把黃琮革職，這當然欺騙不了回民，戰爭繼續擴大到全省。清政府誘降回民首領馬德新、馬如龍，借回殺回，又派廣西土司岑毓英帶苗僮兵攻回，殺戮極慘。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文秀戰敗。岑毓英宣稱投降免死，回兵動搖，文秀自殺家屬，吞鴉片到清營求免殺回兵。毓英立斬文秀頭，縱兵大燒大掠，大理及各縣城鄉回人全被屠洗。總督勞崇光奏稱：「沿途察看地方，殘破不堪，田畝拋荒」。清政府賞岑毓英「輕車都尉」的爵位，報酬他殺回的功勞。

西北回族

和義軍

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回民與新疆東部回民同屬東干族，宗教上有黑山（舊教戴黑帽）白山（新教戴白帽）兩派。滿清故意讓漢抑回，又助舊教抑新教。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太平軍陳得才攻入漢中，陝西回民乘機響應。回漢兩族不懂得自己同被滿清愚弄，一開始就互殺起來。西安、大荔一帶二三十縣回漢死亡（多數是漢人）不下數十萬人，清帥多隆阿藉口「護漢」屠殺史家河回民，六十里內全成白地，反滿力量因分散削弱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西捻軍入陝，聯絡回軍，捻回勢力才擴大到陝北，甘肅回民起兵接應，左宗棠的對策是「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駐

重興陝西耀州，「防捻回台勢」。當時捻軍自南而北，回軍自西（甘）而東（陝），縱橫各千餘里，陝北成兩軍交匯點，往返游擊，左宗棠軍疲於奔命。六年（一八六七年），西捻軍自宜川渡河入山西，左宗棠率軍追捻軍。八年（一八六九年），左宗棠回陝西，全力進攻陝甘回軍，當然，回軍是力不能敵的。

左宗棠對回民的認識是「其人柔則狡詐，剛則桀驁，知畏威不知懷德，性與人殊」（與夏小濤書）這就是說，回人非人。因此定出「同性犬羊，先撫後剿」的辦法（十月「遵查劉松山各情覆陳摺」）。所謂先撫，就是誘降回民，所謂後剿，就是屠殺降回，與「我能剿，彼乃甘心就撫」的思想一致，用兵目的在殲滅看作「犬羊」的回民。

左宗棠先驅回民到陝北，大屠殺後，進攻新教中心地金積堡。教主馬化龍哀求投降，宗棠堅決不許。連清政府也認為不分良莠「濫殺激變」（清政府不是愛惜回人而是感到每年八百萬兩軍費太巨），嚴諭責問，宗棠仍主張「痛剿以服其心」，要求西太后允許「痛剿」。九年（一八七〇年），陝甘回軍反攻大勝，殺左宗棠「右臂」劉松山，二路南下到蒲城、富平、大荔一帶，全局大震。西太后大怒斥責，宗棠死力攻金積堡及其他回寨，回軍也英勇抵抗，「堡寨將破時，先刃其家屬，或投諸水火，乃解衣格鬥，死而後已」（十月「合圍金積老巢首逆被創摺」），宗棠窮極無法，只好允許馬化龍投降，令化龍招各地回軍來金積堡繳馬匹軍械就撫。十年（一八七一年），回軍到齊，宗棠突然縱兵大殺，不留一人。他給兒子信裏說：「不宜少留根莖，重為異日之憂」，給王

孝風信裏說：『金積事了，其乾淨屍貼，較之東南諸役，尙似信心』。這就是所謂『先撫後剿』，平生殺人最得意的一次。

他嘗了這次可恥的大『勝利』，大軍一路向甘肅、青海殺去，到同治十二年九月（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又用『先撫後剿』去攻破肅州城，縱兵大殺掠。與友人書說『肅城克復，首要各逆，實無一漏網，土客各回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婦女概免誅，數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爲最妥善』。所謂老弱婦女免死是騙人的，他在奏摺裏明明說『環視屍體枕藉，卽老弱婦女亦頗不免』，總之，殺人到無可再多，他才認爲『最妥善』，而且認爲『漢唐以來未有之奇』，想見他當時的得意。經這次最後一城的屠洗，西北回軍連同回民大體被他殺光了。左宗棠利用漢人仇回心理，互相慘殺，據他的自供有下列結果：

『陝回竊據以來，遠近城邑堡寨，慘遭殺掠，民靡孑遺。平（涼）慶（陽）涇（川）固（原）之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烟斷絕，被禍之慘，實爲天下所無』（八年四月『追剿逆回大勝摺』）。

『甘肅漢回雜處，昔本漢多於回，今則回多於漢。寧靈一帶周數百里，漢民幾無遺類，其產業婦女均歸金積堡。老弱死亡，壯丁爲其傭工佃雇，漢民之痛心疾首，抑何怪其然』（十月『遵查劉松山各情覆陳摺』）。

『以陝回人數計之，從前無事時，散處各州縣丁，奚啻數十萬，現計除西安城

中土著南三萬外，餘則盡族西行，陝西別鑄花門遺種。即令金積、河、狄、西寧、涼州等處現剩陝回計之，丁口亦不過數萬。其死於兵戈疾疫饑餓者蓋十之九，實回族子數百年未有之浩劫」（九年七月「收撫回民安插楚黎摺」）。

『肅州城中漢民三萬餘人，殺回民先後殘殺，城破時，男女存者僅千一百餘口』（『左宗棠年譜』）。『肅州土客逆回業已辦清，現在肅州實無一回風雜。其甘州、涼州各回死亡殆盡，亦無遺種，從此關內（陝甘）外（新疆）花門勾結當無可虞』（十二年十月「安插肅州老弱回民片」）。

回漢互殘，滿清獲利，各民族人民應當牢記這個血腥的教訓。

捻軍、苗軍、回軍都是反滿的力量，太平軍領導不能及時聯合，協力作戰，終於被滿清各個消滅，民族革命必須依靠廣泛的統一戰綫，這個教訓也是永遠不可忘記。

第八節 反革命破壞下的中國社會

太平軍、捻軍都有良好的紀律，就是反革命渠魁曾國藩、胡林翼也偶爾洩露出這個事實。苗軍、回軍仇殺漢人，行動殘暴，但主要責任仍在滿清的民族政策，苗回是負被動的責任。太平軍、捻軍戰鬥的地區，被反革命破壞到什麼景象呢？照那些渠魁們說：

江甯
情况

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湖渚之上，編葦結茅，棚高三尺。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曾國藩)

江北情况

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同上)
「舒、廬、六、壽、鳳、定等處，但有黃蒿白骨，並無民居市鎮，或師行竟日，不見一人。」(同上)

江蘇
情况

「查蘇省人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鷄犬相聞。今則一望平蕪，荆棘塞途，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李鴻章)

常州之江陰，無錫、金匱各縣城鄉村市，一片焦土，徧地黃蒿，行終日而不見人，偶遇二三難民，露處殍餓。且夕待死，慘苦不堪。(同上)

浙江
情况

浙江此次之變，人物彫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殘黎喘息僅屬者，晝則摘野菜爲食，夜則就土塊以眠。有骨肉死亡在側，相視而漠然不動其心者。(左宗棠)

江西情况

余走彭澤，東流沿江數百里，人烟寥落，不聞雞犬聲，惟見飢民殍斃道相屬。(周馥)

豫東情況

「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皆無人烟，賊過之區，糧食農具聚而焚燬，輪姦婦女，即老婦亦不能免。」（『豫軍紀略』）

陝西情況

「西、同、鳳三府地最沃饒，今土地之開墾者十不二三，而人民之死亡者十居六七，或行數十里不見一椽一瓦之覆，炊烟盡絕，豺獮夜嘯，氣象殆非人境。」（劉葵）

這種悲慘的情況，是誰造成的呢？反革命自然全部推給太平軍、捻軍。但是，曾國藩在同治二年二月（一八六三年四月）不是對滿洲主子這樣說麼：「粵匪初興，粗有條理，榜江人民安之若素。今則民間賊至，男婦逃避，顆粒無收……」這裏所謂今，當然指同治二年前後，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太平軍失去安慶以後，兵力不達「榜江兩岸」，顆粒無收的大破壞，明明是湘軍燒殺搶掠的結果，與太平軍無涉。下游方面，李秀成軍紀律，外國反動者也認為「奇嚴」，他連宰耕牛都嚴厲禁止，為什麼要破壞生產？江浙兩省白骨如山，田園荒蕪，不出於屠夫李鴻章、左宗棠，而出於禁宰耕牛的李秀成，誰能相信這種鬼話？曾國荃有「田一百頃」，「湘軍將士爭求從軍，每破寇所虜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資殆百數」（『湘軍志』『籌餉篇』），還說部下猶未大掠。這些巨大財物，難道是人民樂捐的？捻軍如果是「輪姦婦女，老婦不能免」，為什麼「山東民團相聚距費官軍」，「湖北民大失望」，「直隸民息之，相約格殺，日有狼門，戎服乘馬者十餘人猶不敢經行，枉殺者不可勝計」（『湘軍志』『平

捻篇』)，難道北方人民喜歡捻軍『輪姦婦女』，反對保護他們的『官軍』麼？

曾國藩與友人書說：『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衆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喁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於此乎！』這些話必需改爲『受害於兵者十之七八，受害於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實了。

從一八五〇年太平軍起義到一八七三年回軍消滅，前後凡二十四年，中國本部十八省全化爲戰場，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規模是空前巨大的。反革命在戰鬥中獲得勝利的結果，社會生產力大破壞，中國進一步變爲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雖然遭受挫折，却給後人留下寶貴的革命教訓。

第四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

第一節 緒言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擴展和深入。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外國侵略者結合中國封建勢力共同撲滅中國人民革命的火焰。這個火焰要燒燬滿清統治也要延燒侵略者在南京條約上搶得的特權。狡猾的侵略者採取戰爭手段來促進愚昧頑固的滿清政府覺悟到進一步結合的必要。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中外反革命結合過程的具體表現。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對着英法美俄四個外國侵略者。滿清政府却把南京條約叫做『萬年和約』，自信是『一勞永逸之計』（道光帝批准南京條約的上諭）。滿清政府在經濟上雖然開始依賴外國（關稅及鴉片非法收入），但在政治上隔離這很遠，因為除了通商口岸，內地仍保持閉關政策，利用條約阻止外國勢力的伸入；鎮壓不規模的

人民起義也無須外國勢力的援助。這種形勢，對太平革命軍佔領南京才發生了變化。

四個侵略國各抱野心，待機進攻。其中英國據南方，從海岸向內陸；沙俄據北方，從大陸向海岸；扮演侵略的主角。法美從海上來，勢力遠不敵英國，扮演侵略的配角。四國對華情況大體如下：

英國——南京條約訂立後，英國商人對中國市場發生異常興奮的情緒。一個有名的商行向華輸出大批刀和叉（食具），並聲明它決計把這種商品供給全中國。另一個極著名的商行向華輸出了大批鋼琴。它們出賣商品所得的金錢，幾乎連運費都不能抵償。毛織品也同樣遭受厄運，在開放五口的時候，曼徹斯特盲目地作了一番極大的努力，可是這番努力落空了。這個世界紡織中心的城市，陷入蕭條狀態中，只好希望偶然碰到機會來挽救自己。一八四七年下院會選出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中英貿易的狀況，調查的結果認為：「貿易上的困難之所以發生，由於用銀子來支付鴉片，使華人底一般貿易遭受巨大的損失，而絲和茶事實上則應抵償其餘商品底價值」。一八五〇年《亨氏商人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說：「究竟那種貿易應被取消——鴉片貿易呢，還是英美商品的出口貿易呢？」顯然，華人不能同時購買毒藥又購買商品，「鴉片買賣之增加和西歐工廠製造品底銷路成反比例」，英國政府完全懂得這個原理，但決不願放棄飛躍發展的鴉片買賣，它在第一次戰爭中，獲得了充足的經驗，相信戰勝滿清軍隊、強迫交出大宗權利是輕而易舉的事。這種自信，鼓勵它進行同樣的新試驗。

英政府一面盡量擴大鴉片貿易，一面竭力尋覓暢銷工業的方法。它相信一種空想的公式，以爲「商業的發展與開作商埠的港口數量成正比例」，因此要在南北海疆及長江沿岸開闢更多的商埠。它又相信一種實際的經驗，就是英國使用政治權力和經濟勢力，破壞了印度的舊生產方法（印度和中國都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的生產方法），取得廉價商品消滅手工紡織的效果。因此它害相思病似的要進廣州城覓總督，進北京城覓皇帝，企圖在廣州、北京伸張自己的政治影響。最後它還相信一種慣用的辦法，就是以海盜行爲空輔助營業精神，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商業的入超。恰巧太平革命軍到達南京，引起西方列強的震動。英國爲首的外國軍艦準備在上海、南京以及運河口等處安定「秩序」，藉以扶助搖搖欲墜的滿清政府，扶助的報酬自然是政治上、經濟上各種特權。

法國——法國對華貿易，每年貨船不過一、二隻，說不到經濟侵略。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迫滿清訂約承認傳教權，在海口設立天主堂，教士私入內地傳教，專力進行精神侵略。它要取得內地傳教的合法地位，又沒有商業上的顧忌，因之侵略行動特別露骨，天主教士迅速與鴉片烟同成侵略中國的兩大先鋒。

美國——美國需要大量紫葉和相當數量的絲，中美訂約後，每年平均輸入二百萬英鎊的中國商品。一八五五年，輸入華貨增至五百三十九萬英鎊，輸出二十七萬英鎊，差額極巨。支付方法是美國輸送棉花至英國，英國輸送布疋至印度，印度輸送鴉片至中國

。它的商業地位決定它對滿清盡量保持偽善的溫和態度，一面追隨英國之後，援例要求，均沾侵略的利益。在扶助滿清反對中國人民革命的時候，它的態度甚至比英國更積極些。因為英國反對中國人民革命，但也反對滿清政府頑固，美國總在別國成功以後援例獲得同等的利益，這樣的政府它自然是滿意而予以援助的。

沙俄——沙俄在地理上鄰接滿洲、蒙古，陸路通商有二百年歷史，在外交上沙俄使臣不否認朝貢名義（從康熙年間起），與理藩院辦理交涉，比英法美佔極大便利。它援助滿清，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獲得航行黑龍江並在邊疆區域自由經商的權利。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它奪取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及東三省黑龍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還裝做公正保護者，充當北京條約的中間人，勒索滿清的酬謝。英國發明對待滿清的方法是『華人難與說理，惟臨之以威，可以推我所欲爲』（一八五四年江蘇巡撫許乃釗『奏報上海英新開紙論文』）。沙俄利用英國採取這個海盜式的襲擊方法，自己表示中立態度，使滿清政府不能不向沙俄實行那些它本來不願意實行的讓步。英俄是侵略中國的兩大主角，外交上沙俄却常佔優勢。

當時歐洲列強間相互衝突，達到那樣緊張的程度，就是要動用武器和使用最後手段。歐洲各首都每日都有消息，今天說世界戰爭快要爆發，明天又說和平有了保證，過了一星期又說起戰爭來了。總之，歐洲局面是很不安的（一八五三年馬克思『論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太平革命的發展，不僅引起鴉片、絲、茶、毛棉織物市場的縮小，

而且這組織小將引起歐洲工商業的危機，轉成革命和戰爭。英法美在華艦隊援助滿清政府鎮壓太平革命，同時索取各滿其意的舉酬，收復並擴大中國市場。它們的願望如此，但滿清統治集團分成兩派，對外國的願望意見不同。一派是頑固派，在北京以咸豐帝、恭親王奕訢爲代表，在廣東以葉名琛爲代表。一派是洋務派，以曾國藩爲代表，比他稍前，還有不少上海，江蘇買辦化的官紳。兩派都是封建勢力，區別只在買辦成份的多寡。大抵頑固派疑忌心超過依賴心，洋務派依賴心超過疑忌心。開始頑固派掌握大權，拒絕外國援助，經第二次鴉片戰爭三次失敗的教訓，頑固派分化，一部份轉化爲洋務派，積極要求外國武力的直接援助。恭親王奕訢就是這一部份的代表人。

第二節 頑固派第一次失敗

——廣州失守（一八五六年十月——咸豐六年九月至一八六七年十二月）
——咸豐七年十一月）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香港總督文翰要求進廣州城，被昇平社學十餘萬人威力制止，文翰恐懼，訂約永遠不進廣州城。總督徐廣縉，巡撫葉名琛冒功封爵，大得清政府信任。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葉名琛升任兩廣總督，自以爲尊貴無比，侮辱外國人，每接交涉文書，略寫數字答覆，或竟不答，自稱「雪天恩，尊商體」。英人受辱

後談乘機報復。

平英團、昇平社學的反抗外國侵略，道光帝、著英早就合謀，企圖用會黨、土匪等罪名殘殺反英人民。太平軍起義，以一百三鄉爲中心（首領李文茂），廣州附近各府州縣民衆發展反滿武裝鬥爭。反滿軍有司馬，先鋒（太平軍作先鋒）、總統、都督等軍官，當是天地會採取某些太平軍制度的組織（統治階級稱爲紅巾賊或紅頭賊）。它聲勢浩大，但不能統一行動。葉名琛利用一部份地主豪紳領導的團練，實行血腥鎮壓，下令各府州縣：『凡通匪者，不論過去現在，一律格殺勿論』。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闈的『西學東漸記』裏有一段記載，寫廣州刑場的慘狀，節錄如下：

「一八五五年，粵中適有一暴動，彼兩廣總督葉名琛者，於此暴動發生之始，出極殘暴之手段以鎮壓之，意在摧殘方苗之花，使無萌芽之患也。統計是夏所殺，凡七萬五千餘人（前後共殺十餘萬人），以予所知，其中強半皆無辜冤死。被殺者有與暴動毫無關係，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詐不遂，遂任意誣陷，置之死地。葉之戮人，不訊口供，捕得卽殺，有如牛羊之入屠肆。刑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徧地，任其暴露於烈日之下。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地上之士，吸血既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匯爲汚池。後聞於城西遠僻處覓得一極大溝渠，投屍其中，任其自然堆疊，以滿爲度，無需人力更施覆蓋，以屍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餘，不令羣屍露少隙也。此種情形，非獨當時觀者酸鼻，至

今言之，猶令人欲年三日嘔。

這都是容閱親身見聞的事實。這個近百年改良主義路線的創始人也不禁『自刑場歸寓後，神志懷喪，胸中煩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憤懣之極，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爲正當』。葉名琛惡麗野獸般的殘忍性和廣東人民遭受毒手的慘苦情形，得容閱這一記載流傳下來，而統治階級的著述却把葉名琛寫成『生平宅心忠厚，『三元里紅頭賊起，勢猖甚，公晝夜督剿，收復二十二屬，疆臣負才名赫赫有建樹者，公其尤也』。

葉名琛屠殺廣州人民十餘萬人，省外各屬被殺至少也不下一二十萬人，平英團及其總革命勢力大受摧殘，李文茂等率餘部攻入廣西、江西響應太平軍，一部份民衆逃入海島，英國海軍圍海島脅降，載回香港，日夜訓練，準備進攻廣州。當起義軍勢盛時，曾圍困廣州城。廣東洋務派勾結香港總督鮑林（John Bowring），建議借『洋人力禦寇』，葉名琛恃有地主豪紳領導的團練，拒絕洋務派建議。鮑林眼見人民反英武力已不存在，決計發動軍事行動來完成進入廣州城的志願。這種行動有英國內閣的秘密訓令作根據，因之毫無顧忌，積極求達目的。

咸豐六年九月（一八五六年十月），廣東水師在亞羅號（Amoy）船上逮捕水手十三人。亞羅號曾購得香港英商通航證，現在期滿，已無權懸掛英國旗也沒有掛英國旗，純粹是中國船隻，駐廣州領事巴夏禮（Barth, Parker）認爲示威的良機到來，宣稱水師

違法捕人並侮辱大英國旗及領事體面，強硬要求放回十三人，並對英國謝罪，限二十四小時滿意答復。葉名琛置之不理，鮑林命海軍進攻省城，沿岸砲台守兵不戰潰散，葉名琛號召四鄉團練入城守衛。英軍本屬忍辱性質，並非有意開戰，目的在藉口面議，英官乘機進城。不料葉名琛不允英官入城交涉，又不允自己出城相見，鮑林反覺進退兩難。十月（十一月）英軍一千攻近城砲台，守城兵勇團練數萬人出城燒十三洋行，毀滅英美法商館。英兵燒城郊民房五千棟，退出虎門，勸法美共同出兵，壓迫滿清政府修改條約。

亞羅號事件傳到倫敦，英政府乘機鼓動戰爭，宣稱：「我們的國家遭受了很大的侮辱，我國國民在遼遠的地方遭受了種種的侮辱，強迫和虐待，對於這樣舉動是不能置若罔聞的。我國根據條約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已被人破壞，而責在保護我國在該地（中國）的利益的人員，不僅有權利來對付這些暴力行動，而且務須採用一切辦法，毅然決然來對付這些行動。」（英首相在市長、爵士宴會上演說）。英首相把形勢說得如此嚴重，但政府反對派在國會揭穿他的陰謀說：「鮑林爵士自己承認通航證沒有效力，亞羅船也沒有權掛英國旗。可是請注意他（鮑林）說的話：『船當時不在我們保護之下，不過中國人不知道這一點，千萬不要把這一點告訴他們。』」英國政府為什麼定要擴大事態呢？泰晤士報正確地答復了，它說：「英國營業精神的伸張，已與閉關自守的中國社會底結構相衝突。這種行為是否合法，那種行為是否適宜，這些瑣細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如英國這樣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向軟弱的不善於謀進步的民族發生來往關係」。這就是

說，英國要在遠東伸張勢力，什麼口頭上動人的理由都是捏造的。

滿清政府被迫訂約，承認外國人在南埠傳教，內心異常憤恨。它希望上天保佑，神力毀滅外國的宗教和武力。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摺，可以代表統治階級頑固派及落後民衆的心理：「五月十四日未時，疾雨迅雷，驟上海洋涇濱天主堂所供十字架及耶穌木偶，全行擊毀，並其所存火藥，全行漂失。臣等委該夷欲誘我愚民，撥入彼教，其居心大不可問。今天威震怒，誅其所尊，洵足褫奸夷之魄而破愚民之惑，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有以感召，臣等不勝欣幸。」雷擊天主堂，當作大事奏報，咸豐帝也不勝欣幸，硃批「敬感之餘，更深慚愧」，自以為真得上天保佑了。洪秀全創上帝教起義，滿清君臣認「上帝會乃天主教之別名」，對外來宗教更是深惡痛絕。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法國馬神甫（Barthelemy）潛往廣西西林縣傳教。六年（一八五六年），西林縣官捕馬神甫及其信徒二十五人，毒刑拷打，殺死三人（馬神甫和一婦女在站籠站死，另一教民梟首示衆）。消息傳到巴黎，法王拿破侖第三，借保護教會爲名，同意英政府提議，共同向中國用兵。七年（一八五七年），英國派額爾金（Lord Elgin），法國派葛羅（Baron Gros）爲全權大臣，率海陸軍出發，七月，英法聯軍到達香港。

額爾金投遞照會，要求入城、賠償損失、重立約章。法美領事要求酌給賠償，並願居間排解。英法美主要目的在壓迫滿清修改條約，合力攻擊太平革命，軍事仍帶威嚇性。

實，並非真求決戰。葉名琛似乎懂得一些對方用意，密告將軍，巡撫等高級官吏說，「彼但作戰勢來嚇我耳，張同霖（漢奸）在敵中，動作我先知之，我不與和，彼窮蹙甚矣」。因此不作戰守準備，將三國照會一一駁斥。他在奏報中自信必勝，他說：「若再不乘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過計窮力竭之餘，將要求各款，一律斬斷葛藤，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則得隨望蜀，伊於胡底」。咸豐帝也深信「該督熟悉夷情，操縱得宜」；諭令將進城，賠款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一勞永逸」。兩個頑固派首領做着同樣的幻夢，等候「該夷自知理屈，悔罪求和」。不料聯軍五千人佔據河南，在城外排列大炮，提出哀的美敦書，宣稱二十四小時後開戰。城中官吏紳商恐慌，葉名琛大言「彼技已窮必無事」，「敢遣敵船謀和者按軍法」。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侵略者一貫執行「只與官爭，不與民敵，恐嚇賄買督臣，使彈壓百姓，俯首聽從，遂能爲所欲爲」（御史韓錦雲奏）的政策。琦善、耆英、伊里布都是替英國彈壓百姓的督臣，但當時昇平社學未曾分化，那些督臣不敢公然執行英國政策。葉名琛大屠殺革命人民，社學被毀，只剩下「部份團練，這種團練對人民已是反革命武裝，但對英還保持一些反抗精神。兵練燒毀十三洋行後，頑固派、洋務派（洋行主如伍崇曜等都是洋務派）」一致憎惡團練兇悍，葉名琛出示禁止，不准留在省城。團練見他行動詭秘，以爲與英人有私，是襲用琦善等「陽剿陰撫」的舊法，「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中西紀事」），廣州成爲不設防城市。葉名琛認爲不用團練守城，

就不會惹起英軍攻城，自己守定『通商而外，概不商量』的方針，敵人必窮蹙自退。所謂『不戰不和不守』是他理想的外交辦法，空城是他理想的外交場所，而這却正是聯軍的進攻對象。

咸豐七年十一月（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聯軍發砲攻破城牆，葉名琛逃匿。將軍穆克德訥、巡撫柏貴，暨白旗投降，聯軍入城，俘獲葉名琛，送往印度，囚禁斃命。

廣州事變，證明了殘殺人民二三十萬，『才名赫赫』的虎狼，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必然變成逃匿和當俘虜的犬羊。穆克德訥、柏貴投降敵國，以合作名義，在英法委員三人監督下，出告示『彈壓城內外軍民』（穆、柏等人廣州失陷奏摺），收繳民間武器，禁止人民反抗運動，這又證明了統治階級不論獨作合作，總是盡力反人民（穆、柏等自稱『安民』），決不會放棄自己的天職。同時，人民反抗運動絕不因壓力加強而低落，相反，反抗愈益普遍和深刻化。

第三節 頑固派第二次失敗

——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四月至十一月）——咸豐八年三月至十月

英法美通商傳教權利主要在上海，因此都反對太平革命勢力到達長江流域。英國商業最大，暫時採形式上的中立，觀察變化，以便雙方取利。美國商業較小，顧忌較少，

助滿態度也較積極。法國企圖取得內地傳教權，竭力討好滿清，態度最露骨。兩江總督楊文定奏摺說：『上海通商各國，惟米利堅為最恭順，此次賊匪竄擾，經吳健彰約會，即發火輪船前來助剿，旋因擱淺轉回。至法蘭西則專以傳教為事。英吉利又強悍詭譎，惟利是視。該夷畏賊焚掠，欲與言和，但該夷總以勝負為從違』（咸豐二年三月奏）。這正是太平軍初到南京時三國的態度。洋務派使用各種媚外卑劣手段，請求援助，各國也或明或暗提出報酬條件。下列材料可看出當時江蘇上海洋務派的賣國活動及外國的侵略野心。

咸豐三年三月（一八五三年四月），劉麗川在上海起義。江蘇巡撫吉爾杭阿諒於各國領事。法蘭西提督辣呢爾首請助戰。又商得英美領事同意，讓出進攻道路。四年（一八五四年），清兵水陸並進，法兵發大砲相助。起義軍衝擊陳家木橋，洋兵與清兵並力防禦。五年（一八五五年），清兵攻城東南，法兵攻城北，上海陷，劉麗川被殺（『中西紀事』：『借助夷兵克復上海檔案』）。

四年五月（一八五四年六月），英公使鮑林、提督賜德齡晤吉爾杭阿，『據該會口稱，上海賊久未平，以致英國貿易滯銷。茲願將賊黨驅逐，無論送往何處，不必過問，即將城池交還貴國』（江蘇巡撫許乃鈞奏）。

閏七月（九月），『米利堅夷會麥達勒畢噠口稱，伊國情願隨同官兵從上海起，一路剿滅逆匪，開通長江。如上海等處有一匪未平，即不敢越次而進。』又口稱，『倘蒙

欽差大臣指給地方貿易（鎮江、南京、漢口），其地如有賊匪，必當隨時驅除淨盡。並飭洋商補交舊稅，以備軍餉」（吉爾杭阿奏）。

八月（十月），鮑林提出英國條約說帖，第九條是「彼此會同設法，肅清海濱盜匪（指太平軍）」。

七年（一八五七年），英吉利致兩江總督何桂清照會：「貴境沿海賊匪勢甚鷓張，有妨商務，本國甚願襄助盪蕩，消除其患」。

這些「助剿」的代價是很高的，就是要消滅內地的閉關政策，開放中國全部。條件主要部份（也是滿清政府最害怕的部份）是（一）各國公使駐紮北京；（二）開關沿海（包括天津）及長江商埠；（三）內地自由遊歷（包括傳教）；（四）修改條約。吉爾杭阿爲代表的洋務派主張承認一切要求。他在當時被看作外交模範，兩江總督何桂清致直隸布政使錢忻和信裏傳授他的外交秘訣，先批評頑固派的外交方法說：「英夷於咸豐三年，見我內地多故，即起戎心，經吉爾山折之以理，懼之以氣，而又推誠以結之，故能轉爲我用。其推誠之法。必先破其疑團。誘夷之最疑者，中華大吏不將其善衷據實具奏，因凡有關涉夷務事件，只奉寄諭，不奉明發。而准行事件，亦作爲承辦之員意見，代爲乞恩，非由該夷求請，故不感激而轉疑中華大吏一味蒙蔽聖聰也」。何桂清認爲頑固派那種不誠的辦法，不會換得外國的「感激」，要得外國的「感激」，必須學吉爾杭阿推誠的辦法：「吉爾山廉得其故，遇有可行之事，即告以據實代表。其不可行之事，則

告以爾等欲我代表，不能不奏，然一經代表，大皇帝必將我革職治罪。我等相好，將此頂紗帽結交朋友，無甚要緊，但不知爾等安否？該夷以爲不欺，尊之曰吉大人，而中心誠服矣。』這樣搖尾乞憐的醜態，說得如此妙用，其實只是一個『准』字（一切承認），所謂『准則俯首聽命，不准則爲所欲爲』，與其爲所欲爲後還是准，不如准了『准』爲所欲爲，這是洋務派自覺比頑固派高明處的存在，也正是多數頑固派人後來轉化爲洋務派的原因。試看吉爾杭阿的外交！咸豐四年，英法美提出公使駐京，開關商埠等十八條，吉爾杭阿奏稱：『夷情狡詐暴戾，凡有所求，必得乃止』，又替三國解釋說：『若云助逆犯順，則長江現爲賊踞，何妨藉此橫行，而乃赴粵赴滬並赴天津，必待請命而行，似又並非惡意』，結論是『夷情如此恭順，不妨曲示包荒，許其所請』；以免『該夷心未懾服，終恐別滋事端』。照吉爾杭阿等洋務派的主張，咸豐二、四年滿清釐和侵略國結合，共同進攻太平軍，來統殺革命了。可是當時掌握決定權力的頑固派，別有一種主張。

頑固派首領咸豐帝與他的胞弟恭親王奕訢都是生長皇宮、極度自高自大的執绔子。他們首先要保守『天朝』的尊嚴；第二要維持內地的閉關政策；第三是舊怨不能忘懷；第四是疑忌外國與太平軍勾結，不信他們肯真心助戰。頑固派這種惡想產生一切『不准』的外交方針，在屈服於侵略者爲所欲爲以順，它做着很多擴大災禍的事，表示充分的愚蠢無知。

滿清以小民族統治中國，用絕對嚴格的「禮」作爲統治漢人的重要工具，外國人不跪拜中國官吏，尤其是不跪拜中國皇帝，在滿清政府看來，實在是莫大的危機。廣州、北京拒絕外國人進城，主要爲了總督衙門與宮殿的地位平等不必跪拜的「夷人」，無異宣示「天朝」尊嚴的喪失。咸豐帝訓示葉名琛，要他「接見夷酋等（英美公使）儀文，仍當恪守舊章（外國貢使免冠拜伏，屏息待命），無得以該夷等有相待稍擾之請，稍涉遷就，以致弛其畏憚之心」（咸豐四年），葉名琛傲慢招禍，這個訓示也是一種原因。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上諭規定，英法美公使入京換約，「照外國（朝貢國）進京之例，不得坐轎攜隊」，後來美公使要坐轎入京，伴使力勸騎馬，最後改爲乘車。到京後宣稱美國「入覲」，企圖誘行三跪九叩首禮，美公使謝絕進宮，國書交伴使傳遞，匆匆出京。滿清自以爲外交上勝利。十年（一八六〇年），何桂清奏稱接見「英酋普魯斯（Frederick A. Bruce）」。「咸豐帝痛斥說：『清朝臣子有如是者耶！雖將汝抵法，除實報顏，何以對天下臣民』。聯軍進攻北京，咸豐帝諭怡親王載垣說：『巴夏禮欲來求見，恐該夷以資禮自居，長其驕傲，着該王大臣勿庸接見，以崇天朝體制』。他逃往熱河，還諭示奕訢說：『現在撫局難成，人所共曉，派汝出名與該夷照會，不過暫緩一步，將來往返面商，自有恒祺等，汝不值與該酋見面』。北京條約訂立，羣臣奏請回京，他諱避：『各國尚有首領（公使）駐京者，且親遞國書一節，既未與彼等言明，難保不因朕回鑾，再來饒舌』。他這樣拒絕與外國人見面，外交上起許多風波，所爭只是拜跪

禮。他原想用拜跪使外國人畏懼『天朝』，結果反因不拜跪使『天朝』畏懼外國人，『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觀論』），就是頑固派保守『天朝尊嚴』的一點可憐的技倆。

閉關政策是滿清統治的精髓。它不願外國人遊歷內地，尤其是傳播宗教，破壞政治的文化的閉關，嚴重地威脅封建秩序。清初楊光先著『不得已書』，在文化閉關的觀點上攻擊天主教說：『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南京訂約以後，教士入內地傳教，尤引起頑固派仇視，說教徒毀祖先神主是吞食狂藥，教徒同堂禮拜是男女淫亂。三綱五常的舊禮教與外來宗教不斷發生衝突。在政治閉關的觀點上楊光先也預言道：『天主教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子孫。異日若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南京訂約以後，民教相仇，洋教士保護教徒，自成一個政治勢力，『猶之一國之中，有無數敵國而自尊自主者』（『總理衙門與各國大臣商辦傳教條款』）。太平軍起義，頑固派更證實外國宗教的危險，因之絕對拒絕開放內地的要求。

英國侵略最露骨，頑固派對它仇恨也最大。咸豐帝定出待遇四國的態度：『俄夷與中國和好多年，自宜先行接見，待以賓禮。米（美）會並未助惡，亦可假以詞色。法國於咸豐四年，在上海助我剿匪出力，若能改悔，當念其從前恭順，曲從寬恕。辛夷首惡

，斷難寬容，將來廣東一口，必不准其貿易。○滿清與英國關係惡劣，待遇條件懸殊，障礙着雙方的接近。

英國對太平軍暫守中立，引起滿清的疑忌。又出版『遐邇貫珍』一書，『雜誌時事』，語含譏刺，而於楊逆所作所爲，反稱其頗有法度，尤爲狂悖。○咸豐四年許乃釗奏。○這更加強了滿清的疑忌。英美要求開放長江，滿清看作命運的關鍵，決不肯通融。咸豐四年上海英法美公使率兵船開往天津，咸豐帝得報，不防備天津海口，却『恐鬼賊伎倆，聲東擊西，夷船闖入江口，致與賊匪勾結』，令江蘇文武官『密爲防範』。○八年（一八五八年），欽差大臣桂良奏報：英船入江，決不至於滋事；他批斥道：『不滋事必至勾通，設若不同，何以處之』。○奕訢也以爲『逆夷要求各款，尤關利害者，莫如江岸通商一節』，主張調兵決戰來阻止要求，以免『後日追悔而無及』。○頑固派不信英國肯助戰，英國要先得報酬後助戰，疑忌阻止了反革命的迅速結合。

除上述四條以外，還有一條外交障礙，就是滿清政府諱言條約，從皇帝到大小官吏，不願看或看不到條約原文。正如何桂濬所說：『查道光年間在江寧所定者謂之萬年和約，係一成不變之件，在廣東所定者謂之通商章程，載明十二年後酌量更改。歷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未見其文，以至誤將章程作爲萬年和約，徒以口舌爭辯』。○外國說十二年期滿，應修改條約；滿清說萬年和約一成不可變。○外國以爲癡人說夢；滿清以爲無理要挾；兩方永不能合拍。這五條的存在，侵略國無法循外交途徑達到

改訂條約、增加權利的目的，唯一方法，只有「臨之以威，為所欲為，」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英法佔領廣州後，想乘勢迫清政府改訂約章，俄美也趁火打劫，於是四國公使會商，請名教書清政府。大學士裕誠分別照會四國公使，以英法美三國交涉委之兩廣總督，俄國交涉委之黑龍江辦事大臣。時英法公使集會在上海，得裕誠復書，不能滿意，遂決定率聯軍北上。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到達大沽口，美俄兩國借「從中調處」名義同來，向直隸總督譚廷襄投遞照會。咸豐帝還看作「伸訴冤抑，前來乞恩」，令英法「交還廣東省城，送還葉名琛，真心悔過，方能逐款定議」，否則，「除舉兵攻城（廣州）外，仍令五口絕英法兩國通商」。他是完全在夢境中，以為可以嚇退英法。四月聯軍砲擊大沽口，海岸守兵戰敗，聯軍佔領天津城，咸豐帝才大驚，先後派桂良、花沙納、著英往天津議和。他的辦法是「着桂良、花沙納先行拒絕，於該夷續請各事，概勿輕允」，然後讓投降派老手「着英出為轉圜，則該夷自當深信著英，不致推託」。不料著英被英人斥逐，狼狽逃回北京。咸豐帝計劃失敗，把著英殺死洩忿。旁的辦法他是沒有的，英法宣稱要帶兵進京，他趕快承認全部條款，僅附帶一個要求：「公使駐京，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眷屬」。這種無聊的要求，桂良自然不敢向英法提議，英國提出五十六條，法國提出四十二條，迫令桂良花沙納用印畫押。中英，中法天津條

約成立。美俄也得訂立了滿意的條約。南京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開始，天津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加強。中國人民就是這樣被滿洲統治者出賣了。

天津條約的主要條款：（一）公使駐北京，用平等禮節；（二）開放牛莊、登州、台灣、淡水、潮州、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爲通商口岸，海關僱用外人；（三）耶穌教，天主教得入內地自由傳教；（四）外國人得往內地遊歷；（五）中外人民爭訟事件由領事官會同中國官審辦；（六）修改稅則；（七）減輕商船噸稅；（八）外國兵船得遊弋各通商口岸；（九）對英國賠款四百萬兩，對法國賠款二百萬兩；（十）享最惠國待遇。當時英法人所能寫出的條件，『一字不改』的取得了，規定次年在北京交換批准的正式條約。英法軍退回上海，與桂良花沙納訂定稅則：（一）承認鴉片爲合法貿易，改名『洋藥』，每擔收稅銀三十兩；（二）除例外（絲茶鴉片稱例外）免稅（外國人用品免稅）兩項外，進出口貨物一律按時價值百抽五徵稅；（三）洋貨運銷內地，按時價抽百分之二。五子口稅，免繳釐金和常關稅。在這種稅則下，中國新式工業不能發達，舊工業必然大破壞，經濟上決定了半殖民地地位。

咸豐帝等待聯軍退出天津，又恢復皇帝的威感，嚴令桂良花沙納『激發天良，力圖補救』，取銷『公使駐京、內江通商、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四條，以『全免稅課』爲交換。他不惜放棄每年數百萬兩的關稅收入，不是不愛錢，而是決計強迫人民來補償。桂良等不敢向英法交涉，奏請有十可慮，其中如『不稅於夷，必稅於商。且鴉片稅於商

該夷總以爲稅從貸出，必至饒舌；既免夷稅之後，而中國又收烟稅，恐夷人笑我因有烟稅之利，而始免其納稅，轉致得所藉口。桂良指出夷人仍要饒舌，打破了他的幻想。但是他決不肯甘心，密謀「不動聲色，使之不疑，先將天津海口預備齊全，俟其來年赴京換約，聚而殲之」。十月（十一月），洋務派兩江總督何桂清深知前途危險，勸他慎重，說：「茲事重大，非徒尙意氣及空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所能任事，恐一誤再誤，必至不可收拾而後止」。這個蠢悍的頑固派首領當然不聽，硃批：「朕思遲則有變，莫若先發以制」，積極準備來年「聚而殲之」的大陰謀。

第四節 頑固派第三次失敗

北京條約（一八五九年六月—咸豐九年五月至一八六〇年十月）
——咸豐十年九月——

大沽和北塘是天津兩個重要海口，咸豐帝令僧格林沁率東三省蒙古騎兵設防大沽，佈置相當週密，北塘只留兵丁數十名看守砲台，等於不設防，指定換約公使由北塘登陸進京，這種行動不能用軍事理由來解釋，純屬專制主義「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表現。他在被迫屈服、簽訂條約以後，想爭回一些「天朝」體面，第一步要換約公使服從走北塘的命令。第二步按照朝貢國舊例，公使進京，「所帶人數不准過十名，不得攜帶軍

械，不得坐轎攝隊，換約之後，即行回帆，不許在京久住。第三步，見皇帝行跪拜禮。何桂清奉旨向英公使商量，答覆是「見大皇帝只肯跪一腿」。他定要跪兩腿，警惕了英法公使從事武力準備。

英法方面感到爭議跪拜的預兆，知道要用武力保護換約。額爾金致水師提督西穆爾電，請他「集中充分雄厚的巡江艦隊於上海，護送公使普魯斯由白河（大沽口）進京」，就是說，準備與咸豐帝的「逆我者死」作鬥爭。

咸豐九年五月（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公使率兵艦到大沽口，直隸總督勸公使改走北塘，不聽。聯軍進攻砲台，雙方接仗，結果聯軍完全失敗，英戰艦三艘沉沒，死傷四百六十四人，法人死傷十四人，英艦隊長賀布也受了傷，聯軍逃出大沽口，退回上海。敗報傳到英國，政府黨（自由黨）報紙大肆咆哮，「一致要求實行充分的報復」。例如「每日電訊」主張「大不列顛應攻打沿海各地，佔領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並得到物質上的保證，擔保以後不發生襲擊」。無論如何應該實行恐怖手段，應該教訓華人重視英人，英人高出於華人之上，英人應成爲華人的主人翁。我們應永遠佔領廣州，作爲我們遠東商業的中心，來抵抗俄國在京三省邊境所已得的勢力，並奠定新領地的基礎。英政府雖然如此狂妄，侵略野心充分暴露出來，但它並沒有足夠的力量進行大規模侵略戰爭。首先是保守黨藉口反對戰爭，力謀倒閣。第二英軍佔領茶葉輸出地廣州，一八五七年英國茶葉進口減少了二千四百萬磅，因此商界害怕由戰爭引起的商業停頓普及到上

海及中國其他各商埠。第三印度常起糾紛，使英國不斷地感受不安。第四準備歐洲發生戰事，不敢向遠東多派援軍。第五怕滿清投到沙俄方面，如果逼過甚。更重要的是滿清政府崩潰後無法勾結中國全部封建勢力共同鎮壓太平革命。英軍在廣州宣稱與兵報仇，觀察中國方面情勢。上海商人議捐銀二百萬兩給英軍，請勿再舉。英法公使借此轉圜，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約（天津條約），即可罷兵」。何桂清奏請息事。不料咸豐帝自以為大勝，下諭說：「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本國。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倘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英法看到天津條約的一切果實，忽被從手裏搶去，只好決心一戰。

咸豐帝令僧格林沁撤北塘防務，專守大沽，希望英法服從命令，從北塘進京朝貢。十年六月（一八六〇年七八月）英軍一萬、法軍八千攻大沽，分兵登陸北塘，攻大沽後路。咸豐帝又恐慌起來，他那種迫切討饒的懦怯心情對照前些時妄自尊大的強蠻態度，活畫出頑固派的標準模型。他督促直隸總督恒福趕快「照會該夷進京換約（即「概作罷論」的天津條約），不可任令委員藉口風浪不順，畏葸不前，倘再貽誤事機，致令大局決裂，惟恒福是問。該總督當仰體朕心，曲為開導，以顧大局，是為至要」。七月初（八月中），僧格林沁軍崩潰，逃回通州，天津陷落。聯軍提出開天津為商埠，賠兵費二百萬兩，公使帶兵進京換約，常駐京城等條件，並不乘勝直追。咸豐帝令桂良、恒福等往

天津交涉，承認天津開商埠以交換公使駐京一款，理由是『天津已在該夷掌握，通商二層，許與不許等，公使駐京斷不能應許』。賠兵費、帶兵換約二條絕對不許。說『以上二條若桂良等喪心病狂，擅自應許，不惟違旨畏夷，是直舉國家而奉之。朕即將該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飭綱紀，再與該夷決戰』。這當然是些夢話，桂良回報說：『該夷恃其兵力，於所請各條招巴夏禮會議，絲毫不容更改』。英法軍向通州進軍，他派怡親王載垣到通州承認一切條件，但公使見皇帝必須跪拜。會議以逮捕巴夏禮而破裂。他諭令僧格林沁堅守通州，自己準備逃往熱河。臨逃前下了一道『朕今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的上諭，表示並不『畏夷』。一面召開御前會議，暗示大臣們阻止親征。他依據衆議，又下『坐鎮京北』（熱河）的上諭，說『將以巡幸之備，作爲親征之舉』，換句話說，『我要把逃走當作親征』，多麼不像人說的言語！

聯軍進攻，滿清兵沿路潰散。八月初九月中，聯軍到北京城外，頑固派第二首領奕訢逃到長辛店藏匿。聯軍入北京，派兵搶掠圓明園，又把它放火全部燒燬。滿洲統治者吸取中國人民的無限血汗，經營二百年，綜合中西建築術，聚集古今藝術品，造成全世界少有的壯麗宮殿，咸豐帝整年在園裏度着荒淫無恥的生活，經聯軍燒搶，頓成白地，文化上的損失是無可計算的。

聯軍一切都滿意了。英國提出九條條款，法國提出十條條款，只缺一個簽字人。咸豐帝任命奕訢爲欽差全權大臣，這個主戰最力的頑固派首領，不敢出面見『該夷』，從

中取利的俄公使，自任保護人，奕訢才取出來畫押蓋印。咸豐帝立即順從英法的要求，批准公佈條約全文，飭各省督撫按照辦理，並下諭說：『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着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成立，中國又被滿清政府出賣一大批權利。

北京條約規定：（一）開天津爲商埠；（二）准華民赴英法屬地或外洋別地工作，滿清出賣人民當奴隸，替英法服苦役，開發殖民地，英法從此合法誘拐『豬仔』，數百萬窮苦人民在海外犧牲了生命；（三）割讓九龍爲英領地；（四）交還教產於天主教堂，當翻譯的神甫私增『教堂在各省租賃地產建造自便』條文，奕訢也一概承認；（五）賠償英法兵費各八百萬兩，植金英國五十萬兩，法國二十萬兩。賠款由各海關稅收內扣繳，海關更進一步落入外人手中。十月（十一月）英法聯軍退出北京。

兩個出賣中國的頑固派首領又恢復『天朝』尊嚴了。咸豐不肯回京接受英法國書，下諭說：『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尙有人耶！』奕訢譏笑額爾金坐轎出京，奏稱：『沐猴而冠之狀，殊覺不堪入目』，背着外國人說些大話遮掩自己的羞辱，也算阿Q們得了勝利。

第五節 一部份頑固派向洋務派轉化

——所謂「同治中興」

太平軍起義以後，滿清政府完全依靠漢奸曾國藩之流替他支持。這些漢奸在反革命內戰上表示對滿清絕對忠實。當北京危急的時候，咸豐帝飛召南軍勤王，要曾國藩等各帶二三千名勇丁北上，上諭嚴厲地說：『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不料曾國藩拒絕派兵，直截教他『撫夷』。當然，咸豐帝是早就希望投降的，但在調兵不服從這一點上，他就感到空虛了。滿清在北京發火批滿蒙兵丁，號稱『八旗禁旅』，從來不出仗，對漢人保持天兵無敵的假聲名。『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蹙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衆，非但不可以龍興（清初侵入中國）例，即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亦相去甚遠』（『中西紀事』）。與曾國藩等漢奸軍尤其無法相比，這又使他感到更大的空虛。用什麼力量來反抗太平革命，維持對內統治呢？只有依靠外國侵略者的援助。

頑固派排斥外國，主要由於自大與疑忌。皇帝不接見各國公使，仍是自大排外的表示，但跪拜的等儀却因此和緩。疑忌的中心，第一是公使駐京；第二是內江通商。事實證明洋人在京並無『粵東因擄重臣，是其前鑑，肘腋之變，可爲寒心』的那種危險；長

江開埠，且有『助順剿賊』的極大利益。其他行事，很多使統治階級喜出望外，如『洋人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可滅不滅，實在是『大德』（曾國藩語），洋人管理海關，每年收稅數百萬兩，交滿清政府充軍餉，可吞不吞，實在是『公平』（桂良語）；『觀其不敢害葉名琛，知有畏懼天朝之意，觀其仍肯交還廣東，知無佔據地方之心』，實在是『並非有深謀詭計』（桂良語）；『逆夷貪利逞強，然以貿易為性命，並不利我土地人民，與內地逆匪盜兵作亂者不同』，要求各款實在是『可以信義籠絡，馴伏其性』（奕訢語）。滿清對外國雖還有疑忌，那都是次要的，從重要處說來，信賴代替了疑忌，可以安心接受外國的援助了。

頑固派轉化為洋務派，在政府主持中外合作反太平軍前是奕訢，在地方實行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洋務派也輸入一些外國工業（軍需工業），與當時改良派創始者容閔的主張截然不同。洋務派製造船砲，目的在鎮壓革命，並無對外國自衛的企圖；辦同文館等目的在培養譯員買辦，只求能應對外人，並翻譯某些書報。中學（封建專制學說）為體，西學（格致天算學）為用，是洋務派一貫不變的方針。至於改良派是不甘心中國永遠落後，要求講『富強之故』。容閔曾向太平天國建議七條：（一）依正當的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材為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制度及釐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為主課；（

七) 設立各種實業學校。以上七條除「聖經列爲主課」一條專爲太平天國立言，其餘各條，可看作改良派的一般政綱。改良派目的在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與洋務派走殖民地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它注定了失敗的命運，首先是不認識中國已是半殖民地，外國侵略者不允許資本主義的發展；其次是希望結識中國達官，「庶幾得行予志」，而這些達官非頑固派即洋務派，有意或無意地反對資本主義。容闈結識曾國藩、李鴻章的效果，只是做了購辦造船機器及派遣被頑固派嚴格管束的留美學生兩件事，來替洋務派服務。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改良派開始以動搖依附的姿態出現，而洋務派則成爲與頑固派平分政權的統治者。它在外國支持下反革命成功，被稱爲「同治中興」。

洋務派的設施，不外「設外交機構」、「借洋兵助戰」、「自強」三類。嚴重的結果也有三個：一個是加深殖民地化，一個是加深人民的災難，一個是加深滿漢統治階級的裂痕。

設外交
機構

滿清對南方藩國的制度是北京設禮部，管朝貢事務（北方藩國屬理藩院）。貢使先到廣州，粵督撫坐大堂受免冠拜伏禮，粵督撫派人伴送到禮部，由部官引貢使帶貢表到午門行三跪九叩禮，皇帝命禮部設宴，禮畢回國，不得在京逗留。歐美通商國當然不肯受跪拜的屈辱，滿清也當然不肯受不跪拜的屈辱，因此廣州督撫拒絕會見及接受稟帖，一切由十三洋行轉達。中外糾紛以至引起戰禍由這樣一個小節，在當時却看作「國體攸關」的大事。北京條約以後，各

國公使駐京，滿清不願機密性的軍機處有外人往來，又不能用禮部、理藩院名義辦理交涉，咸豐十年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理藩院化名），作為外交機關，奕訢、桂良、文祥三個滿洲貴族掌管外交權。以前只有兩廣總督一人出面辦外交，現在組織擴大，北京總理衙門，下設南北洋通商大臣。北洋大臣駐天津，管牛莊、天津、登州三口，地位最高。南洋大臣駐南京，管長江及山東以南各海口，職權極大。北洋大臣，照例由直隸、兩江總督兼任，兩督位置，又幾乎照例歸湘淮軍閥專有。軍閥官僚買辦混合體的南北洋大臣，勢力遠比貴族官僚買辦混合體的總理衙門強大，這是因為外國侵略者贊許『精明』的南北洋大臣遠比昏愦的總理衙門能辦事，扶助他們的權位的提高。漢族軍閥政權，開始了對滿洲貴族政權的分裂運動。

與總理衙門設立同時，奕訢開辦同文館。學生資格限八旗十三四歲以下兒童；教習資格取廣東上海通英法文字語言、誠實可靠的商人；學業程度定『俟八旗學習之人，於文字語言悉能通曉，即行停止，奏請優獎』。他這樣拒絕漢人參預外交，引起漢人反感，到同治元年還請不到教習，只得忍痛聘請英國人包爾騰教書，年薪一千兩，另有漢文教習兼暗中監視洋教習一員，年薪只九十六兩。學生總數共十名。這個小書館，實際進行的崇拜洋人、賤視漢人、放任滿人驕情的教育，每年經費數千兩，不會造就翻譯的技能，却養成買辦的精神，這些學生若干年後都擔任外交要職，成為滿洲籍的洋務派。李鴻章以『上海，廣東兩口交涉事件較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為理由，援同文館

例，在上海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廣方言館），考選江浙一帶十四歲以下文童及年輕小官吏入館，聘中西教習課中西語文，學生出路是『承辦洋務』（充當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翻譯官），及翻譯『測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之法』。不久廣東也設學館。上海廣東兩館也比北京館發達，南方洋務派歷倒滿洲派，滿清獨佔外交權的計劃，又歸失敗。

借洋兵

助戰

訂北京條約的那一天。

滿清在外交上最痛心的是公使不肯跪拜，最歡迎的是洋兵助內戰。北京條約以前，外交主題在爭跪拜，表示可笑的驕傲；北京條約以後，外交主題在爭助戰，表示可恥的卑諂，轉捩點在咸豐十年九月簽訂北京條約的那一天。

在簽約宴會上，法公使葛羅實講：『願於海口助中國剿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沙俄公使也面見奕訢說：『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英公使因與太平天國約定一年內各不侵犯，不表示意見。咸豐帝諭會國藩等共同商議。會國藩首先贊成，以為『借助夷兵，事屬可行』；別一派軍閥袁甲三（在河南攻擊捻軍）堅決反對；以為『有害無利，必不可行』。咸豐帝動搖不決，令奕訢探英國公使態度。英國新得巨大利益，安全力開發新商埠（主要是漢口），對天國取軍事防禦，暫不進攻。它又不願俄法積極助戰，額外取得滿清新報酬，咸豐帝說『剿賊本係中國應辦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踞地

方，於彼何利？非獨俄法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即英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爲己有。這把威豐帝嚇倒了，密諭上海官紳說：『若肯受雇助剿，只可令華夷兩商自行經理，於大局或可有利無弊』。美國流氓華爾的『常勝軍』，就根據這個密諭組織起來。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英國變更態度，一面對奕訢表示『太平軍斷無成事之理，而湘楚各軍船砲不甚堅利，恐難滅賊』；一面由英人赫德（Robert Hart）建議鴉片新稅法（納稅後販至無論何處銷售，免納釐金），每年可增加收入數十萬兩，購買英國小火輪。它這一狡計，包含籠絡滿清、販賣船砲、擴大鴉片銷路三種利益。法國要求均沾利益，代購船砲，奕訢允許英法各買一半。奕訢自以爲外交成功，向威豐帝報功說：『臣等自籠絡英法以來，目前尙稱安靜，似可暱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賊爲志，不難漸次掃蕩』。又說：『失此不圖，賊勢旣難逆料，即英法之籠絡，亦恐無以善其後』。那種迫切求助、奉侵略者如神聖的卑劣心理，眞使人見之作嘔。威豐帝自然極爲歡喜，令『該督撫等（曾國藩等）悉心妥議，期於必成，不得畏難苟安』。曾國藩也『稱爲救時第一要務』，招募水勇，準備接受。後來在奕訢、曾國藩、李鴻章三人間發生權利衝突，威豐帝與奕訢的一場歡喜落了空。

法國軍隊助滿清最積極，前後戰死提督三人，引起英軍的猜忌。常勝軍將弁多美國人，英軍表面幫助一些軍火，但暗中謀奪取領導權。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李鴻章到上海籌備『會剿』，英領事表示『不令伊國派員會帶，即將外洋火器取回，恐此軍亦歸

無用』。李鴻章很害怕，說『常勝軍初立戰功，僅賴幾件砲火，何伯（即賀布，英艦隊司令）華爾等拚湊而成，其勇並非精強也』（李鴻章『致曾國藩書』）。華爾在慈谿戰死，美人白齊文代作管帶，英領事指使大商人楊坊不發軍餉，『常勝軍』譁變，白齊文免職。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英人戈登統率『常勝軍』，英國才積極參加反太平軍戰爭。法國在上海失勢，到浙江助左宗棠組織『常捷軍』。李左兩大軍閥，借英法武力攻陷江浙兩省，被稱為『中興名將』，實際是英法的兩個傀儡，曾國藩是英法美共用的傀儡，他不專靠一國，因此有資格當傀儡的首領。外國侵略者找到了湘淮軍閥，北京的奕訢被冷淡了。英公使威妥瑪（Thomas F. Wade）批評總理衙門說：『總署向來遇事總云從容商辦，究是一件不辦，說來說去，無非空談』。

自強

奕訢請設總理衙門奏摺裏說：『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髮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肢體之患也。故滅髮捻爲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裏所謂『治俄』、『治英』，都是裝點門面的話，只有『滅髮捻』才是代表滿漢統治階級的實話。不過他還有一句代表滿洲貴族的話不便說，就是『治漢爲先之先』。北京條約以後，滿漢洋務派都談『自強』，奕訢所談的是治漢的『滿洲自強』，會左李所談的是利己的『軍閥自強』，『自強』目的都在擴大本集團的力量，鎮壓人民革命。他們『自強』的程度，決定於所得外國侵略者援助的多少。

在北京條約簽字的宴會上，法公使葛羅說：「法國洋槍炸砲等件，均肯售賣，並肯派人教導鑄造各種火器」。俄國公使對弈訢說：「俄國願送鳥槍一萬桿，砲五十尊」。弈訢聽到這些話，喜出望外，奏請「分給八旗兵丁，即行演習」。原來俄法都是空談，弈訢受愚弄，空擬了一個「訓練旗兵」的計劃。同治元年，李鴻章在上海「購買外洋槍砲，設局鑄造開花砲彈，以資攻剿，甚爲得力」（同治四年李鴻章奏「置辦外國鐵廠機器」）。同治三年弈訢看到李鴻章設局造砲彈業有成效，派旗人四十八名交給李鴻章，「專令學習外洋炸砲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製器之器」。他抱着這樣大的希望，派去學生却都是些愚惰的旗丁，訓練旗兵計劃第二次落空了。他在奏摺裏說：「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製器爲先。此項精密之器，京營學成後，只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製，總旗人居有定所（難道漢人居無定所！），較易防閑。仍禁民間學習，以免別滋流弊」。弈訢不懂得外國各自扶助地方的軍閥傀儡，北京政府背後並無可靠的外援，「自強」必然失敗，治漢野心只能加深滿漢統治階級的裂痕。

「軍閥自強」的基礎是取得船砲。李鴻章首先到上海，也首先學製火器。他說：「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同治元年「致曾國藩書」）。他要學得一二秘法，不惜重資雇洋人數名，分給各營教習；又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製砲器具；又託英法混督各代購大砲數尊，自本國寄來（同治二年「致曾國藩書」）。他自信「

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請曾國藩提倡製造槍砲輪船。李鴻章依靠英國優略者，在軍閥中是洋務先進，他的「自強」論被洋務派推崇和遵行。他說：「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當專設一科取士」（同治三年「致總理衙門書」）。設學館培養譯書人才，江南機器製造局附設譯書局。比奕訢的辦北京同文館，目光確是比較遠些。奕訢被他提醒，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一館，學生資格限於翰林、進士、舉人、貢生那些八股專家，自然毫無成就。滿洲洋務派腐敗落後，中央政權不能不逐漸落到船砲及洋務人員擁有者湘淮軍閥的手裏。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曾李合作在英美援助下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五年（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法國援助下設造船廠於福州。此後各省督撫都設立大小軍火局，目的是鎮壓人民，但也含着軍閥割據的意味。

下面是軍閥所謂「自強」的好例。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奕訢委託赫德購買船砲，共買得小軍艦七隻，運輸船一隻，用銀一百七萬兩。奕訢主張「水手用山東人，砲手用湖南人，水兵用八旗人」。曾國藩主張全用湖南人，編入長江水師中，並要求不駛出長江口外。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輪船到上海，奕訢不願讓給湘軍，聲稱「輪船水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楚勇」，艦隊分交曾李二人節制。曾國藩提出嚴重的抗議說：「水陸將士，皆將引為大恥。」

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節制）。不如早爲之所，疏而遠之」。當時會同藩伯洋兵來分戰功，又不願李鴻章分得輪船，幾乎要用兵變來示威。他直截指出「疏而遠之」的辦法，說：「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每月經費七萬五千兩），視之直轄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他對滿清一向自稱爲忠臣孝子，這樣粗暴露骨地揭開了可怕的面目，確把西太后，突訐嚇倒了，只好順從他，解散洋兵，退還船隻，英國憑空得銀一百四十餘萬兩。曾國藩反對非湘軍所有的輪船，但酷愛湘軍所有的輪船。他派容闈到美國買造船機器，同治四年在上海開辦江南機器製造局，造兵船編入長江水師，說是「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同治七年曾國藩「新造輪船摺」）。

很明顯的，滿清和軍閥們所謂「自強」，實際是分裂割據。滿清與軍閥，軍閥與軍閥，在利害衝突時暴露出孿惡的真面貌。他們講「自強」，並不是歡迎資本主義，而是害怕資本主義。李鴻章奏「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裏說：「洋機器於耕織印刷諸器皆能製造，原不專爲軍火而設。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爲之區處，不過銅錢火器之類仍照向例設禁，其善造槍砲在官人役當隨時設法羈縻耳」。他在「致總理衙門書」裏又說：「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潛師洋法，獨出新意。一旦輟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陳陳相因之兵器，孰能禦之！」他預料機器的危險，也預料科學、工程師、工人的危險，愚蠢的滿洲貴族，當然更感到異常危

險。突新娶八股專家學天文算學，李鴻章阻止私人辦新式工業，以「官督商辦」的方式監製洋機器，官營工廠任令腐敗關閉，毫不愛惜，寧願購買外國貨物（船砲以至日用品），主要原因之一，就在害怕洋機器。

第六節 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鬥爭

頑固派的愚蠢，洋務派的「自強」，把中國推進半殖民地的深淵裏。如果說，北京條約以前，滿清是封建統一的帝國，現在却是在英法俄影響下，走上由分裂以至瓜分的道路了。同治五年赫德「局外旁觀論」、威妥瑪「新議論略」向滿清政府提出瓜分警告，大意說，滿清如果政治上不依賴外國，遵守條約，經濟上不「准洋商合華商會製輪車（火車）電機（電報）各等事」，「將來中華天下不免分屬諸邦」。在侵略者看來，像滿清那樣腐爛無能的統治，沒有外國保護，應該「數年之內為萬國之役」。但他們不著也不敢看中國的另一面，那就是「一八五七年馬克思在『論波斯與中國』裏指出的：『華南人在反對外人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態度的本身，很明顯地指明中國人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着極大的危險。過了不多年以後，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臨死時的鬥爭，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這是與赫德之流極端相反的預言，而中國歷史正是遵循這個預言發展的。馬克思指出以廣東人民為首作出如下的抗

英行動：「現在至少在南方各省，民衆是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人的鬥爭的。華人完全鎮靜地和有意地在香港歐人居住區域內將毒藥滲入大宗麵包。華人暗帶武器，乘搭商船，而在中途就突出痛擊船長、水手和歐洲搭客，並奪取船隻。甚至乘輪船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的一樣，在每個放洋的輪船上起來騷動，奪取輪船。他們寧願與船一同沉於海底或者是在船上燒死，而不願降服。甚至僑居國外的華僑，也密謀起事，突然在夜裏舉行暴動，當局只有嚴加戒備並使用武力，才能壓服他們」。自稱「文明」的侵略者斥責這種抵抗方法是懦怯的、野蠻的、殘忍的方法，馬克思却給以很高的同情和評價，說「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引起了華人對一切外人的這種憤激情緒，並使這種憤激情緒帶有完全殲滅敵人的戰爭性質。如果內地的人民也有狂熱情緒，則這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對於英人將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也是中國人民在廣東，天津表現的反抗精神，如果有好的領導和廣泛的組織，可以阻止英國的侵略。由於缺少這兩個必要的條件，再加滿清遏抑民氣與敵勾結，反抗運動終於被壓制下去。

廣東革命民衆遭受葉名琛大屠殺，元氣大傷，剩下一部份團練，又因葉名琛行跡可疑，紛紛解體。咸豐七年十一月（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軍攻陷廣州城。八年正月（一八五八年二月），三元里一百三鄉人民號召南海、番禺兩縣義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局，有義兵數萬人。三月（四五月），咸豐帝派侍郎羅惇衍號三人到佛山辦團練，領導權落入大紳士手中。「西人月報」記載當時起義情形說：「省城內外居民似易於講和，

維城外九十六村（即三元里百三鄉）之人，大不相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十六村糾衆會議，以爲必夷人賄買官長，以致城池之陷易於摧枯。今我等擬上京控告，糾集人衆以圖剿滅。英人得到消息，企圖誘致九十六村首事人入城，勸其相和好，並且威嚇說：「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害及英人，即屠戮一村以爲九十五村之鑑」。這個反帝運動發源地的九十六村，既不受誘，也不受嚇，積極準備殺敵攻城。

佛山團練局議決各鄉「堅壁清野，禁絕漢奸」，又宣告「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法兵恐慌，不敢到鄉村騷擾。正二月間，團練準備攻城，英法兵更恐慌。迫駐防旗兵繳械投降，防旗兵作內應。三月，團練局發起大罷工，凡廣東人「有在香港等處爲外洋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回家」。不到一月，二萬餘人罷工回來。洋人商務停頓，連做飯也要自己動手，困苦不堪，要求領事巴夏禮設法。巴夏禮說：「要停止罷工，必需破壞佛山團練局，但水師提督去天津時，曾切實告誡：『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現在只好出佈告勸復工』。他派火輪船到新安縣貼佈告，義兵突起襲擊，殺死洋兵漢奸數人，其他地區佈告不敢再貼。英法出兵攻陷新安縣城，並不能挽回罷工的狂潮，英法兵被逼退出新安。

團練局聲勢浩大，省城大官僚都逃到佛山鎮（只有將軍和巡撫未得逃走），各人爭奪領導權，企圖借團練得功名。官紳民意見分歧，戰鬥力大爲削弱。四月（六月），總督黃宗漢到廣東，出示稱贊「粵省人民之忠勇」。五月（六月），天津條約成立。額爾

金要求解散團練，革退黃宗漢及羅惇衍等。黃宗漢立即出示：『中外現議和好，爾等民人毋得復相攻戰』。以此為理由，竭力破壞團練，得英人諒解，保存了總督地位。羅惇衍等原奉密諭『相機攻剿』，現在被咸豐帝出賣，硬指為『偽造廷寄諭旨，深為詭異』，下一道上諭說：『中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陷害之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二國為難，以致英人疑慮。着黃宗漢嚴拿偽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明正大』。羅惇衍等被查辦，佛山團練解散。民衆運動受官僚紳士領導，結果就是這樣。

廣東人民反英法鬥爭，應用游擊戰術，『西人月報』把它描寫得很神秘，也就是感到很恐懼。節錄數條如下（原文見『中西紀事』）。

『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劫掠殺害，所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

『廣勇驍健異常，每夜於附郭地方放流星射入城中，欲以起火。省城中埋鍋箭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目下外國人若無兵丁防守之處，不敢游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寂然』。

『廣人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日法國官食時見飯中置有毒藥。又天竺黑兵被人擄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其害。又放火燒英人所居之屋』。

英法在軍事佔領地區，並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日夜防守，寢食不安』。英國政府黨報紙會妄想『把廣州保留在自己手裏，和領有加爾各答一樣』。在人民英勇打擊下

，只好放棄那些妄想。

「英人於黃浦地方豎一枝大旂，黃浦之人於夜間將旂繩割斷，以致顛仆。」

「黃浦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間有一隊鄉勇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往別處查看，不料鄉勇伏於隱僻處，內藏炮台，忽放礮彈，英兵傷者六名，船主亦受傷。黑暗之中，該勇於隱僻處各放一砲，潛走莫蹠其踪，而礮聲極巨。」

「英武弁有廚子係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犬以刀割其首而去。時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並未見及，其神速如此。」

「法人自火輪船上岸，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法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

「黃浦是水陸交通要道，人民不怕殘酷的屠殺，攪擾交通線，守城兵更感不安。英官以「英法兵勇不耐廣東暑熱」為理由，運來大批「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國武弁聞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帶領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衆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會剿，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官大怒。迫行至日中，為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英兵退回省城。有醫生在後，忽被鄉兵擒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膽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忿怒，肝膽愈大。有花旗、法郎西、天竺兵數名都被廣人殺去。」

鄉兵誘敵深入，選中午作戰，擊敗大隊英兵。這是人民創造的游擊戰術。三元里、白雲山都打敗千人以上的侵略軍，證明這種戰術的有效。天津條約簽字消息傳到廣東。六月十四日（七月二十四日），廣勇七千人攻廣州，駕雲梯上城，滿洲駐防軍助英法軍戰守，廣勇敗退，死傷約三百人。流三百人的熱血來抗議英法侵略及滿清賣國，雖然戰敗，愛國精神，永垂不朽。

三元里民衆組織昇平社學，『不受地方官約束』，革命性質最強，成功也最大。佛山團練局對官紳妥協，結果被官紳愚弄並出賣。天津地方接近封建統治中心北京，人民久受欺騙，中籌較深，向官府請求抵抗，連團練也辦不成。咸豐八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外，津民謀新集『聯身海盜』，焚燒敵船，跪求欽差（桂良），總督（譚廷襄），請准許團練助官兵打仗。欽差、總督『恣設撫局』，堅決不准。津民空抱義憤，但又不取違法『擅動』。桂良反把人民義憤作爲投降的重要理由，說『天津民情洶洶，數日不（譁）和，必將內變。附近天（津）河（間）兩府土匪以及各屬鹽梟，久欲觀變而動，一聞有警，盜賊四起，官軍糧棧不暇，此戰之不可者二也』。他提出五不可戰以證明接受天津條款的必要，把人民要求反抗看作第二不可戰（第一不可戰是『該夷槍砲迅利』），津民向他們跪求，真是愚弄得可憐。不過這種民氣不是沒有影響的。聯軍進攻大沽砲台，直隸總督譚廷襄坐轎先逃，提督、總兵等凡三品以上軍官全數奔潰，但守台士兵繼續抵抗。『砲台三次爲英人砲彈所穿，華兵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於英人逼近

砲台時，單身從砲台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將命生擒之，忽被前隊兵丁槍斃陣亡。最後兵力不支，『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旗自刎』，一人戰死（二人一名沙春元，二名陳毅），砲台失陷』（『中西紀事』引『西人月報』）。高級軍官逃走，小軍官還率士兵堅守，不是受民氣影響，在滿清軍隊裏不能有這個少見的例外。

第二次鴉片戰爭恰與第一次一樣，人民走的是反抗路線；統治階級走的是投降路線。

附錄 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

滿清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滿漢平分，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貴之手。地方政權——各省督撫滿員常佔十之六七。總之，滿員掌握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直隸總督琦善，出東巡撫託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福州）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林則徐，就中除林鄧二人，全是滿員。帶兵大員莽山、弈經，議和人員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昏庸貪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又為滿員所壓迫嫉視，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會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會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為首的滿族統治集團驚惶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令儒臣獻上朱熹大學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箴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滿漢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

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尙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從這些講題看來，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無『德』，『惠』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才們求助，大罵羣臣道：『試問諸臣午夜閉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爾等甘爲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斬舞弊主考柏後（滿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極深，並不能『爲士林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閱奏章，嬖臣肅順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瘴病死了。

曾國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清統治者壓迫屠殺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肅順公開宣稱『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曾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圖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勳。』漢軍機那崧藻獻媚道：『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帝被他提醒，臉色變了，半天轉不過氣來。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信任曾國藩，專指望向榮（江南大營）、琦善、托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北兩大營）這些滿族將領的勝利，雖然他們的所謂大營也還是專靠張國樞一

八支持。曾國藩這時候還得掌握一部分兵權，這就全靠蕭順的竭力保薦。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樑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任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後，那拉氏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曾國藩兩江總督節制兩院贛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曾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國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爲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富農家的子弟，這一家人都有殺人的癖性。他和曾國荃、曾國華帶兵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在家鄉依勢橫行，無惡不作，誰要是不合他們的意思，就被加上會黨的罪名，送到縣裏，教縣官立即執行死刑，不許釋放或監禁。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隔幾天總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他說『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縣裏設立碼頭，照例殺豬祭神，曾家父子以爲不夠虔誠，殺十六個人代豬，表示敬意。曾國藩在這一家人裏尤爲特出，因爲他不僅兇惡超人，而且還善於講道德仁義來掩蔽超人的兇惡。他在道光十八年應科舉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從滿人倭仁，湖南人唐鑑講習程朱道學，又被與乾隆時和坤並稱滿清二大奸相的另一道學老師程彰阿認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別快。曾國藩既然一開始就是程彰

阿的門生私黨，又是號稱理學大師倭仁（官至首席大學士，爲西太后所尊重）的講學後輩，故與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鑑在湖南聲望也很高，學徒衆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這些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都是有利的條件。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僞，却不會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經學家）當面責備他虛僞，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曾國藩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僞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僞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僞乃是殘忍的一方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動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僞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眞誠。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污，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爲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清『錢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於盜賊；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咸豐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麼？曾國藩却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依容閩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羣賊匪爲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程朱道學，熟悉清朝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方面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却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

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衆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崇奉這個『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動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醉青年的經典，完全是合理的。可惜他們不懂得曾國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領，止能暫時摧殘太平天國一類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拿到今天來破壞久經鍛鍊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民主事業，就決無成功的可能了。

曾國藩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爲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 辦團練

（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廣西永安時不超過一萬人（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因湖南天地會員的加入，人數大增，首領衡山人洪大全，曾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死後，天地會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響本地

會黨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這就給當地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的機會。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的財產，一方面也使他們藉以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暫時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說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時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漢奸——却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勁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曾國藩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為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人關係親密，善講滿清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這幾個條件也幫助了他。咸豐二年，曾國藩喪母在家，咸豐帝叫他幫助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止是「搜查土匪」。次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說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兇惡的紳士）當團紳，在本地清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分子）；他所說的練則是訓練鄉兵，彙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辦團，不重在辦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發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有約束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却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募勇辦練，不讓地方官紳辦練斂錢，既免分他的兵權，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說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時招募）代官兵（綠營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衛，藉以減輕、避

免各方面的阻礙（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視、排斥，隣省的求援，咸豐帝的嚴令出戰，新兵的不願離鄉土），並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曾國藩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權，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殺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他那種瘋狂的屠殺，連巡撫司道等大官也看得太無人理，與他爲難（主要是反對他越職侵權）；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曾剃頭』形容他殺人像剃頭髮那樣多。他感覺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一個奏章，說『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豐帝大加褒獎，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巡撫們也就不敢公然對立了。這樣，曾國藩成爲湖南土豪劣紳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成他的辦練計劃。

曾國藩辦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落後的農民充當以便制敵。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這些人多是羅澤南（與曾國藩同學，也講程朱道學）的學徒，平時講究所謂『忠誠』，聲稱願爲保衛『聖道』、『輪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主要的還是爲了求富貴，曾國藩也不願意羅澤南勢力獨盛，採用收買生的方式，使羅氏學徒爭着拜曾氏做老師。湘軍大將王珍（即王益）不服，說『我的老師止有羅山（澤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終被排去，其

舊部後來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軍。曾國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生四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爲唯一獨裁領袖。在左系湘軍成立以前，整個湘軍止服從曾統領一人，每個營止服從營官一人。各個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曾國藩，不受其他任何人節制。近代軍閥軍隊從曾國藩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等軍閥軍隊一直繼承到現在。

太平軍佔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曾國藩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砲，要求咸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砲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砲，贊美備至，認爲戰勝的決定因素。

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爲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鄉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員、練勇、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

湘軍出境，曾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他空白執照四千張，內捐虛銜執照、捐監生執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反動分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輔官，以民殺賊，佐兵力之不足』。

（『奏為江西巡撫陳啟邁摺』）

曾國藩以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撫設『發審局』，殺人如麻，負責局員『各人』，其一是滿人裕麟。他練鄉勇，遭綠營將領（多是滿人）猛烈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欽額總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章，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谷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做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玉成軍。曾國藩力求取得滿族統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殺漢族人民，就是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 與太平軍相持

（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水陸軍準備出戰，首先頒佈一道叫做『討粵匪檄』的文章。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主之田也，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

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穌與宣傳原始共產主義，着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衛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當時還散佈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郴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關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之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佈的民族大義，曾國藩却一字不敢提到，止說幾句『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地，盡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曾國藩率領若干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反動黑暗勢力，又以投降主義的方法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佔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却不是因

爲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爲太平軍一部分領袖的短見——他們一到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腐敗，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太平軍到達南京，即採取保守主義。不乘勝以主力北上，發動北方民衆，直搗反革命的資本巢穴——北京（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讓敵人得以從容重新調度力量，這是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後來失敗的張本。不懂如此，太平軍在下游不取上海、江、浙，滿清仍得享受漕米（北京滿人及官員的生命）、地丁、關稅、鴉片捐、外交權等利益，上游不發動、領導捻軍及其他起義軍，空耗兵力與滿清爭武漢三鎮，旋得旋失，終不能守，在這些方面，戰略上也已貽失敗地位。湘軍作戰計劃，先取武漢，扼上游形勢，推胡林翼也講程朱道學，與左宗棠同學）坐鎮調度，他的反動才能至少同曾國藩一樣，有時還要高些，湘軍後方鞏固了。第二步入江西攻取九江，第三步進安徽取安慶，最後取南京。曾國藩固守這個方針，即使在危急關頭，也死不放鬆（如在江西星子縣與安徽祁門縣誓死不移營）。太平軍右達開攻江西，陳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總不能牽動他的主力（曾國荃部爲基幹）變換方向，甚至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也不會動搖他的這個反革命戰略步驟。

正當湘軍初次出發的時候，太平軍攻入湖南，進軍長沙附近。曾國藩自率一部分水陸軍攻靖港，湘勇潰散，曾國藩三次投水尋死，都被隨從人撈起。陸軍主力塔齊布，水軍主力楊載福、彭玉麟攻湘潭大勝，挽救了他的湘軍。他描寫這次戰功說：

「水勇開放大礮，專意射火發船。是時北風甚勁，順風縱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燒賊船六七百隻。長髮（老兄弟）、短髮（新兄弟），逐浪飄流，紅巾、黃巾（太平軍服裝），隨波上下，岸緒水溫，同歸浩劫。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會秦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

他把慘殺當作痛快，後來每次戰勝，總是用痛快的表情，繪聲繪色的寫出屠場慘景，宛然一幅一幅的地獄圖，向滿洲皇帝報功請賞。他的漢奸劊子手立場的堅決，真像頑石一般。

靖港、湘潭戰後，太平軍退回岳州，曾國藩乘機重整水陸軍，裁去潰勇五千，補進羅澤南軍營。羅營軍官全是羅門學徒，戰鬥力很強。陸軍有塔、羅，水軍有彭、楊，湘軍進一步堅強了。咸豐四年七月湘軍攻陷岳州，九月攻陷武昌、漢陽，十二月圍圍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

曾國藩出境作戰，感到三圍困難：

第一，太平軍作戰勇敢，『愈剿愈多，愈擊愈悍』，湘軍死傷極重，銳氣挫損。曾國藩乃提倡獸性來報仇洩忿，『振作士氣』。例如興國、大冶戰鬥，獲俘虜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剝目凌遲』，九江城外獲俘虜十二人，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遲』，武昌城外太平軍新兵戰敗，『帶回七百餘人，全數斬決』。崇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殺死祭陣亡將士，祭畢，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國藩獸性示範下，

湘軍的殘忍是從古少有的。例如同治元年七月，湘軍攻破寧國府，「大呼直入，一律斬盡無遺」。過了兩個月，還是「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賊匪遜湘軍的殘暴，野獸遜湘軍的貪婪，賊匪彘野獸，才是湘軍的真面貌。譚嗣同描繪這個真面貌說：「……湘軍以戮民爲義，城邑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爲名，無分良莠皆奪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仁學」卷下）事實上湘軍攻破一城，就是屠滅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謂「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批示徽州知府劉傳祺稟）就是全城生命財物，頓時化爲烏有。

第二，人民擁護太平軍，敵視滿清。許多記載都說「民賊合一」，「民不恨賊而恨兵」，「賊如梳（沒收富貴人財產），兵如篦（無所不取）」會國藩自己也說：「自岳州至南京數千里，小民蓄髮納貢，習爲固然，雖經諭令薙髮，鄉民狐疑觀望。官軍稍有挫衄，則四面皆賊，餉道易斷。」（「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又說：「官兵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甘心從逆。官兵過境，無物可供買辦，無人可爲嚮導。」（「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剿辦摺」）派出探兵，多被鄉民擒殺（「陳明鄰省援兵協餉片」），「會國藩殉難三河鎮摺」。於是會國藩的獸性發洩到人民身上，縱兵燒殺搶掠，殘留的人民強迫薙髮，作爲投順的標記。英人令利「揚子江日記」稱太平軍紀律嚴明，沿途破壞大多爲清軍所爲，責英國援助清軍爲不義。容闕西學

東鄉記對太平軍，「官軍」曾作公平的記載，他說：「人民對太平軍較有信用，商不輟業，農不輟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對人民，亦未聞有虐待事，相處甚得。」又說：「運河（江南運河）兩傍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真象（指清軍燒殺破壞），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實由於官軍之殘暴，以尋等沿途所見，太平軍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就是曾國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裏也承認太平軍「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民間耕種，公私各半，傍江人民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後，太平軍還是「民心未去」。（「覆陳逆會李秀成正法片」）他爲要取得勝利，乃大燒大殺，做到「男婦逃避，烟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使太平軍「行無民之境，猶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他見長髮人便殺，實際就是見人便殺，從前滿清入關，「留髮不留頭」，殺死中國人民無數，曾國藩又大殺蓄髮人民，強令中國人民當滿洲貴族的奴役。如果他還有絲毫漢人氣味的話，二百年前薙髮慘史，總不能無動於心的呵！

第三，湘軍是賊匪組織，目的在搶掠，搶飽了就叫「思幾」，就是說想逃散。咸豐四年，曾國藩對咸豐帝報告攻破武漢以後的情形說：「水師搶船太多，私匿藏貨，破城以後，水陸弁勇各獲財物，頗有飽則思颺之意。」（「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田家鎮戰鬥「各勇奪獲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彭玉麟恐船隻太多，爭奪貽誤，又恐衆勇飽則

思。遂將奪回之船，一並燒毀。」（『官軍攻破田家鎮燒盡逆船摺』）這還不是竊盜爭賊的圖畫？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震怒以衛吾（孔、孟）道』？（『討粵匪檄』）曾國藩要鞏固軍隊，乃用一暗一明兩辦法。暗的辦法是縱兵殃民。例如湘軍駐紮石塘、紳士們問他訴苦說：『兵勇拆毀房屋，以作柴薪，捉去歸民，爲伊搬運，所有店舖，被兵勇輩估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實攫取室中器物，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不如長毛之歎。』（『石塘紳耆致在省諸紳書』）這是平時駐軍的情況，戰時殺掠算作軍功，誰敢向他訴苦呢？他在事情無可掩蔽的時候，訓斥軍官一頓，表示維持『紀律』和『聲譽』。明的辦法是虛報戰功。舉他善於做文章，把湘軍寫得戰無不勝，一方面取得滿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籠絡他則想戰的軍心。湘軍保至三品以上的軍官，不下數萬人（『陸軍借補小缺請飭部核議片』），事實上湘軍幾乎全部是軍官。兵勇變軍官，小官變大官，使這些人貪利又貪官，升官無止境，貪利也無止境，繼續留在軍營當賊匪。也有整營的官和勇，搶飽了不願打仗，曾國藩只好全營解散，另招一羣『深山窮谷寒苦之民』來補充。湘軍始終依靠『貪』『殘』維持它的『戰鬥力』。

咸豐四年十二月湘軍圍九江，至八年四月陷九江，九年六月陷景德鎮，江西入湘軍手，前後凡四年半。中間經無數次大戰，陸軍主將塔齊布、羅澤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時斃命）都被太平軍擊斃，水軍戰敗被分爲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

在危急中。曾國藩出死力保持潯浙江的道路，從浙江方面獲得閩浙的餉銀、食鹽及上海的關稅、釐金，湘軍不斷潰敗，終符彖於散滅。太平軍不出兵取江浙，却在江西與湘軍苦戰，是極大的失策。石達開主持江西軍事，曾國藩最怕他，說他「狡悍爲諸賊之冠」。六年八月，洪、楊、韋內訌，石達開馳回南京，咸豐帝喜出意外，令曾國藩準備石達開來投降。曾國藩到底是老練的，他答覆咸豐帝，深怕石達開執朝政，說：「若其石逆勝而洪韋敗，則該逆挾詭詐以馭衆，假仁義以要民（結民心），方且飛揚自恣，未必遽有投誠之心。」（江西近日軍情據實覆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敗也不會投降，說他會勸太平軍九江守將林啓容歸順，偽造文件騙瑞州守將賴裕新離防地，均無成效，還是切實備戰要緊。果然，石達開出南京後，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國藩大恐慌，急令大將曾國荃、李元度率湘軍主力攻石軍後路，大將李續賓（羅澤南部統將）出全力攻陷九江，石達開是孤軍，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國的內訌當然是此後太平軍失敗和曾國藩成功的一個決定原因，但太平軍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兩個健將，並未使曾國藩得到順利的成功。咸豐九年十月曾國藩定四路攻安徽計劃，曾國藩、曾國荃任第一路攻安徽。太平軍安徽主將陳玉成驍勇善戰，聯絡捻軍，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戰，玉成擊斃李續賓。曾國華、羅澤南舊部全軍殲滅，曾國藩畏懼陳玉成，呼爲「四眼狗」，出全力對抗，才能支持。十年閏三月，李秀成、陳玉成合攻江南大營，和春、張國樑敗死，大營潰散。秀成軍攻取蘇州，直入浙江境。滿清

朝廷感到生命危險，發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亂，第一次給曾國藩地方政權，叫他兼兩江總督，帶兵親往援救。『保全東南大局』。江南大營（向榮自廣西尾隨太平軍到南京，駐兵孝陵衛，號江南大營）統帥一向是滿人（從向荣到和春），軍隊是綠營兵，駐地在南京附近。照咸豐的看法，滿洲統帥與漢人曾國藩對立，綠營兵與湘勇對立，湘軍在外圍戰勝太平軍，滿洲統帥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滿洲統治者的威信。大營潰散，咸豐帝的計劃失敗了。曾國藩取得兩江總督，表示湘軍勢力大進了一步。不過曾國藩並未應命赴援，他認為安慶城圍一撤，全局敗壞，不可收拾，堅決不離開安徽。當時滿清的形勢確是異常危急，江浙迫於李秀成，鄂豫皖困於陳玉成，張洛行，江西又爲李世賢、黃文金所攻入，這種局面，迫使曾國藩也不得不壓抑一下曾系湘軍獨佔戰功的思想，保薦左宗棠幫辦軍務，當自己的助手（實際是胡林翼保薦，咸豐帝重用左，分曾軍權），保薦沈葆楨（林則徐女婿，不滿意程彰阿派的曾國藩）守江西，保薦李鴻章辦淮軍。他對李鴻章特別重視，說『該員勁氣內斂，才大心細』，挑選長江水師打仗得力的將弁，交李鴻章使用，從此出現了左系湘軍和李系淮軍。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使滿清的統治更見危急，也使曾國藩的毫無民族立場的漢奸本質更見發展。這就是英法聯軍之佔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脅到清室與整個中國的生存。照常理說，這是滿清立國以來的空前巨變，忠於皇室、忠於聖德的曾國藩應該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實却完全相反。曾國藩仍舊堅持他的軍事計劃，自

已專攻安慶，江西交給左宗棠，準備從江西入浙江，對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則預定投降，喪辱悉所不計。他在奏摺勝保請飛召外撥摺裏說，「俟該夷就撫」。勝保的所謂外撥自然是指湘軍，但這個外撥這時却不是咸豐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內應了！形式上他是說要英法就咸豐之撫，但這顯然只是要咸豐就英法之撫的阿Q式的說法罷了！當時咸豐帝調湘軍上諭說：「情形萬分危急：…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曾國藩却拒絕調兵，直截提出「撫」的辦法，他知道對英法侵略者接仗，止能喪失兵力，破壞反革命的內戰計劃，不如投降妥協較為便宜。滿清昏憤賣國，曾國藩精明賣國，他的才幹勝任反革命的內戰首魁，因之他也勝任賣國能手。

當英法反動派聯合的軍隊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清政府訂城下之盟北京條約的時候，曾國藩正在江西、安徽埋頭作反革命的內戰，連打敗仗。中、英、法和議成功，法國、俄國的反動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軍，美國反動派要求從海道運漕米到天津，曾國藩贊成「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法國剛把他的「皇上」驅逐出北京，還不會回來，也要「獎而允之，許其來助」以反對太平天國（「撥陳洋人助剿及採米運津摺」）。他的頭腦裏，確是除了反對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思想。北京條約後，英法與滿清的勾結進了一步。咸豐十一年五月，幫助滿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國海關）建議進口鴉片每箱加課新稅，用稅款買外國小火輪及槍砲，法國也願出賣槍砲並派人傳授製造法，咸豐帝很滿意，徵詢曾國藩意見。曾國藩完全贊成，認為「我皇上

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一）之至意」。〔覆陳購買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豐帝在訂購洋船未到前，馬上先撥給兩隻從美國租來的破舊輪船使用。在利用外國人力物力以屠殺人民時，曾國藩就全然不管什麼中國文明與外國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國侵略者當做親老子，把本國人民當做唯一的仇敵，假安內攘外之名，行安外攘內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曾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鉢！

曾國藩堅決圍攻安慶，十一年八月終於被他攻破，屠殺城中太平軍二萬餘人（老弱婦女在外），跳水闖逃的又被水師截殺，「實無一人得脫」。他自稱大快「人」（獸）心，向咸豐帝報功，不料這個滿洲主子七月裏因貪色過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慟絕」，說是不待趁主子活着的時候博他一笑。

三 戰勝太平軍

（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豐帝死去，西太后那拉氏當權，她知道要滅太平軍必須依仗曾國藩，而曾國藩的漢奸忠實性又確信可以保險，立即大胆給他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大權（十一年十月）。他獲得漢員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權力，在這一時期中，高度發揮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對外關係上，他善於把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相配合，依賴外國來取得反革命內戰的勝利。

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爲反動分子的集中點。咸豐十年，上海反動分子組織『愛國會』，出資僱美國的『國』在本國犯罪逃亡到上海的流氓華爾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曾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開稅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餉源』，從取得洋船洋砲洋兵『助剿髮逆』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徑。他看到上海是決定反革命與太平軍內戰勝敗的關鍵，他就奏請『聯絡洋人，協力守禦』上海。同治元年正月議覆借洋兵剿賊片裏說，『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後面的『不可』却是一時的裝腔作勢，隨後他就派軍隊與西兵『會剿』內地了。初時，英法美駐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紳商向清政府請願借洋兵，清政府動搖不定。同治元年三月曾國藩派李鴻章帶淮勇往上海，準備『會剿』。四月，『常勝軍』聯合英法反動派的軍隊攻入嘉定、青浦兩城，太平軍圍城猛擊，外國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說：『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李鴻章也說：『滬中官民向恃洋人爲安危，乃援賊未來之先，洋人分兵西出，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歛兵不動』。曾國藩看出止有左李軍加上洋兵，才能對抗江浙境內太平軍，因此，更堅決的主張『會剿』，藉以牽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軍與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財物（搶掠），清軍得土地（當然也搶掠），曾國藩主張的所謂『會剿』辦法，就是這樣無恥的鼠竊狗偷行爲。

曾國藩本人駐安慶，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荃率湘軍主力進至雨花台，八月，李秀成猛攻湘軍，血戰四十六日，秀成軍敗退，南京合圍。二年十二月李鴻章、戈登陷蘇州。三年三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備曾國藩迅速攻下南京，令李鴻章帶兵來助。曾國藩拒絕李鴻章，說最好教他帶餉銀來，李鴻章也就託故不敢來。這是曾國藩最顯著的一次內部矛盾表現，像他那樣老奸虛僞，爲什麼不能掩蔽這個矛盾呢？湘軍起初利用餉銀招誘窮苦破產農民當練勇（餉比綠營兵多三倍），出境作戰以後，官、兵主要收入是搶掠財物，擄獲金幣珍寶不可勝計，流行着『軍與不乏財』的諺語。曾國藩在咸豐七年謝天恩奏摺裏也說『湘中勇夫，以投營爲名（官爵）利（搶掠）兩全之場。以職陣爲日用常行之務，赴江西、湖北投効者，絡繹不絕，父缺子代，此往彼歸』，造成湖南省紳士流氓痞棍大發賊匪財的熱鬧場面。搶掠，鼓舞了湘軍的『戰鬥勇氣』，也鞏固了湘軍的戰鬥目標——南京。當時『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賊會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這就是湘軍拒絕淮軍來助，各營輪流苦攻，不帶任何嚴重損傷，圍城三年以上，病死二萬人，戰死八九千人，而作戰始終不懈的原因。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攻破南京，『分段燒殺，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殺十餘萬人』。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的勇敢，他說：『李開方守蕩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金陵克復全脫悍賊盡數殲滅摺』）從敵人

的口中，正顯出了太平天國的將領士兵，乃是中國民族偉大的英雄戰士。他們爲了反對滿清統治者、外國侵略者和漢奸的聯合反革命勢力，爲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會改革，忠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激昂，可歌可泣。曾國藩輩無情地殺戮這樣大量的民族精華，不是窮兇極惡罪該萬死的民賊是什麼？他大報殺人功，對財物却說『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賊庫，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料之外，亦爲從來罕聞之事』。（『賊會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金銀如海』的南京，爲什麼忽而變爲『全無貨物』的空城呢？原來南京的一切財物，特別是江南民間的財物，已都完全被湘軍洗劫一空，曾賊正好說一句『爲從來罕聞之事』來掩飾。曾國藩看到李秀成自傳，揭露出湘軍歷來虛報戰功、諱敗爲勝、燒殺搶掠等等的內幕，深以爲忌，所以決定遠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處置。很顯然的，如果遵照滿清皇帝命令，送李秀成到北京『獻俘』，曾國藩和湘軍的『名利兩全』，在滿洲皇帝一怒之下，可以變爲名利兩喪。他這時再也顧不得他一生標着一個『誠』字的假面具了，他至少兩次地刪改了李秀成的自傳，慫恿地殺了他以滅口（秀成受凌遲極刑，死訊傳出，南京居民罷市哀悼這位偉大的英雄）。曾國藩搶得寶物金銀最多，湘軍老將如多隆阿、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心懷嫉妬，借不同意擅殺李秀成爲由，紛紛向曾國藩告退，曾系湘軍幾乎鬧到爭賊火併的局面。反對派左宗棠、沈葆楨又向清帝攻擊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事載『湘軍志』、『曾軍後篇』）。清政府本想從審問中查出金銀所在，但在曾國藩提供裁撤湘軍三

四萬人的交換條件下，又看到將領爭奪贓物，形勢緊張，也就追認拒絕獻俘，擅殺李秀成爲『合法』，把危機和緩下去。曾國荃給李鴻章信裏說：『李秀成擒獲後，弟徧刺以錐，流血如注，隨即傳置檻車（囚籠）中。』曾國荃對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簡單的爲了洩忿，更不是強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鴻章給友人信說：『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後來的地方官難於完成恢復的工作），似需百年方冀復舊也。』湘軍燒殺搶掠的慘酷，一羣匪魁自己供得夠清楚了。曾國藩殺李秀成，大裁湘軍，令曾國荃稱病歸家（託辭回家治疥，而曾國藩長着極重的癬，不會回家醫治過），都是爲了掩護湘軍賊匪的暴行。但國荃在家鄉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頃，不納租稅，聲名仍是惡劣不堪。

曾國藩的湘軍始終是如此兇惡的一幫殺人放火的匪賊，但是他們却始終口口聲聲稱太平軍爲匪賊，爲殺人放火。但是究竟誰是匪賊，誰是殺人放火，不是明明白白的嗎？現在中國也還有這種殺人放火的匪幫，這就是那些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亞種法西斯分子，但是他們不也在師曾國藩的故智，反而宣傳中國共產黨爲殺人放火的『共匪』『赤匪』『奸匪』嗎？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比太平天國不知進步了多少倍，而亞種法西斯分子，又比曾國藩不知兇惡了多少倍，而他們猶欲隻手掩蓋天下人耳目，則他們比曾國藩又不知愚蠢了多少倍，不也是明明白白的嗎？

曾國藩入南京，急辦三件大事：首先是蓋造貢院，當年舉行鄉試，提拔江南士人（

地主紳商的子弟)；其次建饒南京旅兵營房，請北京閑散旗兵南來駐防，發給全餉；同時強力裁撤湘勇(不發欠餉或名義上發欠餉)，一部分交會國濬荃押解回籍，一部分流落南京，因索欠餉及其他非法行動，又被會國濬用懲辦游勇名義殺死無數。會國濬不僅消滅了農民起義的太平軍，而且也消滅了農民從逆的大部分湘勇，食戰勝之果的只是滿清統治者及一批擁護封建舊制度的士大夫，大買辦，大地主。

四 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八六四年——一八七二年)

會國濬正在江南鞏固他的勝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滿清的農民軍捻軍勢力又已大張，滿清兩個大帥——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與湖廣總督王文束手無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軍，同治三年十月令會國濬帶兵到皖鄂交界處督「剿」。會國濬深知滿清想在攻捻戰爭中造成滿蒙將帥的威望，對抗湘軍將帥，自己再出「立功」，將更招滿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繼續裁撤湘軍，一面推薦後起的淮軍並湘軍一部分，歸僧格林沁。官文調遣，保證各軍服從命令。這正合滿清的願望，令會國濬仍回兩江總督原任。僧格林沁憎惡湘淮軍，說他們都不能作戰，曠使安徽地主武裝首領苗沛霖殺湘軍數營，又令部將陳國瑞與湘軍互鬥，奏劾湘軍爭功。湘淮軍方面，會系湘軍止服從會氏兄

弟（國藩、國荃），左系湘軍止服從左宗棠一人，淮軍止服從李氏兄弟（鴻章、鶴章、昭慶），曾國藩地位高，指揮淮軍，仍需通過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統，更不能統曾系湘軍。僧格林沁、官文統率湘淮軍，結果引起滿漢兩系間顯著的分裂。僧格林沁敗死，滿清只好又教會國藩出來統軍，維持北方的危局。

曾系湘軍大部分經曾國藩強力裁撤，又因長官尅扣軍餉，兵勇和下級軍官非常憤恨，兵變到處發生。例如同治四年，鮑超部（川勇，在湘軍中作戰最悍，搶掠也最兇）在湖北、江西、福建兵變，李、蔣、成三軍在湖北，訓、義兩軍在皖北，金、唐、朱各軍在皖南，相繼譁變潰敗，再加被捻軍擊敗（攻捻中湘軍止殘留曾系張詩日，左系劉松山兩部），湘軍基本上消滅了。湘軍失意官勇，深抱不滿，相率加入秘密反滿團體哥老會，影響在營官勇也秘密入會，曾國藩嚴令「查獲哥匪，立予正法」，與湘軍士兵形成嚴重的對立。從此哥老會代天地會勃興，成爲有力的反滿團體之一。湘軍紀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長毛」的定評。淮軍同樣「與民爲仇」（「批淮軍提督吳長慶稟」），曾國藩無法約束，指揮不靈，屢戰屢敗，只好讓位給李鴻章，使淮軍享滅捻的軍功（劉松山都戰功最大，招滿清及李鴻章的疑忌，抑功不賞）。攻捻戰爭中，湘軍本身分裂，實力保存無幾，湘淮軍又分裂，於是李鴻章政治地位追上曾國藩。

捻軍敗後，滿清認湘軍爲「隱患」（淮軍後起，戰功較小，兵勇很少參加哥老會，滿清扶植淮軍，使與湘軍對立），定計消滅湘軍，令左宗棠帶劉松山部與西北回族起義

軍戰鬥。同治八年，劉松山部在綏德，高連陞部在宜君兵變，起因都是查拿哥老會員。將領不取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當，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軍，士兵不全是湘人了。消滅湘軍，滿清與曾國藩意見一致，起初利用落後的一部分農民，消滅革命的一部分，轉過來又消滅被利用者，所謂兔死狗烹，統治階級是慣用這個毒計來鞏固自己的權位的。滿清在人民起義反抗中得轉危為安，曾國藩得享受富貴尊榮，自然獲利極大。單就湘鄉一縣說，二品以上文武官將近一千家，他們都是豪紳大地主，佔地不繳租稅，官吏強迫貧民代繳，造成普遍破產的現象。曾國藩號召為保衛聖道，維持傳統文化而戰，結果止是少數人富貴，多數人死亡和破產。

曾國藩在內戰中獲得勝利以後，竭力煽滿媚外來保守個人的反動成果。他替滿清製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論來鞏固國內統治，認為『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不足所能補救』，『我輩分內之事』專重在反對革命人民的內戰（『批候選訓導計棠稟』），『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遵旨通籌全局摺』）但如洋人並不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如英法聯軍之役，那又該怎麼辦呢？他認為這裏應該『從大處着眼』：咸豐十年八月洋人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把外國侵略者看作天神一般，侵略是『有德於我』，要聯絡他『共保人財』，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媚外心理，以曾國藩為代表而理論化了。英法聯軍的藉口

之一就是廣西人民的仇教案；同治九年，天津又發生一起教案，因民間訛傳教堂迷拐人口，挖眼製藥，有人與教徒在教堂口角鬥毆，法國領事豐大業洵洵來見直隸總督崇厚，向崇厚開放手槍，又向天津知縣劉傑放槍，擊死僕從一人，人民遂激動義憤，毆死豐大業，焚燒教堂，殺傷教民數十人。這一類的仇教事件，本質上是人民原始的自發的反侵略運動。法國藉口仇教，又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滿清令會國藩往天津查辦。在反對太平軍時口口聲聲大罵天主教的會國藩，這時却力主『和平』辦理了，對法使預先保證殺人數目，求其滿意，以至連政府中人（包括李鴻章）也不能忍受，羣起抨擊，說『辦案當以供證爲憑，豈能預爲懸擬，強人就案』。這個人頭販子會國藩堅持自己的主張，終於重辦『滋事人犯』，斬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也辦充軍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國謝罪。經這次屢屢外交，會國藩的漢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國朝野呼爲賣國賊，人人欲得而誅，連他的湖南同鄉也把他湖廣會館誇耀功名的扁額，摘下來打碎燒成灰了。他自己也覺得沒趣，說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爲一生憾事』。同治十二年，這個漢奸劊子手在國人皆可殺的呼聲中死了。

被後來直到現在的一切反動派所謳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這樣的。這些本都是公開的在當時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但是統治階級却不敢宣佈它們，硬要捏造另外一套『歷史』，竟然把會國藩說成『聖賢』了。這個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正是和會國藩一模一樣的人物，他們也不在裝模作樣要羣衆承認他們是『聖賢』嗎？世界一天

被虎狼所統治，誰能禁止虎狼們互稱並自稱爲『聖賢』的自由呢？

曾國藩是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兩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又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他精通極端專制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爲『痛快』。他被『天朝田畝制度』駭倒了，要挽救封建統治者的權利，犧牲數千萬人生命，說是『衛吾道』，所謂『道』，只是少數大地主大官僚的『道』，從人民看來，恰恰是太逆不道。

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羣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認反革命的洋人不滅滿清，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爲『有德於我』，不必再計較『關稅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壓人民二類『小處』(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有意識的認清了要維持國內統治，必需依賴外力，必需不惜喪權辱國的條件去交換外力。他規定這個對外公式，也就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規定半殖民地依附關係。對國內弱小民族，左宗棠殺回民數百萬，席寶田殺苗民一百萬，這羣人把殺人當做專業，他們殺漢民數千萬，當然不會放鬆對回苗的屠殺。當時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學大師戴望，給有曾國藩一類人下了定評

，誰是「斯盜賊夷狄，角逐於天軍」（汪仲伊「握奇圖解序」），真是一點不錯。

曾國藩是屠殺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為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軍自身的錯誤，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國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練長江水師，洋砲不到決不出戰，「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砲之力」，因此得出「必需洋砲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的結論（「請備廣東續解洋砲片」）。駐軍江西、安徽，逐步進逼南京，軍餉來源多數是上海關卡的稅銀，主要靠鴉片捐稅。保衛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參戰。沒有外國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戰勝太平天國。曾國藩以後，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曾國藩給這些能手啓示了寶例。

鴉片戰爭壓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曾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文化方面，堅守舊文化的黑暗齋，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却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方鎮壓民衆，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保存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中國一天不解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反動統治者一天不放棄這個典型的繼承。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無疑地已經極大、極重地打擊了滿清的統治，動搖了它整個統治的基礎，滿清朝廷的聲威，從此一落千丈了。歸根到底，曾國藩之流究竟還是沒有救活了滿清朝廷，只讓它多延長了幾天的殘喘，而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精神也並沒有死亡，這種革命精神的

種子，經過太平天國英雄的戰士們是更深地種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種在由湘勇發展的哥老會的心中了。孫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國的繼承者自許，並終於完成了太平天國推翻滿清的未竟之業，這正如他的叛徒們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許，並幻想完成曾國藩消滅中國革命的未竟之業一樣，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反動方面說，曾國藩創湘軍，主觀上雖是爲了挽救滿清，客觀上却也起了些削弱滿清的作用：

滿清侵入中國，軍隊主力是八旗兵，平吳三桂到鴉片戰爭，主力是綠營兵，兩種軍隊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揮權。湘軍、淮軍是近代漢族軍閥軍隊，清政府要通過漢族軍閥才能使用。這樣，滿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軍起義前，地方軍政長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極大多數是滿洲人。咸同兩朝，湘軍轉戰全國，督、撫、提、鎮（總兵）不得不用湘淮軍中人。這樣，滿清對地方的統治也削弱了。

鴉片戰爭時，滿清獨攬外交權。咸同以來，曾、左、李與上海紳商、買辦、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吳煦劣跡昭著，被人參劾，曾國藩奏稱吳煦聯絡洋人，廣交洋商，厚結洋將華爾，吳煦的進退，關繫英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換吳煦。左宗棠經買辦胡雪巖介紹，以一分二釐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萬兩，作爲出兵新疆的經費。李鴻章身兼官僚軍閥買辦三種性質，與反革命的洋人關係尤密，滿

清不得軍閥同意，不能單獨進行外交。這樣，滿清對外關係也削弱了。

曾國藩爲首的湘軍，挽救了滿清，同時客觀上也削弱了滿清，滿漢統治者之間，勢力起着顯著的變化，從此滿清政權，逐漸向漢族軍閥轉移。但這種變化，當然是出乎曾國藩這批反革命漢奸創子手的主觀意識之外，其結果倒不是加強反革命，而是成爲有利於新的革命火燄爆發的因素之一了。歷史發展規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於此。

1947
9
5682

